

瞿秋白

◎「名人情结」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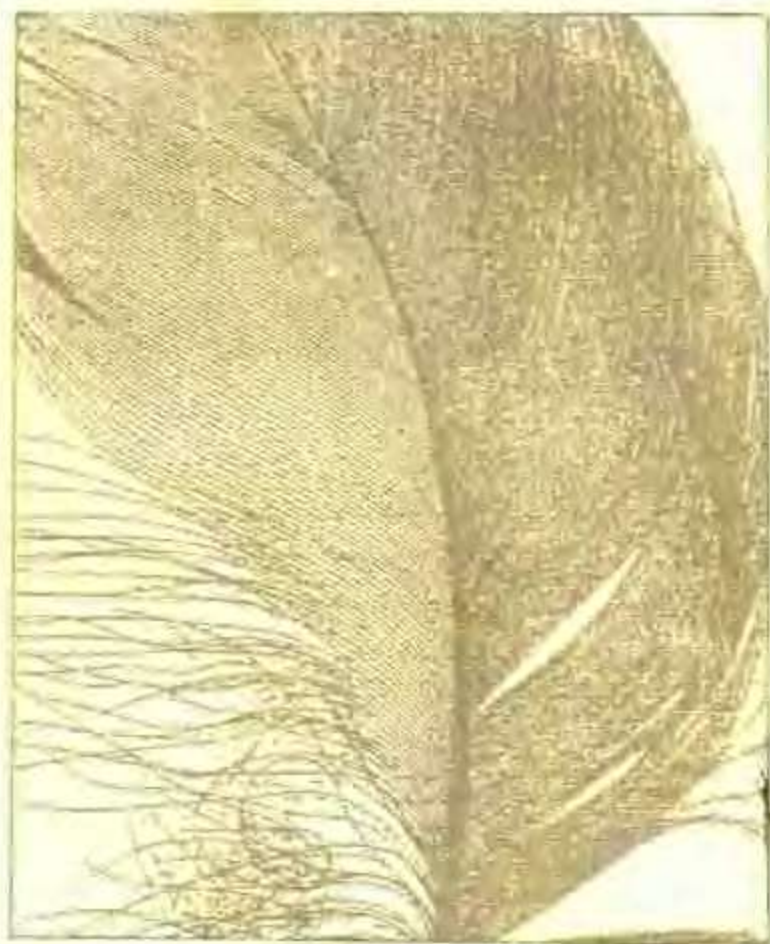
◎冒 忻著

杨之华

❤❤ 你一定熟悉他们的名字，
但你未必真的走进那属于他
们的感情世界；当你随着我们的学者、
作家的生花妙笔，来到那属于他们
的人生舞台，你一定会惊讶这儿上演的
剧目千姿百态！

《物种起源》插图(1)：巢田蜃螺(2)：刺棘(3)：刺棘(4)：刺棘(5)：刺棘

ISBN 7-5006-1785-2/1 + 383 定价 6.30 元



ISBN 7-5006-1785-2



9 787500 617853 >

● 名人情结丛书

● 曹湜 著

瞿秋白
杨之华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赵燕玲

封面设计：李鸿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瞿秋白 杨之华/冒焯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12
(名人情结丛书)

ISBN 7-5006-1785-2

I. 瞿… II. 冒…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现代②瞿秋白-生平事迹③杨之华-生平事迹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4192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三河市科教印刷包装集团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6印 4插页 115千字

1995年1月北京第1版 1995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定价6.30元

前 言

一个古老的民族，不仅有它悠久的历史，还有着它那长期积淀下来、令人艳羡的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长河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化艺术，为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片蕴藏丰富的海洋，也是一片群星璀璨的星空。月朗星莹之时，举头远望，夜幕深邃，星河灿烂，不禁忆起那些曾为民族文化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文化巨人们：鲁迅、郭沫若、瞿秋白、茅盾、朱自清、徐悲鸿、郁达夫、蒋光慈、庐隐、萧乾、萧红、萧军、石评梅、朱湘，以及胡适、梁实秋、徐志摩、林语堂、戴望舒……也许这其中的一些人在政治观点上有所差异，甚至对立，但在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发扬上，却从各自的角度上，程度不同地做出了他们的贡献。我们这套“名人倩结”精品书系，立意想从这样一些文化巨人的身上，通过对他们情感世界、生命历程的细腻描写，来折射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深邃海洋。

与以往的人物传记不同，本丛书选择的是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角度，即注重情感世界的开掘。也由此，决定了作品的风格：优美，深情，文采斐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丛书的体例，采取上、下篇的写法。上篇重笔描摹文化巨

人们的生活、事业和情感；下篇是夫妇、恋人之间的两地书，谈人生，谈社会，谈理想，谈追求，谈日常生活，谈身边琐事，谈爱……每一篇都是美文，自然动人。个别书稿不分上下篇，原因是书信部分过少，只得以其它内容附录补充。从全套丛书来看，由于上篇“传”的部分比重偏大，故对于作者，我们均以著的方式署名，而未采取编著的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传主，之于其日常生活、情感世界，以及政治观点等诸方面的叙述描写，我们均主张采取客观的态度，力求达到一种纯然的真实。

这套丛书的作者，或为国家或省属社科院方面的专家、学者，或为国内高等学府的专门研究人员，个别作家更为全国闻名。这些作者，往往兼有学者的渊博，以及作家生动感人的文笔，如此，保证了作品既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又极具艺术美感的独特之处。

一九九四年八月

目 录

第一章	两个飘零人·····	(1)
第二章	生命的伴侣·····	(31)
第三章	比翼齐飞的海燕·····	(63)
第四章	和鲁迅并肩战斗的日子 ·····	(91)
第五章	“我们一定能重见”·····	(122)
第六章	“我唯一的亲人,我如 何不留恋?”·····	(139)
	瞿秋白致杨之华的信·····	(173)
	杨之华忆秋白·····	(179)

第一章 两个飘零人

在钱塘江南岸，有一个古韵萦绕而又弥漫现代气息的小镇，它就是浙江萧山衙前镇。

一九二三年初冬，在坎山街三岔路一座深宅大院门前，沈玄庐身穿黑绸丝棉长袍，正对站在他面前，手提皮箱的儿媳杨之华说道：“上海大学是一座培养革命人才的熔炉。于右任、邓中夏、瞿秋白在那里主持校政。瞿秋白就是你所崇拜的《饿乡纪程》的作者。所以，你要报考上海大学，我是赞成的。不过，这个家……”

这时，沈玄庐的大姨太，一个善良和蔼的年轻女子抱着杨之华的女儿，两岁的小独伊走过来，微笑地插话说：“晓光这孩子有我照顾呢，你放心吧！”

杨之华望了一眼微皱着眉头的沈玄

庐欲言又止，放下皮箱，把独伊抱到自己怀里亲吻着，泪水沾在独伊脸上。

大姨太感动地提起皮箱，陪着杨之华走了一程。杨之华依依不舍地将女儿交给大姨太，拎起皮箱，默然离去。独伊摇着小手，哭喊着：“妈，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圆圆的脸上，笑起来有两个动人的酒窝，细长的眉毛下面有一双深水潭似的大眼睛，聪颖温柔中透出几分坚强。那年正当二十三岁，是萧山有名的美人。英国弗兰西斯·培根谈美时曾说，美不在颜色艳丽而在面目端正，又不尽在面目端正而在举止文雅合度。杨之华不仅如此，她更有其深层的内在气质的美。这是她超越一般女子面独具的魅力所在。

杨之华生长在一个破落的书香人家，她的爷爷开米店时，赚了钱，置了不少田产，在镇上颇有些地位。父亲本来经营丝茧生意，由于战乱及经营不善，又遭水灾，家境便逐渐衰败下来。杨之华从小爱听鉴湖女侠秋瑾的故事，因为秋瑾就是浙江人，“风雨亭”和秋瑾墓就在西湖边。“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的英勇就义深深地打动了她稚嫩的心。但那时家里重男轻女，不让她读书，她就常常躲在书房外偷听老师给她哥哥讲课。老师感动了，表示愿教他兄妹二人。她才终于被允许进入家塾读书。因为她天资聪慧，学习进步很快，家里便让她进了杭州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她想做一名教员，在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中间谱写自己的青春。这时她阅读到一些进步书刊，开始接受了进步思想。不久，五四运动波及到浙江，她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又冲破“男

女授受不亲”的旧礼法的束缚，主动与男子师范的学生联合开展学生运动。但是，这些爱国行动却为封建校规所不容，卫道士们斥她为“害群之马”，便将她开除了。她回到家里，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河游泳，上街骑自行车。她的举动惊世骇俗，成了当年萧山的奇女子。

那年听说《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去苏联学习，杨之华便满怀热望到了上海，但结果没有去成，就留在该社工作。这个社的主编就是沈玄庐和戴季陶，社中云集着一批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刘大白、沈仲丸、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李汉俊当时和日本、朝鲜的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给了杨之华思想上很大帮助，还介绍杨之华到一位苏联朋友家中学习俄文。以前，杨之华常读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这时她结识了这位久已敬仰的进步学者，邵力子夫妇认她为义女。一九二一年春，《星期评论》社被封闭后，杨之华又回到了萧山。那时沈玄庐与萧山的农运领袖李成虎正在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杨之华便与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宣中华等一起创办农村小学和农民夜校，做农民工作，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时，她与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识，并一起在农村小学工作。沈玄庐是萧山大地主，辛亥革命时曾和孙中山共过事，后来，还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与之华的父亲杨羹梅也是世交。他的儿子沈剑龙是之华的哥哥杨葆青的同窗好友，虽是纨绔子弟，却是一个文采风流、品貌不凡的年轻人。他精通诗词，爱好音乐，不少美丽少女围在他的身边，但他心里却另有所爱。一天，沈家托人来杨家说媒，之华的父母商议后

回答说：“沈家是大户人家，我杨家清寒，不敢高攀这门亲事。”

可是沈玄庐却说：“什么大户人家，小户人家，现在恋爱自由，只要小两口愿意，可以新事新办。”

于是，沈家后花园里，桃李争妍，鸟语花香之时，举行了一个盛大茶会。杨之华剪着短发，没带嫁妆也不坐轿，穿着一套粉红的衣裳，笑盈盈、大大方方地走来了。沈老先生以烟茶糖点招待乡亲们，庄重地宣布沈剑龙与杨之华喜结连理。新郎、新娘各讲了几分钟话，一、二亲友致祝贺词，仪式便告结束。这样的新式婚礼，改变了办婚事的陈规陋习，在当时可算开风气之先。他俩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想来应该是个非常美满的家庭，可是好景不长，时代在发展，人也在变化。畸形的社会向不坚定的人布满了陷阱。沈剑龙一旦踏进上海十里洋场，便经受不住人欲物欲的诱惑，迷恋酒楼舞厅，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其父也斥之为不肖子。杨之华一腔柔情，想方设法感化他回头。起初他蒙骗之华，后来，之华发现他日益沉沦，不可自拔了。

面对绝望的婚姻，杨之华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她不能不怨愤，更不能容忍。一九二二年七月，她就在《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过《社交和恋爱》，文中说，恋爱是人格的结合，我很看重自己的人格，并且同时看重别人的人格。我的意志，哪个可以来动摇我？哪个可以来勉强我？哪个敢来支配我？我握有我支配自己的权限，更没有被人支配的余地。可以想像这样一位超凡脱俗，倔强美丽的女性，是决不会把青春浪费在这样的男人身边的。她迟早定会冲破那个家庭的束缚，去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终于在这年年底，她毅然离家，只身来到上海

报考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这时,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度过了两年记者生涯的漂泊者瞿秋白,随参加共产国际“四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陈独秀等回到祖国将近一年。一年多前,这个东方稚儿吃着“俄乡”的面包,幸而见着心海中的灯塔,由最早派往共产国际的中国党代表张太雷介绍入党。回国后不久,他担任了改刊后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及《前锋》杂志的主编,并参加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这年六月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就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做了报告。他还向大会做了出席共产国际“四大”的报告。这次大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和组织形式,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继任委员长,瞿秋白被推任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那时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入,还少得很。因此,应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就不得不由他来开始尝试。他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而他爱好的文艺只能成为他的“业余。”从此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中共领导层抓意识形态的中坚,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3号(中央机关驻地)的风云人物。夏天,经李大钊向于右任推荐。他又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大学工作。

上海大学是国共联合创办的一所新型文科大学,于右任任校长,邓中夏任校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任中文系主任,何世桢任英文系主任。瞿秋白上任后,便在八月二日至三日《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了一篇鸿文《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海大学规划了明确的培

养目标和治校方略，在当时的学界引起震动。瞿秋白在社会学系还主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和《现代民族问题》等课程。一大批革命家和学者名流如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杨贤江、蒋光慈、施存统等都在这个系兼任教员。这个系的学生最多，起初只有五十多人，后来增加到四百多人，占全校学生的半数以上。他们是革命的火种，大部分先后踏上了革命征途。现在，有的学者引用了玲的话说，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也可算作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所党校。瞿秋白、杨之华爱的旅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杨之华进入社会学系学习时，上海大学已从闸北青云路庆云里一座破旧的弄堂房子搬到了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敦厚里。她很喜欢这个新环境，特别是那些可敬的良师和亲密的益友，在她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多少年后她还记起邓中夏在办公室里埋头工作的情景。邓中夏的头发很黑，眉毛又浓又长，眉心很宽，当他抬头看人的时候，两眼炯炯有光。他常常给学生讲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共产党人的故事。张太雷愉快活泼，教他们政治课。蔡和森严肃庄重，讲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恽代英和萧楚女讲起活来幽默诙谐，常常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

杨之华和瞿秋白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其时，瞿秋白刚在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开始。瞿秋白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他回到上海以后，便给上大社会学系的同学们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概论》。老同学告诉杨之

华,大家都喜欢听秋白老师讲课,在青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房子陈旧,人都挤满了,楼板震动,似乎要倒塌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地听。杨之华早就听说秋白的思想才华和传奇性的经历,对这位老师充满了崇敬感和好奇心。在敦厚里新校址上课时,秋白讲课的地方是一个最大的课堂。但还是显得那么拥挤,窗外和门口都站满了关注祖国命运,充满求知欲的青年学子,除了社会学系的同学,还有其他系以及外校的进步青年也慕名来听讲。

秋白穿着笔挺的西装大衣,拿着一顶帽子,从人丛中挤进来,安详地走向讲坛,课堂内外立刻肃静下来。秋白站在讲台上,神态从容,和蔼地微笑着。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平,鼻梁上的一副眼镜跟他的脸庞很相称,目光亲切而深沉。他打开黑色皮包,取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

这节课讲的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当他说：“即使顶天立地的最伟大的个性亦决不能在孔子时代想着现代的共产主义,而现代的共产主义潮流亦不是任何‘伟人’可阻挡的”。这时,一个同学忽然站起发问：“为什么说国家主义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呢?”

“问题提得及时,谁可回答呢?”

杨之华的一双眸子如闪光的黑宝石注视着讲台上,白皙的面颊泛起一抹红晕,她终于鼓起勇气站了起来：“国家主义借国家的笼统名词,打出‘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颇能迷惑一些人,实际上他们搞的是‘外抗苏联,内除共党’的勾当。他们充其量只是帝国主义的灰色工具。”

课堂空气顿时沸腾。秋白眉梢耸起,异常高兴。

晚霞映照在交大校园的一角，柳荫下面，杨之华与活泼漂亮的同学张琴秋坐在石凳上正热烈地讨论什么。秋白夹着皮包从附近小道上匆匆走过，杨之华情不自禁地起立招呼：“瞿老师！”

“你们在讨论问题吗？”

“是的，我们在讨论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是人民群众推动前进的，英雄人物只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英雄与人民犹如鱼水关系，鱼离开了水怎能生存？所以革命者要深入群众中去。你们在学习的同时，要做社会工作。”瞿秋白给她们简洁的解释

“我和琴秋都已被分配到中央妇女部去，在向警予同志领导下工作。”杨之华爽朗地回答。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所谓中央妇女部就是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属妇女部，机关设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

“现在同学们都想些什么呢？”秋白叫他们坐下慢慢说。

张琴秋想了一想，说：“有些同学认为学生不应当参加社会工作，以免荒废学业；另一些人则认为现在形势发展迅猛，社会工作这样紧张，应该把学习放下来。”

杨之华插话说：“这两种论调我都不同意。我们上的是革命大学，学习与工作，理论与实际应当结合才对”。杨之华当时还负责社会学系的墙报编辑，这个问题在他们的墙报上已经展开了辩论。

瞿秋白耐心地解释说：“书是要读的，但不能死读书。书不是为了代替你思想而写的，而是为了帮助你思想而写的。社会

学系怎能离开社会呢？之华同学想得对呀。”

杨之华听了瞿秋白的话，顿时打开了心扉，几乎每个字都留在了心坎里。

这时，杨之华还住在邵力子家里，邵当时是上海大学副校长，后来校长于右任赴广东革命政府任职，他为代校长。邵力子对杨之华像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对她相当器重，工作学习上的事无所不谈。杨之华每天上学或工作回来，就楼上楼下，里里外外忙家务。邵家来了客人，都是她下厨。她烹调出来的菜是地道的浙江风味。有一次，李大钊应邀来上海大学讲学，本来邵力子准备到外面菜馆为李大钊接风洗尘，但瞿秋白提议可在家里宴请。邵力子想起了杨之华，便答应了。那天她办了一桌菜，非常丰盛，出席的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陈望道、施存统等人，他们都为她的高超烹调而赞不绝口。散席时，秋白带点忧郁，对杨之华说：“吃了你做的浙江菜，又使我想起了在杭州的四伯父家。八年前，我一家星散，几个弟妹都在那里呢。”

杨之华在妇女部工作不久，向警予就发现了她特有的胆识和锐气：既敏于思考，又勇于判断，书本知识和工作经验在她的头脑里常常熔炼出智慧火花。很短的时间，她就跑到杨树浦、小沙渡一带女工居住集中的地方搞社会调查，跟女工们结拜姐妹，交知心朋友，了解女工生活状况，扩大妇女运动的范围。有一天，向警予在去汉口之前，交给她一项奇特的使命：向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夫人介绍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她有些胆怯，恐怕讲不好，向警予热情地鼓励她。

并说鲍罗廷已请了一位好翻译。

那天，杨之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鲍罗廷家里去了。当她出现在客厅门口时，意外地看到了秋白，顿时觉得有了依靠，心情便平静下来了。她微笑着对鲍罗廷夫妇说：“我是杨之华，向警予同志叫我来见顾问的。”

鲍罗廷学着中国话说：“欢迎你，请坐。”鲍罗廷夫人和蔼地把杨之华拉到身边沙发上坐下。秋白用俄语同鲍罗廷夫妇交谈着，把他们提出的问题翻译给杨之华听，又指点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来，想一想再慢慢说。”

由于顾问要了解的情况，杨之华比较熟悉，又受到秋白的鼓励，谈话的气氛十分亲切和谐，她的拘束就逐渐消失了，越谈越起劲，秋白满意地微笑着，仔细听她说话，然后翻译给鲍罗廷夫妇听。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杨之华神采飞扬，显得比平时更加从容大方，她掏出手帕擦擦脸上的汗，说道：“中国青年女工在工厂要受买办资本家压迫，回到家里又要受到中国宗法旧礼教的残害。她们参加工潮回家后，往往要被父母兄嫂打骂、羞辱。这些父母说，她们几天不回家，一定在外边轧姘头。这样的女人可以去死了。”

鲍罗廷夫人禁不住“唉”地一声，同情地说：“中国女工多么痛苦不幸啊！”

“有一个女工回家后，父母就给她一条绳，一把刀，要她自己选择。可见‘东方文化’的孝慈贞节实际上已成压迫女工的副工具。”杨之华激愤地发了这通议论。

鲍罗廷若有所思，轻轻拍着秋白的肩膀说：“她对中国宗

法社会的看法，同你的分析很相近。”

秋白微笑地点点头：“之华同志，你的结论呢？”

“我认为中国劳动妇女的革命性很强，不但能反抗买办资本家的压迫，而且能冲破旧家庭的束缚，她们必定能解放自己。女工运动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自己的组织。”

鲍罗廷夫人赠送杨之华一册苏联妇女画报，并介绍了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秋白翻译的时候，唯恐她理解不了，还给她详细地解释，使她初步了解到苏联妇女走过的道路，得到了很多启发和鼓励。

杨之华向鲍罗廷夫人表示谢意，夫人握住之华的手并通过秋白询问道：“你结婚了吗？”

之华神色黯然，答道：“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鲍罗廷夫人问：“孩子的爸爸也在上海工作吗？”

之华苦思良久，才回答：“孩子已经失去爸爸了。”

夫人深表同情地说：“你是一个坚强的中国女性。欢迎你常来。”

杨之华说道：“谢谢！我还在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呢。不过我一定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新女性。”

瞿秋白把一张写有提纲的稿纸递给之华，嘱咐道：“你的介绍，顾问和夫人很满意。你可以按照这提纲，整理起来，适当时候可以发表。要注意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呀。”

杨之华感动地对瞿秋白说：“谢谢老师，如果没有你，今天我会惊慌失措的。”

以前瞿秋白给杨之华的印象是沉静、严肃，平时很少讲话，似乎不太容易接近，通过这次工作上的接触，她改变了这

种印象。以后，杨之华便进入了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等青年共产党员的工作生活圈子里来了。

当时，杨之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有一位同事叫王一知，由于这位同事的关系，杨之华结识了两位她终身难忘的青年女子——同在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的王剑虹和蒋冰之（丁玲），她俩都是王一知多年的好友。而王剑虹则是她所尊敬和仰慕的老师瞿秋白的夫人。其实她们都是当年上海妇女运动中的活跃人物。这年春风送暖时节，浙江女师学生因演话剧《卓文君》，被校方斥为“有伤风化”，酿成了学潮。河北保定女师学生对二十多名教职员被辞退表示不满，围住校长质问，竟被打伤多人，遂激起驱逐校长燕士奇的学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妇女问题研究社、《妇女评论》社、上海大学学生团立即发出了声援宣言。杨之华、王剑虹等都撰文抨击黑暗的教育制度，热情支持女学生的正义斗争。

那天，杨之华和王剑虹在上海大学校园里恰巧相遇，便一起在林荫下散步。王剑虹回忆说：“以前参加上海妇女活动时我们见过面，你记得吗？”杨之华说：“我记得。其实我也很喜欢文学，但是到上海大学时，听说瞿秋白老师主持社会学系，我就报考这个系了。”

王剑虹似乎带点病容，她沉浸在回忆里：“我和冰之跟秋白相识时，他就给我们讲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和高尔基，也讲唐宋元明，他还教我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就是在他的劝导下，我们来到了上海大学文学系。”

杨之华爽朗而羡慕地说：“剑虹，你真幸福！”

王剑虹注视着杨之华美丽的大眼睛，热情地问道：“你的

家庭也很幸福吧！”

杨之华停止了脚步，那双大眼睛满含着忧伤。她的心头蓦然掠过了一阵阴影，她怎能忘却那个凄凉的夜晚，万籁俱寂，她怀抱新生的婴儿坐在床上。室外传来沈玄庐的声音：“太不像话，这个逆子到上海花天酒地，都半年没回家了，快派人把他叫回来。”

大姨太端着一碗桂圆红枣汤，走到杨之华床前：“她爷爷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晓光。他还希望你们再生一个男娃娃呢！”

“不，她的名字叫独伊，我这辈子只生她一个了。”

这时王剑虹心里有点茫然，便关切地问道：“之华，你咋啦？假如有什么事别憋在心上。”

杨之华迟疑地说：“没有，没有什么……”

王剑虹轻轻地咳了几声，好像被之华的情绪感染了似的，亲切地说：“课余的时候到我家来玩吧。秋白是很平易近人的。”

王剑虹原名淑璠，其父王勃山，通诗文，谙医道，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同盟会员，曾任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秘书。王剑虹从小失去母亲，随姑表亲在湖南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与王一知、蒋冰之三人成为不是姐妹，胜似姐妹的同窗好友。五四运动时期她就是全校的领头人物，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九二一年“三姐妹”又进入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行前，她的父亲根据龚自珍《夜坐》中的诗句、“万一禅关砢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将女儿的名字改为剑虹。剑虹思想先进，酷爱文学，颇具文采，那时就参加了

《妇女声》的编辑工作，常在该报发表社评、言论、民情调查及文学作品。但现实是残酷的，她和冰之对当时的平民女校总感到不满足，便决定自己遨游世界，寻找真理，开辟人生的道路。一九二三年夏她们到了南京，真正地由自己来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不管它是天堂还是地狱。

一天，有一个熟人来看她们，这就是在姑娘们眼里平庸委琐而后来却显赫一时的柯庆施。在平民女校时大家都叫他柯怪。他常到她们的宿舍来玩，一坐半天，既谈不出什么理论，也谈不出什么有趣的故事。他在南京时听说姑娘们住在这里，便跑来看望，还雇了一辆马车，请她们去游灵谷寺。接着第二个熟人也来了。这就是施存统（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为日本东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姑娘们都说他是一个老好人，他是最早把她们的友好王一知找去做了爱人的，并且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不久，他们又带来了一个新朋友，在他们平静的生活中吹起了不息的涟漪。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副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而时沉默寡言，但很沉着机警，当可以说几句画龙点睛的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她们几乎从未见过如此有魅力的男人，都在心里猜测着他准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一个才华横溢的多情才子。这个人就是瞿秋白。他是代表中共中央来南京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瞿秋白与王剑虹在南京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王剑虹正当桃李年华，她有一双智慧、犀利、坚定的眼睛，一头黑得发亮的长发，有一腔炽烈的求知欲，更有一颗充满梦幻而渴望爱情的心。瞿秋白给她们讲希腊、罗马，讲文艺复兴，讲俄罗斯文学

史，也讲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从那时起，王剑虹就知道了普希金是“俄国诗的太阳”，是“文学接近生活的第一人”；知道了果戈理开创的“心理分析”的创作方法和“文学为服务社会的工具”的主张；还知道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名著具有“开人类文学史的奇彩”。王剑虹尽情地陶醉在早已向往的文学梦里，也沉醉在倏然出现的爱河里。她倾听着秋白的讲话，不仅感到求知欲的极大满足，特别感到精神上的莫大慰藉，她相信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已经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可是，国共合作的政治形势蒸蒸日上，“天涯倦旅，此时心事良苦”，重任在肩的瞿秋白匆匆告别，把爱关在心里，回上海去了。从此人间又多了一叠上海——南京两地书，内里还夹着令人心倾神摇的诗篇。最初的一首诗是剑虹在暗暗爱上秋白的时候写的，藏在床垫下，冰之发现了，传给秋白的：

他，
回自新气的俄乡。
本有的潇洒更添新的气质，
渊博的才华载回异邦的艺术之仓。
他那学识、气度、形象，
谁不钦慕敬重？
但只能偷偷地在心底收藏！

王剑虹在无名的孤独中终于接受秋白的建议，跟蒋冰之一起回到上海进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十二月间，秋白在广州时，灯下漫忆，浮想联翩，随手写了一首，随信函寄给了王剑

虹：

万郊怒绿斗寒潮，
检点新泥筑旧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
为衔春泥上云梢。

他把生机蓬勃的事业和纯洁无瑕的爱情揉和在一起了。这实在是他的人生憧憬。在给王剑虹的另一封信中，他这样说：恋爱和社会的调和——我不过抽象地说——本是我一生的根本问题。我想它们本来是调和的，我自己不敢信，要问我的“心”，“心”若给我一个承认，我可以壮壮气朝这条路上走去。

一九二四年一月，瞿秋白特别忙。他先跟陈独秀、恽代英和鲍罗廷等出席了中共中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举行的联席会议，讨论共产党和青年团在帮助国民党改组中的方针问题。随后又随着从北京来沪的李大钊等人参加了中共中央临时特别会议，讨论参加国民党“一大”应采取的态度问题。会上组成了一个以李大钊为首的指导小组，瞿秋白是成员之一。就在这当儿，瞿秋白与王剑虹结成伉俪，筑巢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彬兴里三〇六号，蒋冰之就住在过街楼上，两位知心女友又成了邻居。

他们婚后，没有“蜜月”。瞿秋白身负使命踏上列车赴广州去了。他在筹备和参加国民党“一大”以后，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仍留在广州一个时期。爱的火苗在他的心灵深处炽烈地

燃烧着。他不断地写诗，一本又一本，让心的声音自由地倾吐。他不断地给王剑虹写信，几乎每天一封，就像同她灯下漫谈那样。他在信中爱以“梦可”称呼王剑虹，而“梦可”就是法语“我的心”的译音。有两天虽然没有梦，然而做事时却似做梦似的，面前时时刻刻晃着剑虹的影子。他一边问自己，又一边奇怪自己：“没有她，我怎能活！以前没有她，不知怎么过来的，我真不懂了。”他向来不信宗教，然而他知道有宗教的人的心境。每每“祷告”——这是一种奇绝的境界，他有个高高在上的明镜，彻映自己的心灵。失眠中的心灵与遥远的爱神彻夜会话，或许这也是“幸福”吧。

他在信中对梦可说：爱恋未必要计较什么幸福不幸福。爱恋生成是先天的……单只为那“一把辛酸泪”。那“惜惜奇气来袭我心”的意味也就应当爱了——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

他告诉梦可，因为十六年来，自己压制了自己的人性，不敢相信，还值得人家的爱，天地间只有一个人，梦可救了他的人性，方才得到了完整的生命，完美的灵与肉的天然融和。

他更欢呼：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

他简直要把整个的心都掏给自己所爱的人了。他真想“静悄悄”地做一个普遍人，和梦可……天天做着些规律的劳动；晚上——灯黝然，摊着诗篇——谁也不知道的诗篇，……那是多么好啊！

唯有这些最纯真又最奔放的生命潮汐和情感热流，才构筑了人间圣洁而美丽的爱情殿堂。正是这殿堂让饱尝别离之苦的孤独的王剑虹，吮吸着无尽的爱乳汁，营养着瘦弱的身

体。

瞿秋白终于回到上海来了。他和剑虹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剑虹心里日日夜夜充满了他，而他心里的剑虹却常常被那“不可动摇”的工作驱走了。他感到对不起剑虹。他要和剑虹在一起，纵情地吮吸爱的甜蜜和幸福，让她永远沐浴在温馨的爱河里。

这时，在上海大学里的另一位风雨丽人，却在品尝着人间另一种悲酸。这一天，杨之华思念起远在萧山的女儿独伊，感到万分烦恼，便想起王剑虹，不知不觉信步走到彬兴里。她登楼走近秋白书房，听见里面传出委婉低回的昆曲：

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

她伫立在窗外，见里面已有四五个同学，秋白靠着写字台，正在教剑虹和蒋冰之学唱昆剧《牡丹亭·惊梦》。剑虹虽有微恙，精神还好。冰之敞开嗓子刚唱完一句“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剑虹便唱起“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

杨之华凝神地望着，刚想迈步进门，不由地想起了什么，脸色忽地沉郁下来，又转身向楼梯口走去。

她鼓起勇气，走到一家霓虹灯闪烁的大饭店门前，踌躇良久，终于走了进去，在服务台前询问了一下，便上二楼在一间客房门前叩了几下，屋里没有声音，她试着轻轻推开了半扇门，只见衣架上挂着男式西装大衣，皮椅的靠背上却搭着一件艳丽的旗袍。杨之华颓然拉上了门。她怀着绝望的心情，隐约听见楼下舞厅的靡靡之音，面露几分怒色，不由自主地走到旋

转玻璃门前。她一眼看到沈剑龙醉意朦胧地搂着一个舞女酣然翩舞……

杨之华推了一下玻璃门，但又停止了脚步。玻璃门无声地旋转着，反射出光怪陆离的波影。

杨之华走出饭店，不禁想起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脑海里波涛汹涌，自言自语道：“杏花啊，你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但是，从来就不肯向命运示弱的杨之华怎么可能向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折低头呢！她心里升起了女性的尊严和母亲的神圣感，暗下决心，要全身心地投到学习和工作中去，寻找光明的人生之路，实现生命的自我价值，还要把心爱的女儿独伊培养成才……

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杨之华日益迫切地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家庭悲剧的阴影逐渐在这个飘零人的心幕上冲淡。五月五日那天，她参加了上海大学举行的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六周年纪念大会，听了秋白热情洋溢地介绍马克思的报告。报告结束后，秋白和任弼时一起放声高唱《国际歌》，气势磅礴的革命激情使她深深地感动了。那时，《国际歌》刚在中国传播。因为一九二一年耿济之、郑振铎合译的《国际歌》在《小说月报》刊登时，就仿佛诗歌一样，并没有刊排曲谱，鲍狄埃的歌词也就无法唱到社会上去。直到瞿秋白从苏联返国后潜心译出的歌词和曲谱于一九二三年六月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时，《国际歌》才唱向社会。这歌声使杨之华更加决意向神圣的人生目标走去，这歌声还使她坚信尊敬的老师瞿秋白就是她的人生长旅的指路人。这天，杨之华看见秋白迎面走来，正想鼓起勇气向他倾吐自己对党的信仰和追求，却不料秋白先对

她说：“你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支部和我都看过了。因为我最近很忙，组织上要向警予同志与你面谈。下个星期日，你就到向警予同志家里去吧。”

向警予，湖南溆浦人，是一位很有学问，很有能力的女政治家，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一九一八年参加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入党，从中共二大至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她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当时又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助理。她常到上海大学女生宿舍里跟同学们谈心，谈形势，谈学习与工作。杨之华从心里佩服她，尊敬她，感到在她身边工作，是一种幸福。

杨之华日夜盼望的星期日终于来到了。清晨，她坐上电车来到法租界蒲石路，轻快地走向目的地。警予姐的家，她去过不止一次了，但这一次与往常不同，心情格外兴奋和激动。那是一间明亮温馨的屋子，家具摆得很协调，书架上的书五颜六色，窗台上有一株盆栽米兰花，金黄串串、芬芳馥郁。蔡和森因为患气管炎，正靠在床上看书，警予坐在一旁，她想起了杨之华：“和森，你看之华这人怎样？她的遭遇很不幸啊！”和森想了一想：“之华嘛，政治上坚定，理论上进步也很快。她一心想摆脱家庭的束缚是值得同情的。”

话音刚落，杨之华已走到门口。和森笑道：“说起曹操，曹操就到。之华，快请进来。”警予连忙站起来招呼她，心里已猜着几分来意了。

杨之华开门见山地说：“警予姐，秋白同志约我来向你谈我的入党问题。”

警予爽朗地笑着说：“好的，早该这样做了。”她那薄薄的

嘴唇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一对秀丽的眉毛也在额上飞舞着。

杨之华虽很年轻，但对党的追求已有多多年，生活的路也不平坦，今天有满腹的话要倾诉，却不知从何说起。

警予明白她的心情，想让她轻松些，便体贴地说：“你先谈谈上海丝织的情况吧。”

杨之华刚要接上这个话题，熟悉的脚步声引起了她们的注意：瞿秋白斯斯文文地走进来了。

“你来得正好，我跟之华谈谈心，谈谈工作，你是上大支部书记，应当参加呀！”向警予大声地笑着说，随手挪来一把椅子给秋白。

秋白点点头，关切地询问了和森的病情，便过来坐下：“之华先谈吧。过会儿我还要同和森谈几件事呢。”

杨之华心里踏实多了，好像心里有了依靠。她想起上海闸北祥经丝织厂女工被烧死的惨状，那天，这个厂的厂房突然起火，很快烧到了二楼。楼上住着四百多个从乡下招来的女工，大都是十多岁的童工。她们的宿舍像塞满沙丁鱼的罐头，窗上装了铁栅栏，晚上还要落锁。在浓烟和火焰中，女工们无处逃身，相互践踏。等消防队员赶到，砸开门窗救火时，已有一百多人死亡。有的女工怀里还抱着幼儿，有的母女死死拉着手，有的人逃命中还抱着她们唯一的家当——铺盖卷和饭篮子。杨之华说到这里，不禁热泪盈眶。几年前萧山农运领袖李成虎被杀害，给她上了一堂难忘的反压迫的政治课，今天女工们的惨死，更使她记住了民主斗争的神圣意义。

事件发生后，杨之华去丝织厂调查，有几个女工把她带到

“公会”办公室去了。那个地方很讲究，大门外挂着“上海丝厂同业公会”的招牌，会客室里的长桌上，铺着白台布，摆着漂亮的茶具。见到这样的排场，她就疑惑起来，我们的工会怎么会这么阔气呢？这时，一个胖胖的约莫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一身绸衣服，怪模怪样地走了进来，女工见了她，都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称呼她“穆会长”。原来这个“会长”叫穆之英，是上海滩上的女流氓，是资本家雇佣的工贼。这个“公会”根本不是工人自己的组织。

瞿秋白听完杨之华的叙述后说：“事实是深刻的教材，你的调查很有价值。今后你们的工作应该从底下做起，提高工人群众的觉悟，在斗争中揭露工贼的面目，使工人群众不相信他们，而相信党，相信自己的力量。”

靠在床上的蔡和森还介绍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欺骗群众和利用工贼破坏革命斗争的情况，有多少血的教训值得记取。

接着，话题自然转到了杨之华的入党问题。向警予说：“之华你对党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也有很深的感情。你想向组织上讲什么，就敞开心怀谈吧。”

杨之华叙述了个人的经历。也说了对党的信念和为党的事业献身的意志。解剖了自己的思想历程。那从肺腑里流出的心声，使秋白和警予深深地感动了。向警予又亲切地询问她和沈剑龙的婚姻以及独伊的近况。

谈起往事，杨之华虽然含悲痛诉，但没有流泪，没有哭泣。一个人唯有面对磨难和不幸，才能抹去脆弱，显示真正的坚强。一次短促而悲哀的婚姻，她经历过来了，同她相依为命的看来只有自己的女儿，她全部的爱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了。她叙

述得很平静，流露出惊人的自信，她的创伤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去抚平。她说：“我愿凭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走党指引的路，让生命发出自身的光和热。个人的痛苦，虽然伤心，但毕竟太渺小了。”

瞿秋白对于之华感情世界里的自我斗争，实在太熟悉了，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庆幸她的胜利。他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等到心潮平静下来，才对之华说：“你早就是 s. y.，经受过风浪的锻炼。你冲破家庭的束缚，挣脱了不幸的命运，投身革命，是有理想、有勇气的，你还有一颗美丽的心。到上大以来，你能把学习理论和实际锻炼结合得很好。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介绍你入党。”

听到秋白这几句话，向警予深受感动，激动地跳起来，热情地拥抱着之华，鼓励她更坚定更勇敢地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

几天以后，有瞿秋白、向警予、施存统等同志参加的上海大学党支部大会上，通过了接纳杨之华入党的决议。杨之华捧出一颗最虔诚的心，来拥抱人生中新的政治生命的诞生。

正当瞿秋白奔波于上海、广州之间忙于国共合作及理论斗争的紧张日子里，王剑虹的肺病已经确诊，并且愈来愈重。出于无奈，秋白只得把延医求药，护理王剑虹的事托咐给不久前从杭州来上海大学学习的三弟景白。尽管有了家人的照顾，但有些纯属女人的事，毕竟不是景白都能做的。

这时，真正关心王剑虹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杨之华。她经常抽空来看望王剑虹。

那天，王剑虹躺在床上，一阵阵咳嗽使她的额头和鼻尖上沁出一粒粒汗珠。清瘦的面庞依然带着一抹红晕，疲倦的眼神显出无奈的焦虑和几分期待。她手里正翻着一本《唐宋词》。

杨之华坐在小木椅上，就着面盆为剑虹洗涤衣衫。

王剑虹微弱的声音：“之华，我多么想回到文学系的课堂，再听一次沈雁冰（茅盾）先生讲的《奥德赛》、《伊利阿特》，那些远古的异族的极为离奇而又美丽的故事真吸引人。还有邵力子先生讲《易经》、田汉先生讲惠特曼……唉！我最喜欢听俞平伯先生讲宋词，‘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杨之华听了也不觉伤感，便安慰道：“剑虹，别太悲观了，你的病会治好的。人生在世，谁都会遇到一点灾难，终究会过去的。”

王剑虹叹息地说：“之华，我早有一种预感，我会离开秋白而去的。死神已在等候我了，我还能撑到秋白回来吗？”

杨之华心里一阵悲酸，说：“剑虹，你该相信医生的话，你会康复的。秋白老师想该接到信了。不久他就会回来。”

王剑虹指着床头柜上的一封信，说：“他正在辅助孙中山先生，为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忙着呢！你看这封信。”

杨之华打开信封，看见那五彩布纹信笺上面一行行工整清秀的字迹，她们俩都仿佛听见了秋白的殷殷低语：

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

我能得到一点爱，即使只有你所给我的百分之一，我一定也满足了我的梦想，我一定永远躺在爱清的怀中讴歌一世。我恨不能插翅飞回，侍候在你身旁。可是你知道，我却在未得爱情以前，早已接受了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

王剑虹的病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中日益严重起来。时届七月，天气异常闷热，几度持续高烧，最终她不得不住进宝隆医院。

当杨之华匆匆来到内科医师办公室时，一向敬仰秋白的宋医生心情沉重的说：“剑虹女士的肺病已到晚期，不但空洞形成，而且血管已破，加上并发胸膜炎，情形相当危急。她的意志力真够坚强的，如果换了一个人，早已不能支持了。”

杨之华焦急地说：“瞿秋白先生还没有回来，她常常呼唤瞿先生的名字。医生，请务必想想办法吧。”

“尽管世界上至今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但我们一定尽一切力量来为剑虹女士治疗。”宋医生宽慰地说。

杨之华诚挚地恳求道：“医生，我想献出自己的血，只要她能活着。”

宋医生深为感动地说：“这几天是要特别防止大出血。至于输血，还是我们医院想法解决吧。”

这天下午，杨之华来到病房。她坐在病床边注视着王剑虹沉睡的病容。突然剑虹一阵剧咳，侧起身子用手帕捂住嘴，鲜血从手帕里渗透出来。杨之华随即端起痰盂放到剑虹面前，剑虹松开手，殷红的血从嘴里一口一口涌出来。

医生、护士匆忙赶到病房，王剑虹呼吸困难，开始昏迷。宋医生上前观察，听诊一会儿，松开了双手，眉头紧锁，听诊器无力地挂在胸前。

杨之华焦急地俯身握着剑虹的手。王剑虹突然双目微睁，脸上泛起红晕，嘴唇微微颤动着，断断续续吐出最后一句话：“秋白！永别了！”脸上一刹那的红晕变成了苍白。

这时，楼梯上突然响起了脚步声。瞿秋白终于回来了，他奔到王剑虹病床前：“剑虹！剑虹！”

王剑虹似乎听见了秋白的呼唤，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瞿秋白抚尸恸哭，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

王剑虹的棺木浮厝上海四川会馆。向警予前来劝慰守在灵旁的秋白。

秋白满腔哀痛地：“我对不起剑虹，她太不幸了。在她离世之前，我竟不能照顾她，没有分担她一点痛苦。”

向警予不知怎样安慰才好，只说：“你有任务在身，剑虹会谅解你的。”

秋白又说：“多谢之华这些时日一直陪伴她……”

“剑虹待我亲如姐妹，我怎能离开她呢。”杨之华泣不成声，把一封信交给了秋白，那是王剑虹给秋白留下的遗书。

瞿秋白无限深情而怅惘的目光，凝聚在这五彩布纹信笺上，那充盈着生命搏动的一行行字迹，既像千钧重锤，又如绵绵丝语撞击着、抚慰着秋白忏悔的心。

秋白：我生活在你的爱抚之中，虽然只有半年，我已经感到无比地满足了。半年不过是人生激流中

的一片涟漪，然而它却是无比绚丽多彩的一朵浪花。病魔纵然夺走我的生命，但不能夺走我对你的爱。南京莫愁湖上的月夜真令人留恋。你把爱的诗句刻在美丽的雨花石上，让我永远地珍藏。那时，你曾经教我吟诵普希金的诗，此刻我又想起那些美丽真诚的诗句，就让我摘用来向你永诀吧！

我那样温柔、专一地爱过你，
我一点也不愿使你难过悲伤。
愿上帝给你另一个人，
也像我爱你一样。

在走过的短短的人生旅途上，瞿秋白已经两次经受痛失亲人的悲伤。第一次就是母亲的自杀。

那是一九一六年，瞿秋白十七岁，家道衰落多年了，一家人在祠堂里。家中早已典尽卖光，债台高筑。积欠的债单、当票放在一个朱红漆的摆盒内，足有一寸来厚，所有的金石、书画、首饰、质料好的衣服都已变卖，有的橱柜、桌椅、器皿也送到当铺典质了。秋白的父亲瞿世玮，爱读老庄，并善绘画，一直闲居在家，意气消沉。生活的担子全落在秋白的母亲身上。她含辛茹苦，身心交瘁，临近年关，眼看四邻都在购置年货，而自己家里灶冷甑尘。她顿时绝望，便决意自杀。正月初五子夜时分，屋外大雪纷飞，爆竹声声。她在灯下写了几封请亲友代抚儿女的遗书，又将平日爱读的书籍整理放置案头。然后，剥下红火柴头，用桃花纸包成一粒粒小丸，浸了虎骨酒，从容吞服下去。又给秋白的两个妹妹盖好被，在她们熟睡地脸上吻了又

吻，便在自己的床上睡下。天明时，毒性发作，虽延医救治，也已无效，初六下午便含恨离世，年仅四十二岁。当时瞿秋白尚在无锡南门外第七国民小学筹备开学工作，接到父亲催他速回的电报，匆促赶回常州，跑到瞿氏宗祠侧门口看见一堆烧化的纸灰，便知道出了不幸的事了。他在家里刚过母亲的头七，便到无锡那所小学里教书，因为活着的人还要依靠他的月薪度日呢。这年清明节，他回常州祭母，悲痛地写下了一首悼母诗：

亲到贫时不算亲，
蓝衫添得泪痕新；
饥寒此日无人管，
落上灵前爱子身。

当初热恋时，秋白把幼时的困苦，母亲的自杀，一家的飘零向剑虹讲述的时候，剑虹紧紧地抱着他，为他的过去嘤嘤啜泣，那时，剑虹便知道他是得了一种怎样的天赋了，他是怎样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姊妹亲友而决然西去的了。

在生命的自然需求与感情世界里，瞿秋白也已经两次经受爱的幻灭的痛苦。第一次就是他与表妹君怡的长别。

瞿秋白在中学时，每逢寒暑假差不多都要随母亲去贤庄大姑母家和外祖家。贤庄周围环绕着一条清澈碧透而蜿蜒曲折的小河，人们叫它环溪。种着禾稼的广阔田野，开满野花的小山岗，衬托着溪边的绿柳白杨，真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环溪的清流禾稼”，引起过瞿秋白许多奇思遐想，抚慰过他的忧伤

的心灵。

大姑母家在贤庄是一户望门大族，住在贤庄中部，黑漆大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宅院前后四进，称乐在堂，西院还建了一个小型园林，有花厅、船厅、荷花池，一座两丈多高的湖石假山，很是幽雅别致。瞿秋白每次来贤庄，都住在第四进厢楼上。他和表姐妹们一起游玩、读书、绘画、谈诗词，说故事，一改平日少年老成，多愁善感的情态，变得愉快活泼，幽默风趣。在仙仙、明明、珊珊、纤纤四个表姐妹中，纤纤生得特别端庄秀丽，天资聪颖，是贤庄的美人，她名叫君怡，比秋白小一岁。他俩常常一起研读李长吉歌诗，吟颂常州诗人赵翼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等诗句。有时一同来到溪边，采野花，编花环，青梅竹马，倾慕情深。这给少年秋白带来了青春的烦恼，含情脉脉的初恋。后来秋白的母亲自杀，不久一家星散，成了“破落户的飘零子弟”的秋白，在秋天离家赴武汉前夕，专程到贤庄来告别，赠给纤纤折扇等物以为留念，还画了一幅山水画赠给纤纤，画上录谢灵运诗：“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雷愧云浮，栖州作渊沉。”下题：“丙辰孟秋临鹿村居士杂寓谢灵运诗为题以应纤哥雅属，末属“秋白瞿爽”。一九二〇年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回忆少年时的生活，写道：“我幼时虽有慈母的抚育怜爱；虽有江南风物，清山秀水，松江的鲈鱼，西乡的菘菜，为我营养；虽有豆棚瓜架草虫的天籁，晓风残月诗人的新意，怡悦我的性情；虽亦有耳鬓厮磨啾啾情话，亦即亦离的恋爱，安慰我的心灵，良朋密友，有情意的亲戚，温情厚意的抚恤，——现在都成一梦了。

瞿秋白的少年同窗羊牧之后来有一首诗便是有感于这少

男少女的故事而作：

可爱环溪溪水清，贤庄少女实倾城。
青梅竹马如无意，团扇佳人似有情。
尝想青庐能偿愿，却邻白屋未成名。
临行信物频频赠，总恨蓬山隔岭横。

秋白和剑虹新婚时，剑虹就爱听这些故事。她睁着美丽动人的大眼睛，默默地听着秋白诉说，觉得有味极了，也为他惋惜。剑虹还爱听他讲普希金诗的美丽，宋词的豪放和婉约……他们就常常这样消磨一个晚上，要到钟打一点二点的时候，他看见她睡意袭来，眼皮无力了，才轻轻地吻着她，将她抱上床去。

第二章 生命的伴侣

剑虹死后，又成了飘零人的瞿秋白，肩负着庄严使命，带着巨大的悲痛，带着革命者身不由己的苦衷，又踏上了广州列车，去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和工作。在那些会议上，讨论了日见尖锐的国共合作的纠纷问题，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弹劾案，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草案》，还通过了《北伐宣言》和本营移驻韶关宣言。九月，他才风尘仆仆回到魂牵梦萦的上海。

在法国梧桐树的浓荫下面，慕尔鸣路变得漫长而苍凉。

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他拖着沉重的步子，仿佛走了半年之久才回到彬兴里那凄凉的住所。如今，“人去楼空”，落日的余晖静静地洒在窗前的写字台

上。只有剑虹的照片含笑地陪伴着他。这照片是他们定情时剑虹送给他的。冥冥中他觉得剑虹还活着，正在出神地听他讲常州诗人黄仲则的诗，“惨惨柴门风雪夜……”，他们在宋教仁公园散步赏月，剑虹问他心里想着什么，问他为什么流泪，问他为什么“月圆必阙”，他们忘情地在人面前也接起吻来了，他恨不得大声告诉全世界，他们终于得到了一种怎样珍贵的爱情和幸福。……然而，他走了，他丢下了受疾病折磨的剑虹。爱神终于惩罚他，把剑虹带走了，带到另一个安宁美丽的世界去了。

现在，剑虹在他的心里已是天上的人儿，是云中的仙女，而他这个献身政治生活的人却始终在凡间人世，只有那颗属于爱情的心，永远跟随着剑虹飘向了天空。他在那张照片背面，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你的魂儿我的心……”。他用一块白绸巾把这张照片包藏了起来。

这天，他接到蒋冰之从北京的来信。冰之在信里谈剑虹的真挚的感情，谈她文学上的天才，谈她可惜的早殇；冰之还在信里一泻对秋白的“怨”。冰之说：我和剑虹都是听你的话来到上海大学的。还记得南京莫愁湖畔吗？是你说，剑虹呵，结束这东飘西荡的生活吧，跟冰之一同来上海大学学文学吧。而今，她在哪里！

秋白看到这里，禁不住悲怆地仰天长叹……

冰之又说：虽然是肺病夺去了她如花的生命，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加之高明的医生说是怀孕的反应，你又奔忙于广州、上海之间，顾不上她，她的病在孤独中就这样给耽误了。

内心的深疚和痛楚使秋白如受灵魂的拷问，他自言自语道：“冰之说得对！我对不起剑虹，是我将爱情亵渎了，我不值得她深爱。我祈求天上的剑虹原谅我。只有天上的剑虹她能理解我。秋白的自责是超过了人世间所有的诅咒的。他自己知道，他是那样真诚地爱着他的剑虹的，他也不能不承认他又是如此之快地摧残了剑虹那纯真的性灵和美的梦想。纵然他知道天上的剑虹会宽容他，而他却不能原谅自己。然而他毕竟不能忘怀另一种人生观念的铁律，为了给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实现“共产主义人间化”，他终于回到了不可动摇的事业上，抛却了生命的自然需求，把忏悔和悲伤化作另一种生命潜力。

瞿秋白在上海肩负着很多重要工作，但他为上海大学所花的心血却是巨大的。他从广州回上海后就以巨缘笔名在《向导》上发表了《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压迫下的孙中山政府》，随后便到上海大学向师生们做了几次报告。他详细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广东革命政府在英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势力的压迫下面临着危机的局面，指出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他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反对共产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主张，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等活动的本质揭露得入木三分；同时他还阐明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他那充满洞察力和号召力的报告，极大地提高了师生们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和警觉。

杨之华回到宿舍，耳畔依旧回响着秋白讲话的声音。她想起秋白赴广州前对她说的：“个人的不幸是不能妨碍工作的。如今能医治我内心创伤的，只有忘我的工作。”而她一个年轻

的平凡的母亲，为什么心灵深处总积淀着一份忧伤呢！她凭窗远眺，仿佛看见自己的女儿独伊在沈玄庐大姨太怀抱里伸着手，向她哭喊着“妈！妈！”

这时，张琴秋走进来，对着之华的背影，轻轻地说：“之华，又在想念你的独伊吗？”

杨之华没有回答，琴秋走到她的身边，把一封信举到她面前，高声叫道：“那位先生又给你来信了！”

杨之华把琴秋的手推开，无奈地坐到床沿上。

张琴秋劝道：“你总得看一下吧，我帮你写封回信，叫他别想吃天鹅肉了。”

杨之华不得不明说：“别胡闹，那是英文系一个同学，上次我已经拒绝了他的求爱。”她拆开信读到最后，心里茫茫然。那信上说，“我不能理解你的一副铁石心肠，难道你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吗？”

杨之华心里像被重锤击了一下，不由地想道：天啊！我反对独身主义，但命运注定了我是一个独身者，唉！我也是一个不尽职的妈妈。

这年十月，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解决目前政局危机的途径，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也不是几个元老的善后会议，而是人民团体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国民会议运动很快在全国兴起，各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国民会议促成会。党为了推进国民会议运动，决定在双十节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名叫“国民大会”。当时杨之华意气风发，投入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筹备工作，后来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从广州北上，路过上海稍事停留，上海各界群众在环

龙路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恽代英致了欢迎词，杨之华代表各界妇女发表了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革命主张的演说，力陈妇女界参加国民会议运动的要求，并双手呈上公函，孙中山微笑地接过公函，向杨之华点点头，露出赞许的目光。但是形势发展中出现的逆流，正如瞿秋白所预见所提醒的那样。国民党右派早在策划利用这次群众大会为军阀卢永祥作伥，勾结帝国主义，收买地痞流氓，打击革命力量。

双十节前几天，中共上海大学支部召开会议，由全国学生总会的负责人汇报筹备国民大会的情况，并通报国民党右派正在进行的阴谋活动。瞿秋白听完汇报后，指示大家密切注意国民党右派的动向，随时揭穿他们的阴谋，团结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布置了具体任务，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

双十节到了，秋高气爽，万里无云。中午，杨之华和几个同学随瞿秋白到河南路桥北堍天后宫参加国民大会。途中得到情报，要瞿秋白临时先回家去等候信息。秋白不依，一辆电车已快到站，他坚决地说：“上大师生都能去，我当然也能去。走！我们一道上车。”

杨之华拦住秋白，同样坚决地说：“这是组织意见，请你先回去，还有更重要的工作等待你去做呢！”

又一辆电车停下，杨之华向秋白挥挥手，便和几个同学一起跳上车。瞿秋白无奈，赶到车窗前，招招手说：“之华，你和同学们都要当心啊！”

杨之华走进拥挤的会场时，师生们正在会场里散发传单，不少地痞流氓尖声怪调地叫嚷着，抢夺、撕毁传单，但在群众

和纠察队员的制止下，他们暂时还不敢过份放肆。宣布大会开始以后，担任主席的国民党右派喻育之在台上摇头晃脑地说：“今日国民大会，本良心之主张，不为党派所利用……”他还鼓吹军阀卢永祥是“拥护正义的”，“应该支持卢永祥作战……”会场上爆发了愤怒的责问声和口号声。一群地痞流氓开始疯狂地殴打呼口号的群众，纠察队员上前阻止，也遭到殴打，这时，全国学生总会主任郭春华跳上台去讲话，义正辞严地要求大会主席维持会场秩序，制止暴徒行凶，并大声对群众说：“今天的国民大会，就是要揭露一切军阀和帝国主义……”会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喻育之恼羞成怒，从座位上跳起来，唾沫横飞，反诬群众“扰乱会场”，蛮横无理地阻止郭春华讲话。另一个国民党右派便乘机指挥暴徒殴打郭春华。黄仁等几个纠察队员挺身上台制止时，黄仁被暴徒推落台下，又遭到台下暴徒的拳打脚踢，身负重伤。警察不捕行凶的暴徒，却把被打的十多人抓起来关到附近一间房子里。群众被激怒了，和同学们一起打破门窗，把遭到毒打的人们抢救了出来。杨之华跑到黄仁身边，见他已神志不清，奄奄一息了，心里又气又急，赶紧找来车子，和几个同学把黄仁送到宝隆医院去救治。

这天晚上，杨之华受党支部的委派，到宝隆医院去看望黄仁，医生告诉她，黄仁的生命已无法挽救了。她怀着满腔悲愤，默默地坐在黄仁床边，决定留下来看护他。

深夜，瞿秋白冒着危险来到宝隆医院病房。除了护士偶尔走过病房发出轻微的脚步声，四周一片沉寂。秋白在黯淡的灯光下，看见杨之华正在病床前，给黄仁轻轻擦去从鼻孔和嘴角

流出的鲜血。秋白走近病床，俯下身去，摸摸黄仁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察看受伤的躯体，轻声地呼唤黄仁的名字，然而黄仁双眼紧闭，已经不能答应了。

秋白沉思着，之华眼里含着泪花，两人脉管里的热血同时沸腾着。秋白对之华说：“不要气，只要记。”他告诉之华党已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声讨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罪行。他现在就要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明天派人来安排黄仁的后事。说完，脱下自己的大衣，留给之华，低声地说：“下半夜，天气会冷的，你披上吧。”随即悄悄地离开了病房。

“天后宫事件”震动了上海滩，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很多中间群众也投入了斗争的行列。上海大学一些原来“不问政治”的同学也走上了街头。成千上万人参加了上海大学等三十余个团体发起举行的黄仁同志追悼会。陈望道担任大会主席，瞿秋白同沈玄庐、恽代英等人，参加了追悼会，并发表了演说。《民国日报》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会场演说极悲壮激昂之至，闻者色动焉。”

黄仁被害的惨剧在上海大学更激起了轩然大波，以社会学系共产党员为代表的左派跟英文系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化。社会学系学生反对英文系主任何世桢，英文系学生反对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结果，瞿秋白和何世桢同时辞职离开了上海大学。由施存统和周越然分别担任社会学系和英文学系主任。但瞿秋白以后仍不时到上海大学给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做政治报告，有时参加党支部会议，传达和贯彻党中央的决定，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还经常同施存统、蒋光慈等人到上海大学学生阳翰笙等人的宿舍，谈时局，谈艺术，谈

人生，往往被同学们包围住。他们之间不讲师道尊严，完全是同志式和朋友式的关系。有问题不能理解时，就相互平等地辩论，气氛很热烈。有时大家一起饮酒，边饮边谈。瞿秋白还教大家唱《国际歌》，师生关系非常亲切和谐。

瞿秋白与杨之华之间一种师生加朋友的情谊，随着时间的脚步，已在两个孤独的心房里悄悄地升华，命运的默契无形中将两个飘零人紧锁在一起了。

面对群众如火如荼的风暴，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和军阀淞沪警察厅相勾结，开始秘密地搜捕共产党人。上海大学和慕鸣路彬兴里三〇六号秋白的住所都遭到他们的搜查。他们从上海大学校舍搜查出不少马列主义书籍和宣传共产主义的报刊，便传讯了代理校长邵力子。那天杨之华以上海大学学生代表身份陪同邵力子去受审。工部局宣称，上海大学宣传赤化，煽动工人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罚款五千银元。杨之华走上讲台为邵力子辩护，她义正词严，驳得宣判台上的人瞠目结舌，无言可对，只好当场改判罚金二千银元，并慌忙地宣布终审结束。

瞿秋白从此转入地下活动，隐居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三层楼的一个阁楼上。这是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的家里。组织上指定了少数同志负责同秋白进行联系。杨之华是其中之一。这时，她已是新近选举产生的上海大学学生会的执行委员。

那天，杨之华走进阁楼时，秋白正伏在桌上起草文件。之华把上海大学和他的住所被搜查，他保存的《新青年》、《向导》

等书刊和许多俄文书籍被焚的事告诉了秋白。秋白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在窄小的阁楼里踱来踱去。窗外马路上囚车的警笛声呼啸而过，他胸中的愤怒终于化成平静的语言：“书可以被烧掉，革命思想是烧不掉的。”他告诉之华，只是失去那些俄文书籍，的确感到有些可惜。因为那是他在苏俄时，把购买定量供应的食糖的钱节省下来，跑了很多书店才买来的。当杨之华说到她在法庭上为邵力子辩护时，秋白不禁开怀大笑，称赞她胆识过人。

杨之华瞥见墙角一个盆里，堆积着秋白换下的衣服，便卷起袖子动手洗起来，秋白前去阻拦，之华诚恳地说：“你生活上有什么事，尽可以叫我做，余下时间好来考虑大事呀！”

“不，我一个人生活很简单，可以照顾自己。”

“唉！如果剑虹健在的话，该多好啊！”

“她已去到另一个世界了，我的心也跟随她去了。”

这时，也许是好奇，也许是尊敬，迫使之华说出了心中的疑团：“我听警予姐说，你内心的创伤很深。从母亲的自尽到剑虹的病故，你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可是，并没有人觉察得出来。”

“是的，母亲的死使我离井背乡，开始追求人生的直理，剑虹的死却使我失去了为爱情而跳动的心。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我这颗为党而跳动、为事业而跳动的心。”

事实确是这样。在同志们心目中，秋白只知道工作；只知道斗争，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为亡母和剑虹流过眼泪了。之华想到这里，不禁为他难过，为他祝愿：“秋白同志，人生的道路长着呢，你会重新获得幸福的。”

之华把衣衫晒起来，收拾好文件，就向秋白告别了。

杨之华匆匆回到上海大学，走进了自修室。在疏朗的学生中间，她坐在一张扶手椅上，有时翻书，有时思考，有时在稿纸上疾书。

张琴秋走进来，坐在之华座旁，看见之华面前的稿纸上工整地写着《上海妇女运动》，题目下一行行秀气的字迹。

张琴秋故作惊讶地：“之华，你这篇文章怎么还没写好啊？”

杨之华认真地说：“这是中央妇女部要的一篇文章。不但要有材料，特别要有观点，这都写到第三稿了。”

“谈起妇女运动，你的实际经验很丰富嘛！”

“要把实际经验上升到理论，这就要马列主义水平了。”

“那你再看看列宁关于妇女运动的论著，不行吗？”

杨之华凝神地咬着笔杆，慢慢地说出：“我想……我想找……”

“噢！我知道了。你想找瞿先生谈谈，对吗？”

杨之华莞尔一笑。

星期天早晨，杨之华来到了小阁楼。

秋白正在全神贯注地挥毫作画。杨之华轻轻地走到他身旁，叫了一声：“秋白同志！”她把一只菜篮子放在墙边，里面有活鲫鱼、蘑菇、豆腐和小青菜。

秋白抬起头来随和地说：“你来得很巧。今天给孙中山先生的顾问鲍罗廷写了一封长信，你帮我到邮局寄走。现在上海执行部没有负责人员，我建议立即派廖仲恺或汪清卫来。”杨之华从怀里取出文件，秋白看了一下，放在一边。高兴地说：

“之华，来看，这画你喜欢吗？”

杨之华几乎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她仔细端详着这幅画，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滔滔江流，浪花飞溅，江岸一行秋林，青山隐隐，一叶扁舟逆流而上。哎，这小船上怎么只见一个人影呢？”

“我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书时，也画过这样一幅山水画。那时我是一个彷徨的少年，过着痛苦、愁惨的生活，我只想随着江流，漂向远方……”

杨之华无限神往地：“你终于漂到了遥远的异国‘俄’乡，做了追求光明的使者。”

这时，秋白画完最后几笔，之华连忙拿起秋白的印章，秋白把它盖在画幅左下角，趁兴书写一行：之华同志雅属。之华顿时心里漾起一股暖流。秋白抬头看见了那只小菜篮，便走去从篮里抓起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鲫鱼，笑着说：“之华，谢谢你买来这些菜，今天在我这里吃饭吧。”

杨之华干净利索地忙碌了一阵，好像完成了一件作品。

餐桌上，摆着一碗蘑菇豆腐，一碗奶油鲫鱼汤，一碗小青菜。这两个一起工作、战斗了一年的友人坐下来时，一下子竟像陌生人那样，各自咀嚼着饭菜，默默无言地相视着。

之华就要走了，在楼梯口，秋白扶着栏杆，目送之华下楼，叮嘱说：“《上海妇女运动》这篇文章是要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的。你写得很有灵气。我讲的意见，你考虑一下，再修改修改就可以定稿了。”

这天，瞿秋白和杨之华一起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会后，由之华护送秋白回住处。

此时，已是傍晚，他们在一个小店里吃了馄饨，便信步走去，不知不觉到了北四川路口。卢永祥的大刀队在盘查行人，杨之华随机应变，挽起秋白的胳膊，装成一对情侣，亲密而大方地走过。秋白低声说：“警予看了你那篇文章，不知有多高兴！”

杨之华真挚地说：“我很感谢你，那是你修改的水平高。”

秋白说：“你向来不愿别人‘包办’，我只是在你的基础上，照你的思路，做些纠正和提高罢了。说真的，我很喜欢你的文章，你写东西的那种风格总是要引起我的激情。”

那时，杨之华常常在《中国妇女》、《妇女周报》以及《民国日报·妇女评论》上发表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瞿秋白、向警予都是最早发现她的才华的人。杨之华感觉到秋白对她别有一种真情在，只有秋白发现了她身上散发的真正的女人的气息。而她每读秋白的作品，听他的讲话，心里就会产生一种不可言喻的力量，同他在一起，精神就有了保障，离开了他，思想就没有了主宰。她可以反对一切人的“包办”，却时时渴望着秋白更多的关心和指点。她记得秋白告诉过她，他愿意帮助她系统地读些世界文学名著，学点俄文，指导她写文章，……也许他的出现，将会改变她的人生呢。

他们走过一段沉默的路程，之华想起了什么，便睁大了眼睛，天真的问道：“警予姐说，你近来变了，有时讨论问题，好像思想飞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是吗？”

“我丝毫没有变，我仍然是我。不过从前，我只将我的一面，对爱情逃避的一面，给人们看了。现在有些不同罢了。”

他们走到兴业里那座小楼旁，已是夜阑人静，月光如水，

树影扶疏。如果能再倾心交谈一会儿多好啊。可是之华停止了脚步：“送你平安到家了，我的任务已完成，该回去了。”

“让我也送送你。”

“天已晚了，望你注意休息吧。”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把脚步移动一下。那会说话的眼光都落在对方的眸子上，一动也不动。在这一刹那，两个失去了爱情和家庭的共产党人不约而同地重新萌生起对爱情和家庭的渴望。在静默中，他们各自听到了自己的心灵的跳动。

秋白在心里呼喊：你的一双眸子将我心中死去的那部分又唤醒了。

之华的心在叹息：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到我的命运里呢！

自从这次无言的握别以后，秋白在小阁楼里，再也没有听到之华的脚步声。为秋白传送文件的一个青年人捎来之华的信。之华在信中希望秋白结束孤独的生活，重获生命的伴侣。但是她说：“我不配，我是已经失去爱的权利的人，命运注定我是一个独身者。为了让你得到安静，把我淡忘，我决定暂时回故乡去。”这封信非但没有给秋白带来安静，反而促使他要分担之华的痛苦。他想，一个丈夫的背叛决不应使妻子终身失去爱的权利。他已分明意识到自己决不是怜悯之华，而是全身心地爱她，愿以自己的一生保护她，支持她，与她同命运。爱情不再受理性的压抑，它终于冲破了瞿秋白心理上的防线。正像当年马克思初恋时所说：“我可以毫不带浪漫主义意味地对你说，我已经从头到脚陷进了情网，而且陷得极深。”这样，他便决定把心中的一切告诉之华，帮助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共建壮丽的人生。他相信歌德曾经说过的，在钟情的男女中间存在

一种特别强大的磁力，是不可抗拒的；他也相信佛家诠释的那种“缘分”。一种非凡的激情、勇气和力量溶进了他的周身，他战胜了自我。也许他会遭到世俗观念的嘲讽，然而，他一心一意向爱神指引的路走去。

金秋的萧山村郊，风光旖旎，远岭如云，近山似锦，泉水潺潺，红枫与绿竹相间。杨之华手里拿着《我的大学》在钱塘江畔漫步。水乡的秋色似乎使她有些陶醉，然而惆怅、烦恼还不时袭来。

这时，之华的哥哥杨葆青从田畦间匆匆地朝着沙滩跑过来：“妹妹，来客人啦！”

“谁？”

“是位先生，说是来找你的。”

“什么模样？”

“怎么说呢？瘦长个儿，穿着长衫、布鞋，额角很宽，眉目清秀，戴着一副细边眼镜。”

杨之华心头一热：“别说啦，我知道了。”

他们快步地往回走，走不多远，就看见了秋白正向他们走来。杨之华迎上去，微笑着把瞿秋白介绍给她的哥哥。

杨葆青笑着说：“欢迎瞿先生来做客。现在正是钱塘秋潮最为壮观的时节。”

杨之华：“哥哥你先回去，我陪瞿先生走走。”

瞿秋白望着杨葆青离去的背影，亲切地对之华说：“令兄真是个大好人。”

杨之华跟秋白一道走向沙滩，只见碧空云浮，江潮滚滚，

如卷霜雪。好久好久，他们谁也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秋白的情绪稍稍镇定一些，终于低声地说：“之华，为什么不告而别！回上海去吧，革命需要你，我也不能离开你。”

杨之华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秋白，你忘记我吧！我是不值得你爱的，我的青春已经死去了。爱情对于我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秋白无限深情地说：“我们的未来还长着呢。”

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沙滩上坐下来。涛声由远而近。

杨之华望着翱翔于江潮上的飞鸟，无奈地说：“你怎么还不了解，我只有灵魂是自由的，我的身子还套着锁链，我能给你的，只有痛苦，而没有幸福。所以我必须离开你。”她的心就像破碎了似的。

“你完全可以摆脱家庭的束缚，你与沈剑龙的关系最终会得到合理的解决，社会舆论一定会同情你的。你为什么甘愿向命运屈服呢？”

“我不配爱人，也不配人爱。爱对于我是那样遥远，我是没法得到它的。因为我不仅是戴着婚姻枷锁的女人，我还是一个做了母亲的女人。我爱独伊，你能爱独伊吗？”

“假如我不爱独伊，我对你的爱就是虚伪的。我爱你，自然也爱独伊。在我心中，你和独伊是溶为一体的。我一定把她当成亲生的女儿。”秋白似乎想把自己的心解剖开来呈现于之华面前。

“诚然，我深深地爱你，但我不愿你为了这爱而受到损害。”

“我承认，在你面前，我是‘爱之囚奴’，我不怕任何鄙夷的

目光和背后的讪笑，因为这爱是纯洁无瑕的。”

杨之华站了起来：“别再谈这折磨人的爱情了！到那边去吧。”她扬起手：“看那浪花就是我的梦想。”说着，就和秋白向钱塘江畔走去……

秋白的追求，是为了爱；之华的回避，更是为了爱。如果之华与沈剑龙的关系不能解决，这爱必将变成永久的痛苦。为了求得正确的解决途径，秋白和之华终于把一切告诉了葆青，葆青踌躇良久，说：“岁月荏苒，该是开诚相见的时候了。”

沈剑龙在后花园里接待了杨葆青，他听说之华回到乡下，便说：“沈家的大门是敞开的，可以自由地走，也可以自由地回来。”

杨葆青忙说：“之华已走上社会，不会回来了。你们的关系如何处理才好？”

“生活的道路各人可以自己选择，互不干涉就是了。”

葆青转了一话题说：“寒舍来了一位朋友，请学长明日光临，共叙友谊。”

“不知是谁？”

“瞿秋白先生。”

沈剑龙一怔，沉思良久，渐渐露出笑容：“何必等待明天，我很想认识认识这位才子，今天就去拜访，岂不更好。”

“不，不，还是请明天光临吧。之华的事你冷静地想想，见了面，总要谈谈吧，何必如此仓促！”

“不必，兄既相邀，何必推迟，现在就去吧。”沈剑龙冲进房里，一会儿，一身西装，戴着礼帽，拉着发窘的杨葆青一起走出了花园后门。

杨葆青家堂屋和东西厢房都已古老，院子里有一口井，还有一个小花坛，摆着几块湖石，秋葵花盛开着，倒也赏心悦目。堂屋里的陈设古色古香，堂中挂着一幅《松鹤图》，两旁是著名书法家孙星衍的篆书对联：“水能性淡为吾友。竹解心虚是我师”。秋白站在一个条幅前欣赏郑板桥的《竹石图》。沈剑龙飘然而至，昂然跨进屋里，正在摘豆芽的杨之华陡然一怔，瞿秋白面露惊异之色，旋即微笑地看着来客。沈剑龙取下礼帽，高声地招呼说：“这位想必是瞿秋白先生，仰慕已久，鄙人沈剑龙今天有幸得瞻风采。”

瞿秋白伸过手来回答说：“见到你，由衷地高兴。”

杨葆青气喘吁吁地赶来，一见两人在握手，便笑呵呵地叫着：“二位仁兄请坐，之华，快沏茶呀。”

沈剑龙摆摆手：“不用了，我想陪瞿先生出外散散步，看看萧山秋色，怎样？”

秋白道：“谢谢美意。”随即与沈剑龙双双走出院门口的竹篱笆。葆青与之华面面相觑，都有些担心似的。

其实，他们一边观光，一边畅谈，从五四运动谈到国共合作，从诗经、楚辞谈到明清小说，沈剑龙由衷地钦佩秋白的真知灼见，只觉得相见恨晚。当然，他听到之华在上海大学的情形，忽然想到才子佳人的故事，对秋白不免由谅解而嫉妒了。然而反思自己的碌碌无为，也觉得无可奈何，他对之华回乡的用意所在，也掂量得一清二楚了。

杨葆青邀请他们来到后院小竹园，兄妹俩陪着瞿秋白、沈剑龙围着竹制的小方桌随意而坐。只见翠竹森森，随风摇曳；水满秋池，圆荷泻露，秋光一片，好不沁人心脾。

杨葆青在寒暄中做开场白：“今日有幸，蒙二位光临，共叙友谊。”

沈剑龙坦然道：“剑龙从小性子爽直，不说违心之言。我很早读过瞿先生著作，那时还和之华说过，瞿先生人格学问令人钦佩。今日领教，获益非浅。”

瞿秋白十分谦让：“令尊沈老当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出过力，又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剑龙兄几年前不也参加过萧山农运么。”

沈剑龙惭愧地：“剑龙自甘落伍，随波逐流，不必提了。”

杨葆青见机插话说：“剑龙，你思想开通，想不见怪。我很关心你和之华的事呢！”

沈剑龙望望杨之华，默默不语。

杨之华决然说道：“作为现代女性，我要投身革命，追求人生的理想和价值。剑龙总会支持吧。”

沈剑龙不得已地：“鸿鹄有千里之志，剑龙已是失去理想的人，自知不配。不过，关系问题呢，还是从长计议吧。”

杨之华脸色陡变，脱口而出：“剑龙！你……”

杨葆青急忙向之华示意，抢先说：“这事好商议，只要以诚相待，总会有一个圆满的解决办法的。”

沈剑龙不动声色：“我理解之华。志不同，道不合，是痛苦的。但此事关系我的一家，恕我不能擅自作主。”

瞿秋白、杨之华颇觉意外，不禁相视而望。沈剑龙扫视他俩，若有所悟，沉吟半晌，说：“如果瞿先生不弃，明天请诸位光临舍下，把酒畅叙，尊意如何？”

杨之华面颊红红地注视着秋白，瞿秋白若有所思。

杨葆青趁势站起身来：“好！好！我和瞿先生理应回访。现在就请瞿先生和剑龙兄在敝舍午饭，请到前面入席吧。”

沈剑龙回到家里，思前想后，不知如何决断才好。想起他父亲正巧在家，上山看枫叶去了。沈剑龙上到半山腰，便看见父亲伫立于枫林前，沈剑龙走到他的身旁，他似见非见，随手摘下几片枫叶，叹息道：“这枫林一年一度醉，待到它清醒之时，却已经凋零了。”

沈剑龙有几分敬畏地：“爸爸今天独有这样好的兴致！”

“噢！你还没有走，我以为你已在红霞舞厅欣赏华贵的音乐呢。”

“不，爸爸。孩儿对声色歌舞已不感兴趣了。”

“那么，你现在对什么感兴趣呢？”

“孩儿现在潜心于研究佛学禅宗，以摆脱尘世和人事的纷扰，求得心灵的解脱。”

“这样说，你有出世之想了。老夫大半生涯沉浮于政治漩涡之中，至今还未能找到你说的这种精神出路。”

“爸爸，暂时不谈这个。有一件紧要的事要跟爸爸聊聊。”

“那好。爸爸过去对你态度粗暴，也是出于爱子心切。很久没有谈话了，你说有什么紧要的事呀？”

“就是我跟杨之华的关系问题。”

“你们是新式婚姻，当时在浙江也是开风气之先吧。应当维持下去才是。我一直教训你，要振作起来。”

“我对政治早已厌倦，且从来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而杨之华已是共产主义信徒，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了。”

“这都是你的所作所为把她气走的。”沈玄庐不觉怒火中

烧。

儿子也不甘让步：“爸爸！她投考上海大学，不是你赞成的吗！”

沈玄庐叹一口气：“嗯。”就迈步下山了。沈剑龙跟在后面。

沈剑龙缓一口气说：“我想，我也曾爱过之华，事到如今，就好聚好散吧。”

“她又来找你啦？她有新朋友了吗？”沈玄庐不耐烦地。

“是的。我已请他们明天到家里来。采取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一纠葛。”

沈玄庐惊讶地停住了脚步：“唉！都怪我教子无方。她那位新朋友，你知道是谁吗？”

“瞿秋白。”

“哼！好一个赤色风流才子！”老头子愤愤然拂袖而去。

次日上午，瞿秋白在杨葆青兄妹陪同下，回访了沈玄庐父子。午饭以后，他们来到葡萄架下就座。女佣从宅内端来西式饮料。

沈玄庐侃侃而论：“瞿秋白先生名闻全国，是中共杰出人才，令人钦佩。今天招待不周，深感歉意。之华是一个新女性，人品脱俗，智慧出众。我们沈家的缘分有限，剑龙是不会难为你的。”

杨葆青有礼貌地说：“沈公思想开明，声誉遐迩。今天借此机会感谢你对之华的教诲。”

沈玄庐淡淡一笑：“这些已是昨日黄花了。你们今天在这儿聚会，我有很多感想，当年剑龙、之华结婚，就是在这儿举行的茶话会，可称移风易俗，今天难得相聚，倒是很有意义的纪

念。”说完，他就起身，点点头：“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谈吧，我少陪了。”

杨之华看着沈玄庐离去，深感委屈：“沈伯父也是个开明之士，可是不理解，在这家庭里，我只是一个木偶。独伊这孩子是怎么生下来的？剑龙，你知道吗？这几年你一直贪恋着上海的歌星、舞女，瞒着父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劝你拉你，你也不回头。我不能跟着你毁灭。”

瞿秋白劝解地说：“之华别生气。现实社会黑暗到极点，官场腐败，民不聊生，难免令人绝望，剑龙如此，也是有苦衷的。希望你们相互理解。”

沈剑龙坦率地：“不能怪之华，她是不幸的。我是一个浪荡颓废的人，社会腐烂，一无净土，只觉浮生如梦，回头又能如何呢！这两年我没有去找之华，因为我没有勇气，我也很内疚。我们之间人生观、理想、追求已没有剩下多少共同之处了。”

瞿秋白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剑龙兄，爱情如不与事业结合，则必将枯萎。请你谅解，我爱之华，我愿以我的一生支持她，保护她。但是，之华的命运还要期待剑龙兄的决定啊！”

沈剑龙感动地：“我同家父说过，我与之华已经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夫妻关系已经名存实亡，维持下去，又会有什么结局呢！我不愿再给之华以痛苦，应该还给她自由。这样也可以减轻良心对我的谴责。”

沈剑龙的声音愈来愈低，而秋白与之华的眼睛几乎同时都湿润了。

他们在感情暗暗交溶的沉默中各自越过了心灵的渡口。

杨葆青的心顷刻放宽了，他平静地说：“剑龙这样做，出于

一片至诚，通情达理，我和之华不会忘记你的。”

杨之华擦擦眼泪：“爱情不在，友谊犹存。”

沈剑龙站起来：“秋白兄，你们在革命生涯中，别忘记剑龙在今天曾经祝福过你们。”

瞿秋白激动地说：“剑龙兄，我的家在常州早已破败了。那是一个祠堂，我没有家庭，但我愿你光临寒舍，以表寸心。”

“恭敬不如从命。”

这时，杨葆青活跃起来：“剑龙，我喜爱的古筝呢，日薄西山了，请弹一首《出水莲》吧。”

沈剑龙抱着古筝，弹奏《出水莲》，他们都在优美的琴声里勾起了心里的怀念和向往。

在常州青果巷，瞿秋白兴致勃勃，陪着沈剑龙、杨之华一道登上天香楼，素雅的陈设，温馨的气氛，给人无限的遐思。瞿秋白不禁想起往事，他说：“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就生在这个楼上。我母亲是常州东门外大岸村人，颇有旧学根底，我六岁时，她就教我古诗文词。”那时，瞿母一边做针线，一边听着少年秋白背诵：“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瞿母放下针线问道：“爽儿，养蚕的姑娘上城归来，为什么泪满巾呢？”秋白答道：“姑娘是辛苦喂蚕的人，穿不着绸，而到城里看到那些不养蚕的阔人满身都穿着绸的，当然心里不平了。”瞿母抚着秋白头发，欣慰地说：“读书能悟出其中的道理，才是真读书。”

到了常州玄妙观，瞿秋白指着红梅阁，向沈剑龙、杨之华介绍了它的由来。这红梅阁原名飞霞楼，始建于元代元贞年

间。相传宋代龚子彬充军到云南，他带回几枝梅花移植在此，飞霞楼也就改名红梅阁了。

瞿秋白一行登上红梅阁古春轩，昂首观赏壁上的一幅《玄妙观全图》：绿树荫里，梅花点点，高阁耸立，山门边红墙一带，系着一只驴子在吃草。

瞿秋白指着壁上的画说：“这是家父十年前所作。家父画学王石谷，后来飘泊到山东，便以教画为生。我幼时从父学过山水画，不过，未得要领而终。”

沈剑龙赞叹地：“瞿先生多才多艺，实出子家教有方啊！”

杨之华问道：“听说你上学时，常到红梅阁来温习功课，是吗？”

“是的。那时，我常常和张太雷等志趣相投的同学到这里欣赏红梅翠竹，小河假山，在幽静的角落，诵习诗词，纵谈古今。所以，我到苏俄时还往往想起常州红梅阁的翠竹野花呢！”

最后他们来到瞿氏宗祠后翻轩，这就是秋白的老家。

宗祠门前蹲踞着两尊石狮子，门楣上方一块汉白玉上刻着六个篆书大字：“城西瞿氏宗祠。”宗祠最后三间平房旁边，就是后翻轩。轩东墙下置一小床，正中窗下一张小方桌，放着一盏煤油灯，壁上还悬挂一张旧地图，一支玉屏箫，一把月琴，还有两张方凳放在小桌两旁。这就是秋白小时的卧室和读书之所。自从母亲自尽以后，一家星散，东飘西零，就没有人在这祠堂里住了。

杨之华问道：“秋白，你是哪一年离开家乡的？”

“我十七岁那一年。我家因社会地位的动摇而破产了，我母亲因为‘穷’，被驱逐出宇宙之外，我父亲也只是这‘穷’的遗

物。残酷的社会，好像严厉的算术教授，给了我一个极难的天文学算题，我牢锁在心灵的监狱里。于是决然忍心舍弃老父及兄弟姐妹而西去了。”

杨之华说：“我读《饿乡纪程》的时候，就被你的悲惨家世感动了。”

瞿秋白叹息地说：“那时我家里大小八口，衣物典尽，卖无可卖，债务累累，每逢年关，债主催迫，母亲实在无法度日呀！”

沈剑龙真挚地：“秋白兄，你的少年时代多么不幸啊！但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会幸福的。”

瞿秋白爽朗地说：“个人的幸福总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国家民族的事业，个人的幸福也就不存在了。”

沈剑龙感叹地说：“身为凡夫俗子，虽能理解仁兄的高论，却不能身体力行，只能抱愧终身了。”他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的玉屏箫，便说：“听说你在莫斯科曾以东方的洞箫，感动了苏俄的许多诗人。你愿意为我吹一曲吗？”

瞿秋白想了一想，取下玉屏箫，对杨之华说：“剑龙兄就要离开我们了，我吹一支《阳关曲》，以示惜别之意。”

箫声低回不绝，听者的脑海里都油然幻化出秋白在莫斯科中秋聚餐会上为诗人们吹箫的形影。

箫声停止了，大家依然静静地坐着。杨之华掏出手帕，轻轻地擦去脸上的泪水。

沈剑龙沉重地站起身来，握住瞿秋白的手：“我就要告别了，祝你们幸福。我给你留下一件纪念品，这是鄙人常州之行的本意，请务必收下。”

瞿秋白答道：“衷心地感谢你，剑龙兄，请向令尊致候，后会有期。”

瞿秋白、杨之华陪送沈剑龙走过花坛，便相互道别了。

他俩回到房间。瞿秋白打开剑龙留下的纸包，原来是一张六寸照片：沈剑龙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旁边题了“鲜花献佛”四字，并有剑龙签名。

瞿秋白轻轻叹了一口气：“剑龙尽管自甘沉沦了，不过，他的情操还是高尚的。”

杨之华点点头：“当然，对一个人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但是，爱情必须是忠诚而纯洁的。”

瞿秋白温存地：“常州之行，我想你一定更了解我了。”

“不，它使我的爱更深、更深了！”杨之华说着便无限柔情地倾倒在秋白的怀里。秋白的吻，从她的秀发落到她的小手上。然而，转瞬间，她脸上又黯然失神了。她说：“秋白，我不能没有独伊。如果仅仅得到你的爱，而失去了独伊，我是决不会幸福的。”

瞿秋白无限诚挚地：“好爱爱！希望你相信我，我一定和你一样爱我们的独伊。小小的蓓蕾，生命的花朵，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培育她成长。”

在瞿秋白、杨之华回到上海以后，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四版下面赫然出现了三则启事：

杨之华、沈剑龙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秋白、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沈剑龙、瞿秋白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那天，沈玄庐在书斋里，看着这张报，对沈剑龙说：“你看这三则启事，轰动了沪浙知识界。在民国十三年，像我沈家这样开明，中国之大，恐怕还找不到第二家吧。不过，他们决不要得寸进尺，晓光这孩子是沈家的骨肉，决不可让他们带走。”

秋白和之华婚后的新居是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十二号，一座普通的树木掩映的两层楼上。瞿秋白又有了一个新家了。房间不大，却比较精致，依然摆着三架装满精装书籍的书橱，中间夹杂着几摞线装书，一张宽大的弹簧床，两张小沙发，写字台上有一盆盛开的白菊花，和台灯的粉红色纱罩相映成趣，还有一套比较讲究的文房四宝，晚上就被台灯的微光笼罩着。

这天早晨，之华刚刚梳洗完毕，秋白把一枚金别针别在之华的衣襟上。在金别针上秋白亲手镶刻了“赠我生命的伴侣”。之华温存地握住秋白的手，轻轻地吻了一下说：“我过去没有敢梦想过幸福，现在我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生命的伴侣”从此永远铭刻在他俩心上。直到秋白系狱于长汀，就义前不仅写过《忆内》（夜思千重恋旧游），而且在《未成稿目录》中写下“生命的伴侣”一题。

之华坐在沙发里，秋白坐在扶手上。秋白抚摩着之华的手说：“好爱爱，你是我生活的组织者，幸福之神。我们要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养成全新的精神和身体。幸福的人必定是全新的人。”

“你不是说要去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球，还要跳舞吗？”

“对！我还要教你念俄文，读诗词，写作品，让我们在两人世界里尽情遨游。”

房间里只有一小块空地。秋白常在这块空地上打圈子踱步，或者坐在椅子上深深地吸着烟，有时拿起笔来咬着笔端。这种神情，之华见惯了，知道他在思考问题，全神贯注在写作之中，也就不去惊动他。秋白写文章是不打草稿的，在思想成熟以后，提笔就写，一动手写，就像瀑布一样直泻下来。之华常常坐在他身边，一边看书，一边陪着他，而他总是叫之华先去休息。有一次，之华清早起来，看见台上一篇《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这就是秋白在一天一夜内一气呵成的。秋白盛赞了孙中山，说：“在反动潮流很厉害的时期”，“孙中山却没有一刻妥协，没有一刻忘记革命”。

那时候，中共以上海大学为基础，在上海各区开办了好些工人夜校。杨之华当时已同向警予等十八人被推举为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委员。为了了解和发动工人，她也常到工人夜校讲课，还担任一个夜校的庶务。瞿秋白非常重视工人夜校这个阵地，常常要之华把了解到的情况原原本本告诉她，他说：“第一手材料很重要。”杨之华和上大的同学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是不能解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就去请教秋白，秋白虽在工作非常紧张的时候，也一定停下来答复问题。

杨之华虽然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但心灵深处总是惦念着独伊，只要见到谁家的幼儿，独伊的影子就闪现在心头。那天，秋白回家时，之华正在为独伊缝制衣服，脸上显出忧郁的神情。秋白走到她身旁，安慰地说：“独伊需要母爱，我们一定要把她接回来，她是我们家庭的重要成员。”

之华含泪地说：“不知独伊生活得怎样，我想做两件衣服，下乡去看她。”

“我们想想办法，让她离开沈家，把她接到身边来。我愿意做她的好爸爸。”

几天以后，之华向组织上请过假，就到了萧山，一口气跑到沈家。她来到沈玄庐的书房，只见这个老公公突然沉下脸来说：“孩子属于沈家，你已脱离沈家，我不能让你去看她。”这时的沈玄庐已完全变了。他倒向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共产党。

在厨房门口，之华见到那位心善的大姨太。这个老太太体谅之华的心情，便说：“别作声，我带你去。”她领着之华悄悄地穿过几个庭院，推开一间侧屋门，终于见到了心爱的女儿独伊，独伊脸上闪着两颗黑黑的眼珠，正在摆弄玩具，这些玩具都是之华从上海买回去的。

之华轻轻抚摩着她的头，说：“女儿，妈妈来看你了。”

孩子天真地说：“妈妈，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

“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

“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

之华把新衣给独伊换上，把独伊紧紧抱在怀里，母亲的泪水落在女儿的脸上。

大姨太向之华使了一下眼色，之华亲了亲独伊，便忍痛离开了。独伊瞪着惊疑的眼睛望着妈妈离去的背影。

之华白天工作繁忙，下班回家后，又为念着女儿而难过。一次假日，秋白和之华来到萧山母亲家里，他们托人去沈家把独伊抱出来，留下一封书信。他们站在一座小山上，焦急地等

待着，终于望见独伊的身影出现在小路上，大姨太跟在后边。可是，独伊刚跑到母亲面前，之华奔过去把她抱到怀里，独伊的两条小胳膊紧紧地搂住之华的脖子，突然两个大汉向她们奔来，一阵风似的把独伊抢走了。独伊在大汉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我要妈妈！”

之华忍不住哭起来了。秋白挽着她的手臂，沿河边走着，一路上默默无语，只有呢喃细语的春燕，河边孤单的野花仿佛在分担他俩的痛苦。之华这时见到秋白流下了眼泪。

顺泰里十一号的邻居，就是沈雁冰、孔德沚夫妇，他们曾是秋白与之华婚礼上最活跃的人物。沈雁冰当年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了。那时他在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和郑振铎一道主编《小说月报》，是这里的党支部书记。秋白同他交往甚密，经常在一起谈文学、政治及党内问题。瞿秋白还常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在沈雁冰家里召开的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会议。孔德沚还是杨之华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杨之华。

沈雁冰一度还有一个秘密身份，做着中央的交通工作。这事还引出了一个极生动的故事。秋白讲这故事时，之华忍俊不禁。那时沈雁冰几乎每天都收到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台展。同事们都猜测雁冰在外面可能有个把情人。有一天，这样的信又来了。郑振铎第一个忍不住了，把信偷拆开来一看，乖乖不得了！原来是中共福州地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所谓钟英者，中央之谐音也。

这天，沈雁冰、孔德沚夫妇到隔壁来看望秋白、之华。他们

带来了几本商务印书馆刚出版的《赤都心史》。

秋白高兴地把书翻开，一面看着，一面说：“《赤都心史》写我在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是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

雁冰笑着说：“《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这两个书名就像一副对联，可见足下的潇洒和才华。这两本书对于出生在本世纪初，在旧社会经历过大半生涯的知识分子会有很大的启发。”

杨之华给他们沏茶，孔德沚叫她别忙，便问道：“独伊近况怎样？”

杨之华说：“还在萧山呢，不知沈家什么时候让她回来呢？”

雁冰气愤地说：“沈玄庐真不象话，当年反封建的气味一点也没有了。我倒要找他评评理。”

之华说：“我每想到女儿关在那阴森的房子里，心就痛得皱缩起来。”

秋白叹口气说：“孩子失去母爱，身心健康都被摧残了。我们还得跟沈玄庐打交道，尽快把独伊接回来。”

德沚劝慰之华保重身体，别太伤心，雁冰一定会找沈玄庐谈的。

秋白和雁冰又谈起曹靖华从苏联寄来的译文《三姊妹》（契诃夫作），雁冰告诉秋白，郑振铎已把它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即将出版。这时屋里又充满了热烈愉悦的气氛。

秋白、之华白天大都在外面忙碌，有时晚上也回来得很迟。那天深夜，他们一道从工人夜校回到家里，已十点了。秋

白偶然向窗外望去，只见空中一轮皎月，“银汉无声转玉盘”，便想起许多伤感的往事，要和之华诉说，但当他看见之华忧郁的眼光，心头便浮现出独伊在那大汉手里哭喊妈妈的悲凉情景。他体贴地坐到之华身边说：“你不是读过《安娜·卡列尼娜》这部书吗？你过去在婚姻上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亲生的孩子。这一点与安娜有些相同，但是你所处的时代环境已完全不同了。我们一定能让你回到我们的怀抱里。”之华感动地依偎在秋白怀里。

正在这时，随着轻轻的叩门声，杨葆青带着独伊出现在门口。之华几步奔向前去，把独伊抱了进来。

葆青慢条斯理地说：“沈老先生总算想通了，体谅做母亲的心，剑龙也照顾不了孩子。以后逢年过节，希望独伊也到沈家过几天。”

之华说：“这样，我自然是同意的。”

秋白高兴地说：“心，我一定比他的生父还负责任地培养她。”

之华对女儿说：“孩子，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吗？”

“知道，我叫独伊。”孩子穿着妈妈从上海寄去的花衣，露着天真可爱的笑脸。之华说：“对，你叫独伊。他，就是你的爸爸。你以后就叫瞿独伊。”

秋白抱住独伊亲了又亲，说：“亲爱的女儿，我要教你写字、画画、唱歌，永远不分离了。”他又把独伊抱到之华面前，说：“小小蓓蕾，需要你的爱和我的爱培养她成长，她就是我们的未来。”

独伊的脸贴在秋白肩上，喊着：“爸爸，我的好爸爸。”

已是午夜时分，秋白又在灯下聚精会神地镌刻着一颗印章。之华催他休息，他说：“独伊已回到身边，你现在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呢！我要把一件铭刻着我们完美的爱情的纪念品赠给你，永远留在你身边。”

第二天早晨，朝霞映照，花影在窗前摇曳，房间里蒙上一层从未有过的欢情和暖意，之华站在写字台前，在一张宣纸上用力按下那颗印章，她深情地凝视着。独伊叫着：“好妈妈，让我看。”

一双小手拿着这张宣纸，上面显示出四个鲜红、古朴而清秀的字：秋之白^华（花）。这是他们在秋天里播种的爱情的永恒象征。之华想起秋白少时写的一首吟菊诗：

今岁花开盛，
栽宜白玉盆；
只缘秋色淡，
无处觅霜痕。

之华心里漾起了浓浓的幸福感；也许在他的命运里，从小就注定了他与秋花的不解之缘，哪怕它会蒙上点点霜痕！

第三章 比翼齐飞的海燕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以如何加强领导日益高涨的工人革命运动为主题。瞿秋白担任大会政治决议草案审查小组组长，参与起草大会文件，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他特别清醒地强调了国民革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思想。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进入了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陈独秀被推举为中央总书记。

二月上旬，上海小沙渡日商内外棉十一个纱厂数万名工人，因日本监工殴打一个疲乏至极的夜班女童工，导致总同盟罢工。瞿秋白同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向警予等参加了二月罢工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杨之华也参加了这次大

罢工。她同邓中夏等人到潭子湾工人俱乐部，和全国总工会的李立三一起工作。在群众大会上，邓中夏、杨之华都讲了话，成立了“纱厂工会”，组织了工人纠察队。那时，瞿秋白最喜欢杨之华穿起工人服装到工人群众中开展工作，感到这样才更有革命性和浪漫性，他把之华紧紧地抱在怀里，说：“我们的爱情就是建筑在这里。”后来，杨之华跟他谈起自己在大罢工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精神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内心感触很深。瞿秋白笑着说：“你比在上海大学时，又有进步了。你才知道工人阶级中有无数的天才，在斗争中，他们是最聪明最坚强的。”

这次罢工取得了部分的胜利，日本资本家不得不接受工人提出的不准打人，不准无故开除工人，不准拖延发放工资等条件。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不久就背弃了已承诺的复工条件，依旧任意开除工人。工人群众极为气愤，就举行了第二次罢工。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枪杀了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友十余人。被激怒了的工人、学生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并在潭子湾举行了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抗议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五月三十日，上海三千多学生和部分工人组成演讲队，分头到租界的闹区演讲，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并进行募捐，支援罢工。杨之华和孔德沚很早就到了南京路。在先施公司门前，之华踏上了一条板凳，向着围拢上来的人们演讲起来。下午老闸捕房的巡捕大批出动，逮捕工人和学生，仅上海大学学生被捕的就有二十多人，秋白的三弟景白也被捕了。工人、学生、市民群众义愤填膺，怒火冲天，潮水般地涌向南京路，包围了老闸路英国巡捕

房,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和学生。可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早有预谋,他们在马路上布满了岗哨,巡捕房门前武装巡捕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当群众怒潮汹涌向前,不可阻挡时,捕头爱伏逊竟下令开枪镇压徒手群众,南京路顿时成了帝国主义的屠杀场,爱国志士纷纷倒卧血泊中,灰色的马路被染得紫红。上海大学学生会执委何秉彝等十多人当场惨遭杀害。受伤者无数,还有五十多人被捕。

杨之华亲眼目睹了这场屠杀。她满腔悲愤,跑回宝通路顺泰里十二号家里,李立三也来了。他们以激愤的心情向秋白报告了这场惨案。秋白来回踱着步,手里的香烟也掐了,抑制着愤怒,说:“这是帝国主义直接进攻中国革命的罪恶挑衅,他们想用屠杀革命群众的手段,来扑灭中国革命运动,我们必须扩大革命的进攻,来粉碎他们的进攻。”

六月一日,上海全市开始了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震动中外的五卅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上海大学在五卅运动中是一个斗争的堡垒,因而被帝国主义视为眼中钉。英国陆战队很快就占领了这所大学。他们捣毁设备,践踏书籍和学生的行李。但学生们不屈不挠地坚持着斗争,在党的领导下,许多学生深入工厂和工人居住区,同工人们打成一片,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帝斗争。杨之华被派到浦东区组织工人群众,工作很紧张。她从工人群众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她在同志面前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来,大家说:之华不仅是做一个贤妻就了事的女子,她是一个有独立性的,能努力开展工作的人。但她始终敬秋白为老师,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晚上就向秋白请教。秋白很有兴致地听她讲工作情况和工

人的思想反映,鼓励她在工人群众中吸取养分。秋白说:“知识分子需要向工人学习,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实际锻炼的过程。同工人一起进行斗争,就会体会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而个人只是大机器中的一颗小螺丝钉。”秋白还指导她怎样在工人中进行建党工作,说:“我们党内工人党员太少了。在当前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要抓住培养和发展工人党员的好时机。选择对象,不要光看表面,要看实际觉悟。”杨之华在宣传教育工作中,碰到工人们提出的问题很多,有些她作了解答,有的自己解释不了的,晚上回家后就问秋白,秋白不是简单地给她解答这些问题,而是先要她谈谈自己的认识,然后帮助她进一步理解这些问题,还给她指定一些必读书或参考书,甚至指明有关段落,折上书角,教她学习以后,每天在本子上写好简要的解答。秋白说:“这样日积月累,稍加整理,就成了一本通俗讲话。”

六月四日创刊的《热血日报》,是党指导五卅运动的有力的舆论工具。编辑部设在闸北宝昌路(今象山路口)一间客堂里,陈设很简朴,中间放着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着几条长板凳。秋白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办这张报纸上。发刊辞是他写的,短短三百来字,却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各期社论除了陈独秀、沈泽民写过几篇外,其余大多是他写的。他还用“热”、“血”、“沸”、“腾”、“了”的笔名写了二十多篇短文。他每天都要审改文稿,接待来访者,有时编辑、校对工作他都要亲手做。当时天气炎热,他经常忙得满头大汗。之华见到这番情景,既兴奋,又有几分担忧,而他却笑着对之华说:“办报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更有直接效果,我从来喜欢搞报纸。你要帮助我办两件

事：一是工人有哪些意见、要求、疑难，要及时告诉我；二是在工人中组织通讯员。还有，办报要值夜班，有时还要参加中央的一些会议。晚上不能回家，你可要放心呀！”之华那双圆圆的清澈的大眼睛望着他，心里不知有多少温柔体贴却没有说出来。只是叫他“千万保重身体”。

其实，杨之华自己在工作中也是奋不顾身的游行、演说、教工人唱国际歌，从来不怕敌人的搜捕。她在做女工工作时，为了避免巡捕和便衣警察的搜查，经常约女工在玉佛寺或财神庙前等候，一起扮作香客，坐在庙门两旁长石凳上谈话。这些寺庙香火兴旺，人潮如流，就遮住了敌人的耳目。有的同志打趣说：“杨之华，你做了‘善男信女了’。”她也风趣地回答说：“是啊，做个叛逆的信女，也不错么。”

那天黄昏时分，杨之华走在南码头一带，听见不远处，有一对青年男女时而对唱，时而合唱，隐约可闻，那是悲愤激昂的《五卅小调》：

五色国旗当中飘，
五月三十起风潮。
打死了许多同胞。
哎呀，哎呀，
同胞们大家醒呀！
.....

五卅惨案未结束，
汉口沙面又杀人，
帝国主义真强暴。

哎呀，哎呀，
我们同胞要记牢！

.....

之华满腔热血在沸腾，她望着黄浦江潮，听得涛声怒吼。正在这时，传来一阵粗犷的喊声：“有人投江了，快救人啊！”

晚上，之华回到家里，对秋白说：“我经过南码头，看见一位青年因北京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压制群众运动，感到国家前途无望，悲愤投江，幸而被摆渡的人救了上来。”

秋白说：“唉，上海、浙江一带为五卅惨案而痛不欲生、忧愤自杀的事件已发生十多起了。其中大多是学生，也有工人、商人。他们的绝命书总写着为国悲愤，宁蹈海以随先烈，一片丹心真可贵呀！但这样，如何能救国呢！所以，《热血日报》的宣传引导工作实在太重要了。”

《热血日报》深受群众喜爱，读者甚至自动捐钱给报社。它的发行面相当广泛，“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因而引起帝国主义者和奉系军阀的仇视，第二十四期出版后，租界巡捕房就封闭了承印的明星印刷厂，《热血日报》遂被迫停刊。但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怒潮，却是任何反动势力也压制不了的。

不久，瞿秋白同李大钊、陈延年、任弼时、谭平山等十二人参加了一九二六年二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特别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明确地提出了当前党的任务：从各方面积极推动广州革命政府进行北伐，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瞿秋白还为中央起草了有

关的通告

瞿秋白从北京回到上海以后,就病倒了。这次肺病发作不同寻常,来势凶险。因为去年十月他在北京开中共中央扩大执委会时,肺结核又一次开始活动。几个月来,他时常吐血,却不顾自己的身体,带病坚持工作。他总是对之华说:“别为我担忧,我一直是一面与敌人斗争,一面同病魔斗争,还不是坚持过来了。”以致在国民革命形势日趋错综复杂,需要党的干部全力投入斗争的紧张时刻,党中央不得不下决心让瞿秋白住院治疗。

那天,杨之华接到中央同志的委托,要她强迫秋白进医院休息。当秋白听到中央的这个命令时,他笑了,深切地感激同志们对他的关心。他对之华说:“很想有一个较安静的地方来实现我的心愿:针对当前中国革命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编译几本值得参考的丛书。”他高兴地拿起一只小提箱,把需要用的书籍、文具放在里面。

党为了秋白的安全,特请了一位可靠的医生,设法在宝隆医院找了一间单人病房。秋白住院以后,之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在头两个星期中,他完全遵照医生的嘱咐躺在床上休息。但他很想了解社会思想现状,每次见面都要之华回答他一些问题。他还开了一张书单,要之华到四马路上的书铺、书摊上寻找。之华将他需要的书买来,他几个晚上就读完了。后来,之华几乎隔一天就要到四马路跑一回书摊、书铺。到了第三个星期,当之华到医院里看他的时候,他就像在家里一样,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一页一页地写起来了。医生劝他说:“瞿先生,目前治疗肺结核,主要靠休息、营养和新鲜空气,药物是辅助

性的。所以你不能这样一股劲地写作。”他很理解医生的劝告。但他一想起当前的斗争任务来，又怎能躺得住呢！

他忘却自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病人。他把订好的工作计划拿给之华看，对之华说：“中国共产党党员连我在内，对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得太少了。要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非读几本书不可。我想将俄国革命运动史分成四部分编译出来……这些都可作为中国革命的参考，非常重要的参考。”他越讲越兴奋，抚摸着俄文原著用坚决的口吻说：“如果客观环境允许的话，我必定在最短期间完成这个心愿。”之华听着他的话，心里激动不已，说：“这个计划对我们这些知识贫乏的青年有莫大的帮助，我一定尽可能帮助你完成这个计划。”她想了一想，又说：“你现在的任务是治疗你的病，同志们不允许你不关心自己的身体。你的这个计划回到家里再说吧。”秋白凝视着窗外，用低沉的声音对之华说：“形势实在逼人呀！我和彭述之等人在革命政策上有不同的观点，我想首先要编译这部俄国革命运动史，因此我先译‘农民问题’这一部分。因为在中国革命中，谁能赢得农民，谁就能主宰中国之命运。”他手指着译稿，笑着说：“这就是医治我们和我们同志的最上等的贵重的药品呀！”从此以后，之华每天去医院，都带回他生产的“贵重药品”。当然，带回他的手稿是之华最愉快的事，也是一桩使她担心的事。他写作的速度真使人难以相信，虽然是带病工作，在两三个星期内已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编译了三分之二。在这期间，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过了两天，广州又发生了“三·二〇”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开始露出头角。瞿秋白预感到国共合作行将破裂，国民党右派已在“想取得革命

方面的军事势力”。愤怒和深思使他无论如何也躺不下去，他在病房里握管不止。在他住院治疗的四个月里，之华眼看着他写下了《北京屠杀后国民革命之前途》、《北京屠杀后之中国民族的仁爱问题》以及《中国革命中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等十多篇政论。他已深深地感到北京屠杀更急切地逼得民众不得不力求武装反抗；他也不得不急切地思考着建立人民武装人民战争的策略、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了。他还写了总题为《战壕断语》的十四则杂文。之华来到病房里，有时看到他困倦地伏在桌上，不禁心酸，眼泪都淌了出来。她想，他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人，他的意志如铁一样坚，思想如丝一样细，他工作起来可以日夜不休息，不顾疾病在身，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关于革命的事，他是多么值得之华去爱啊！

瞿秋白的肺病渐趋平缓、尚未痊愈之时，他便决定出院了。杨之华再也劝不住他。因为，党在一九二六年的历史使命在他心中像一团烈火燃烧起来。他早已想过，如果要反抗“三一八”以来的反动逆流，只有号召发动革命战争，猛力地向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军阀攻袭。他对杨之华说：“广州政府的北伐，实在应当是北京屠杀后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革命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但是六月，中共中央在宣传部召开会议讨论北伐问题时，发生了争论。陈独秀反对北伐，彭述之附和。张国焘反对陈独秀的意见。在这种局面下，瞿秋白的发言就具有千钧之力了。他认为北伐战争刻不容缓。党应当坚强地担负起这异常艰巨的历史责任，积极地赞助并主动地参加北伐战争。七月一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北伐宣

言》，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接着，中共中央四届三次扩大会议在上海开了一星期，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瞿秋白又做了系统的发言。

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九二七年，是“比翼齐飞的海燕”迎接考验的一年，也是“瞿秋白向金字塔顶奋力攀登的一年”。

这年元旦，国民政府命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在此执行职权。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却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于一月七日，在南昌自立中央，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并作出决定：“国民政府于本月十八日开始在南昌办公。”

刚过两月，赣州惨案就发生了。蒋介石唆使特务暴徒杀害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又派武装部队扫平了南昌市国民党左派党部；接着，九江惨案、安庆惨案相继发生。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当夜停泊在长江下关江面的英、美、日、法、意等国军舰炮轰石头城南京，造成死伤两千人的“南京惨案”。当时担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宣传工作的诗人郭沫若愤怒了，挥毫写了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当北伐军在二月间占领杭州、嘉兴时，党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进攻，决定发动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上海总工会于二月十九日晨发布了总同盟罢工令，当天就有十五万人参加了罢工。杨之华来到上海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出席了全

市积极分子会议。会后，大家分组到指定地段散发传单。杨之华一组十个人，负责西门一带。当她路过十字街头时，发现那里有十几个孙传芳的大刀队员，其中一个正凶神恶煞似地挥起钢刀，向一个跪在地上的市民砍去。旁边还有两具无头尸体。她立即去寻找小组里的其他同志，通知他们赶快避开大刀队，但有几个同志怎么也找不到。无奈，她强忍着一腔愤懑回到法租界望志路五丰里五号，正在家里写文件的瞿秋白，放下笔，听了她报告上述情况后，非常关心一起散发传单的那几位同志的安全，便郑重地嘱咐她再去寻找，然后他又赶到中央机关去报告。

起义于二十二日下午五点五十五分由停泊在高昌庙黄浦江面上同情革命的健康、建威两艘军舰向沪西发炮开始。工人群众英勇地展开了夺取武器的战斗，向军警防线和岗哨袭击。瞿秋白坐镇在拉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冠华里一座三楼二层暴动指挥所。下半夜，周恩来赶到指挥所了解暴动情况。由于预定接应起义的北伐军驻嘉兴的白崇禧部按兵不动，加上准备工作不足，指挥失调，起义于二月二十四日以失败而告终。

当晚，秋白和之华去参加中央和江浙区委联席会议。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作了开场白。罗亦农、赵世炎报告了起义的情况和问题以后，有几个同志发了言。陈独秀右手撑着头，双眉锁着，似在深深地思索。这时秋白对这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和下次起义的问题作了系统的发言。秋白虽然带几分病容，但他说话时是如何地郑重，他的语句里含蓄着多少的热情、多少的胆量。之华看着他说话的神情，领会他的语言里包含的真理，心里不禁生起几分骄傲来。秋白回到家里，连夜撰写了《对上海

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于二十四日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意见书》毫不掩饰地指出党在领导工作中的严重失误，是导致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这是瞿秋白感到痛心疾首的事。本来在起义前，中共上海区委召开了活动分子代表大会，会前，瞿秋白为了防止和纠正右倾，贯彻正确路线，争取起义的胜利，曾正式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要求参加大会并作报告。但陈独秀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反而在复信中讥讽他的自告奋勇：“你有‘病’，不准你去了。”而派了彭述之去向大会作报告。结果工人罢工了，却等候大资产阶级的援助，等候李宝章部下兵变，甚至工人中对总罢工之目的大半莫名其妙。瞿秋白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策略，客观上简直是卖阶级的策略。从这时到三月中旬，每天晚上，瞿秋白都要熬夜，他同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尹宽、彭述之、周恩来等到中央秘密机关，参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紧迫棘手的军事、工人运动、党务、宣传以及派工人代表团见白崇禧等问题。他很晚才回家。杨之华依旧在等候他。她一面担心着他的身体如何承受这繁重的工作；一面却惊叹着，他那清瘦的躯体内竟蕴涵着无涯际的充沛的精力。回想他温柔体贴时，就像一个天真多情的诗人，在他讲话或讨论时，就像知识渊博、才思泉涌的大学者一样。如今武装斗争迫在眉睫，他真像足智多谋无所畏惧的军事指挥员呢。当他微笑着跨进家门，对她似乎露出歉意时，她真想紧紧地拥抱住他，用自己的爱去注入他生命的活力。

三月中旬，为准备召开中共“五大”，瞿秋白奉命到武汉去了。这时，上海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工人们紧张地准备着，

在室内秘密练习打枪，分区研究进攻计划，侦察攻击地点，核对人员装备……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和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上海工人于三月二十一日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成功，占领了被直鲁军阀控制的上海。当时在武汉的瞿秋白听到消息后异常兴奋，他说：“我们应当感谢恩来、亦农、世炎等同志，我们更应该感谢上海的工人阶级。是他们在上海的上空，树起了红旗，为我党添了光辉。”

杨之华在上海和工人群众一起欢度着这一段光辉的日子。她经常兴奋地写信给秋白，告诉他胜利后上海的情形以及她的工作和她的欢乐。秋白的回信也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他说：“上海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地拿起武器来争取解放，是有利于发展并完成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新方式。”他给了之华许多热情的鼓励和对革命形势的冷静分析，他说：“革命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你要坚定而谨慎地进行工作。”

然而不久，蒋介石彻底撕破了假面具，在上海发动政变，刚刚插上的红旗被砍倒。到处流淌着工人和共产党人的鲜血。工人纠察队的武器被收缴了，上海市特别临时政府，上海总工会和一切革命团体都被封闭了，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工运领袖壮烈牺牲。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还发布通缉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共产首要分子、国民党左派人士及其他著名活动家。瞿秋白、杨之华均在此列。二十年代最悲惨的一页宣告上海已被新军阀占领了。

瞿秋白在武汉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为上海滩的叛变和流血愤怒着，焦虑着，悔恨着，他也为之华的安危思念着。

他对友人羊牧之说：“我们太幼稚了。这一着棋输给了蒋介石。我们对不起上海的工人阶级，我们对不起牺牲的同志。血的教训太沉痛了。现在看来，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实在害了党的事业。”他还自责地说：“革命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作为党中央常委的我，也有责任。我深感第一线斗争的经验太少，单是读了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干不好革命的。”

在“四一二”那天晚上，杨之华接到由组织转来的武汉急电和一张轮船票，电报称“秋白病危”，要她“立即动身去汉”。她在十三日上午仍冒险参加了上海工人群众反击蒋介石叛变的大规模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当晚就乘轮船离开了上海。她在船上还想着、诅咒着“四一二”大清洗。这与两月前她在南市区老西门看到的军阀大刀队那种凶残的杀人场面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旧军阀李宝章的大刀队用的是钢刀，而新军阀蒋介石却用机关枪扫射人民群众。

轮船到达汉口后，她按照电报通知找到了汉口原英租界辅义里二十七号，走进了一座两层楼房。里面住的人很多，李立三、蔡畅等同志也住在这里。大家都在忙碌着，就是没有看见秋白。同志们热情地帮她把行李搬到楼上一间厢房里，告诉她说：“这是秋白同志住的房子，他出去开会了，中午就回来。”

这时的武汉处于内外夹击，革命与反革命搏斗中，秋白是忙透了。他的起居十分随便，有时穿西装，有时穿长衫，有时又穿一身国民党军服，深陷在各方面的会议和交涉里。

过了一会儿，熟悉的脚步声传入她的耳中，秋白提着皮包上楼来了。她的心突然激荡起来；其实是一次小别，此刻却像久别重逢似的，她眼含着泪花扑向秋白的怀中，秋白温存地抱

着她，吻着她的泪眼，说：“‘四一二’一定把你锻炼得更坚强了吧！”之华沉静地说：“是的，昨天我是踏着烈士的血迹走上轮船码头的。”之华看到秋白没有病，比在上海时活泼多了，便责备道：“为什么给我‘病危’的电报？公私灾祸一齐来到，一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秋白说：“这是组织上关心你的安全才出了这个主意。”

秋白脱掉长衫，挂在屋角的衣架上，然后，走到书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三本文件，对之华说：“这是我在武汉和你见面的礼物。”他把三本文件交给她，并逐件做了扼要的介绍。

第一本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二本就是秋白去年春在医院治病时开始译著的《俄国革命运动史》之一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他在《自序》中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当做历史读。”

杨之华捧起这两本书，就想着农民问题一直是秋白萦回于心的大事，其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他断言：“中国革命如果不解决农民问题，是永世也不能胜利的。”他不愧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重视农民问题的领导人之一。

第三本则是秋白自己订的簿子，封面上用紫色钢笔端正地写着书名：《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他对之华说：“这一份底稿是留给你看的，另一份已经付印了，准备提交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讨论。”之华意识到这本书是秋白在革命风雨中应运而生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物，也许此时还难以估计它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呢！

之华深深地感到秋白对她的爱，首先是政治上的关怀和事业上的鼓励。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些贵重的精神礼物。

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九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汉口市武昌第一小学礼堂，在声讨蒋介石的声浪中开幕，于汉口黄陂会馆结束。陈独秀做党的工作报告。他穿着长衫，说着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讲得比较慢，很有大学教授讲课的气派。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秋白面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二字，秋白抽着烟，沉思着。

第二天开会时，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会场里的气氛活跃起来了，出现了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这本小册子批判了十七点党内“退步”的错误，实际上揭开了系统地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序幕。“吾爱吾师，惟吾更爱真理”！无私无畏的瞿秋白，在历史转折关头，面对大是大非，不得不亮出自己的观点。

在以后的会议上，瞿秋白、蔡和森、任弼时、恽代英、毛泽东等都发了言，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几经争论，陈独秀被迫向大会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了一些错误。大会通过了《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议决案》和《土地问题议决案》。经过酝酿讨论，大会仍然选举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大会主席团酝酿中央委员人选时，很多同志提名杨之华。但杨之华当选为中央

委员时，她突然诚恳地对秋白说：“我做不了怎么办？”秋白回答说：“你是大家选举的，你要向大家声明。”之华果然在大会上提出了声明。上海代表张金保等同志坐在主席台上很着急，异口同声地鼓励她，说：“我们信任你才选你，你有能力，你就干吧！”

在此期间，瞿秋白心力交瘁，旧病复发。打针服药，也不见好转。杨之华眼看着他发烧盗汗，咳嗽吐血，工作那么繁忙，心情又那么沉重，劝他休息，却怎么也不能说服他。他除了开会，起草文件之外，还受中央常委委派同张国焘一道，赴湖南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又到湖北省委和农运负责人会议上发表讲话；还写了《长沙政变与郑州开封的克复——革命之胜利与危机》、《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革命失败之责任问题》等一系列政论。七月一日中午，秋白和之华坐人力车到了江边渡口，坐了小划子到武昌。他们一起去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陈独秀掏出了事先拟好的文件滔滔不绝地讲着，发挥他几个月来执行的“退让”的理论。他讲完话，恽代英第一个发言，他问陈独秀：“现在中央很奇怪，我听说秋白同志到处做报告是‘进攻’、‘进攻’。现在中央又决定要‘退让’，‘退让’。中央内部是否有不一致？”

陈独秀怒气冲冲地说：“正因为不一致，所以要开会呀。”

秋白的发言，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观点，他指出强行通过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议决案是集机会主义之大成，也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顶点。他主张坚决开展工人运动和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势力。

秋白讲话时，陈独秀一根接着一根地吸烟，很不耐烦，但

还能克制着自己。可是当任弼时发言时，他就再也忍耐不住了。任弼时谈的是他和秋白一起研究草拟的关于土地革命的宣言，要求中央批准以共青团名义发表，他刚说了几句，陈独秀便跳起来，从他手里抢过这个宣言稿，甩在地上，用脚使劲地践踏。令人烦愁的气氛顿时向大家袭来，会议没有取得积极成果而散了。

回家的途中，之华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而使她感到意外的是，秋白的神情却很平静，一直沉思着。他那时经常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扭转危局。

种种消息说明，任你怎样退让，武汉政府从根本上是不会与共产党联合革命的。一天傍晚，瞿秋白带点忧郁，去找羊牧之，说：“在武汉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趁没有离开时，再去黄鹤楼看看吧。”夕阳残照的江面上，一叶扁舟在粼粼波光中轻轻摇荡，划向黄鹤楼去。他们面对着烟波浩渺的三镇和白浪滚滚的江涛，心情都很激动。秋白情不自禁地吟诵着崔颢的那首黄鹤楼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他感慨地说：“千百年来，多少文人雅士，英雄豪杰，都好似江流一去不复返。安知几十年后，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但去要去得有价值。”

七月十五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解散苏联顾问营。接着而来的便是血洗武汉三镇。不久，宁汉合流。第一次中国大革命就在血泊中被葬送了。几天后，奉命赴江西九江与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研究南昌暴动意向的李立三、邓中夏带着九江会议的意见，上庐山向瞿秋白、鲍罗廷报告了南昌暴动计划，瞿秋白听了很为振奋，表示完全赞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的武汉，不负“蒸笼”的诨名，天气特别闷热。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陆续向三教街四十一号住宅走去。他们都是从党的各个重要岗位奉命前来参加一个紧急会议的代表。这个会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这次紧急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挽救了中国革命。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这次会议产生了新的九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和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瞿秋白实际主持政治局和常委会工作，成为党的领袖。这年他刚过二十八岁。

瞿秋白主持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确定中央机构的工作分工。杨之华当了中央妇女部部长。会议还决定派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这年九月，正当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领导工农红军向井冈山挺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同时，瞿秋白领导中共中央机关移驻上海建立地下工作据点。十月，他在安排总体工作以使各部正常运行的时候，还亲自抓了党刊《布尔塞维克》的创刊，由瞿秋白、邓中夏、王若飞、罗亦农、郑超麟组成编委会，编辑部设于亨昌路（今愚园路亨昌里）。瞿秋白和杨之华住在福煦路（今成都路）民厚南里对面一座房子里。他每周都要到编辑部一次，主持编委会工作。

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妇女工作委员会。在确定妇委会人选时，中央原来考虑由蔡畅任妇委书记，当时她是全国总工

会妇女部长,但她执意不肯就任。她认为自从一九二五年以后,杨之华一直负责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是杨之华任妇委书记好。中央采纳了她的意见。杨之华诚恳地对大家说:“女同志中警予姐理论水平最高,她意志坚强,工作踏实,我最佩服。可惜她因工作需要留在武汉了。蔡畅同志比我能力强,应当是她当书记,但她又不肯。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

中央妇委成立后第一次会议,是在邓颖超和周恩来的新居举行的。那时周恩来刚从南昌转道广东来到上海。他们的住址比较隐蔽。八位妇委委员分别打扮成阔小姐、官太太、少奶奶、贵妇人模样,陆续来到邓颖超家中,邓颖超以家庭主妇的角色招待这些客人。在楼上的房间里已准备了一桌麻将牌,会议就在麻将牌的碰击声中开始了。

为了适应地下工作的环境,杨之华建议今后同志之间不要互相称名道姓,可以姐妹相称,大家都赞成。于是自报年龄,蔡畅与之华同年,只大几个月,应为大姐,但她认为之华是书记,应该当大姐,自认为二姐。李文宜是三姐,老四是贺稚华(后叛变),邓颖超为五妹,老六为杨之烈(张国焘的妻子),七妹是一位姓朱的女工,八妹是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庄晓东。这便是当时党内闻名的“白区八姐妹。”

这个时期,瞿秋白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无间断革命’的名词,……由此而得出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因此,没有能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除了唯一成功的秋收起义,其余都失败了。广州起义的惨重损失,张太雷的英勇战死,终于

惊醒了新的中央领导班子。瞿秋白怀着无限悲痛发表了《怀念张太雷（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写道：“他死时，还是希望着自己的鲜血，将要是中国苏维埃革命胜利之渊泉！”

短短几个月，瞿秋白仿佛背着千斤辘重车，行进在极其险峻的山坡上。这时他真正感到身体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现十二分疲劳的状态。当他想到党的事业由于自己的失误而蒙受重创时，他抑制不住自我谴责的心情。他对之华说：“小资产阶级的各种倾向，都是党的魔障。旧的去掉了，新的又会产生。从这一极端，可以走到那一极端。机会主义本是有两个轮子啊！”有一天，羊牧之来访，他问秋白近来还作画否？回答说：“此调不弹久矣。”接着便绘了一幅《风竹图》，疾风中瘦竹数竿，虽被风吹弯了腰，却刚劲挺拔。上题：“腰可弯，节不折”六字。

带着沉重的心情，瞿秋白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离沪赴莫斯科筹备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杨之华也是“六大”代表，组织上通知她五月份可以动身赴苏。她听说李文宜也要去苏联学习时，就约她同行。那时李文宜与罗亦农结婚不久，亦农就被捕牺牲了。之华带着女儿独伊和李文宜离开上海时都化了装，梳了一个假发髻。她们乘的是货船，货舱里空气很坏，加上风浪颠簸，李文宜上船后不多时就晕得躺倒了，难受得呕吐不止。之华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到了长春后，她们扮成农村妇女模样，独伊也换上花袄花裤。她们各有一名男同志护送，假扮成夫妻同行。在满洲里，她们合乘一辆马车过了国境线，踏上了苏联国土。

中共六大于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郊外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前贵族庄园召开，代表们用了七天时间

讨论了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政治报告，既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批评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充分体现了大会主持者瞿秋白等人的民主作风。瞿秋白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后之结论》中，进一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分析了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危害性及其所犯错误的根源。由于全体代表的努力，大会全面地总结了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比较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当前的形势。

在这次大会上，瞿秋白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紧接着，他作为中国党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这两次大会之后，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苏联工作。

这时，瞿秋白因劳累过度，身体坏极了，夜里有时在睡梦中从床上跌到地板上。他不得不在杨之华照料下在巴库做短期休养。但他同过去一样，病重也放不下工作。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中说：“我在俄做国际工作（政治）及理论工作，本是党的需要，国内工作自然是你们多负责了。但我想不久就要回国的，我又要养病，又要想做许多工作，不知如何是好，要做的事太多了！”

从巴库回到莫斯科，身体并没有怎样好转，瞿秋白却被卷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这是劳大校长米夫和王明（陈绍禹），串通少数学生，乘苏联批判托洛茨基的党内斗争的特殊背景下，整肃不同观点的同学的一个假案。瞿秋白经与中国代表团研究后，以中国代表团名义要求复查此案，组成了共产国际监委会、联共监委会和中国代表团三方

联合审查委员会,经过认真审理,作出了否定劳大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瞿秋白据此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提出要求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和劳大校长的职务,从此被米夫和王明集团视为眼中钉。当他来劳大宣布审查结论,为无辜学生恢复名誉时,米夫、王明利用联共突然发动的批判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清党运动,对瞿秋白造谣中伤,恶毒攻击,诬陷他是“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等等。他虽未遭难,他的三弟景白却在这场陷害中“失踪”。杨之华当时也在劳大学习,在这场斗争中她立场鲜明,因而也受到了严厉处分。

秋白和之华在莫斯科度过了两年时光,如果把“江浙同乡会”事件排除在外,他们过得还是比较安定和愉快的。他们住在维尔斯卡娅大街(今高尔基大街)柳克思旅馆第十二号房间。虽在异国他乡,仍有不少新朋旧友常相往来,谈天说地,其乐融融。生活虽很俭朴,却很有规律,自由自在。当秋白工作时间过长,面带倦容,需要休息时,之华就在旁边说几句诙谐风趣的话,或叫秋白放下笔去做点什么,调剂调剂。秋白对之华说:我们要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全的精神和身体。他要之华跟他一起运动,滑雪,打乒乓,他还教之华读俄文,进修汉文。他们的独伊寄托在城外的儿童院。每逢星期六,他们就把她接回来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星期天就带她到公园游玩。杨之华说:“我见秋白这样爱护独伊,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秋白为独伊写了一首诗:

小小的蓓蕾,

含孕着几多生命，
陈旧的死灰，
几乎不掩没光明。
看那沙场的血花灿烂，
经过风暴之后的再生。
难道是无意中的赤化？
却是赤爱的新的结晶。

不久，小独伊转到另外一个儿童院，在离莫斯科较远的伊凡城。秋白和之华每逢周末去看她。他们星期六晚上坐火车，星期天早晨到达伊凡城。夏天，他们带独伊到树林里采蘑菇，秋白画画，折纸给女儿玩。有一次他们把独伊带到附近河里撑木筏。秋白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独伊和妈妈坐在木筏上，与大自然溶成了一片。忽然秋白引亢高歌起来，母女俩也应和着唱，快乐的歌声在河上飞翔。冬天，秋白把独伊放在雪车里，他自己拉着雪车跑。有时装做跑不动了，有时还假装跌一跤，用手蒙了脸“哭”起来。这时独伊就叫喊道：“妈妈，我跌一跤不哭，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有一段时间，秋白病倒了，住进了列宁疗养院，他就给女儿写信，给女儿画画。

独伊：

我画一个你，你在笑，为什么笑呢？

因为你想着：

你是好爸爸和妈妈两人生出来的。

信上还画了一张画，独伊牵着一只兔子。

秋白接到独伊的信，马上写了回信。

小独伊：

你会写信了——我非常之高兴。你不病，我欢喜了。我念着你。我的病快要好，过三个星期我要回莫斯科。那时要来看你，一定来看你，我的小独伊。再见，再见。

独伊所在学校规定男女生都要剃光头。秋白知道女孩剃光头会感到不愉快，就写了一封信安慰女儿：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剃了吗？

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

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

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

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

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独伊收到这些信，感到无限温暖，也更爱她的好爸爸了。秋白对女儿的一颗爱心，更使之华感到了真正的幸福。曾经有多少作品描写人世间最真挚的爱情，然而有哪一种可以与他们相比拟呢。无论在何种环境下，他们的爱都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一九二九年春，秋白到库尔斯克州利哥夫

县玛丽诺休养所疗养，他给之华写信说：“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独伊如此地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三月十八日他给之华的信中说：“我数一数你写给我的中俄文信——总有三十封了！我读了又读，只是陶醉在你的爱之中，像醇酒一样的甜蜜，同时，在字里行间我追随着你的忧愁或高兴，我觉得到你的一切一切！！之华，我吻你。”七月，秋白从莫斯科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反帝同盟大会，而之华要去海参崴参加太平洋劳动大会。秋白在轮船上看着海鸥绕着桅樯，像是依依不舍。他写信给之华说：“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太平洋劳动大会为保证安全起见，规定各国代表不许与外界通讯。秋白在信中说：“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上面，等我回来看！好不好？”

一九三〇年六月，瞿秋白的命运又出现了一次转折。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联合决定，又拿出米夫、王明陷害他的理由，说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劳动大学“搞宗派活动”，“支持托派”等，撤销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七月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准备回国的瞿秋白突然被通知去共产国际接受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重任。瞿秋白和周恩来结伴绕道德国柏林回国。行前，他和之华考虑到当时国内白色恐怖的严酷，地下斗争的艰险，决定将九岁的独伊留在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同时嘱托鲍罗廷夫妇多加关照。父母回国前夕，不巧独伊重病发烧，而他们正在交接工作和整理行装。是鲍罗廷

命他的小儿子诺尔曼送她进了医院。第二天妈妈到医院来看她时告诉她说,爸爸因为事情太忙不能前来。她想到就要和生病的女儿远别,禁不住流泪了。

瞿秋白回到上海后,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纠正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错误。会议对李立三采取的态度是温和的,没有做组织上的处理。但是,会议没有提出李立三所犯错误的性质是路线错误,说他只是策略上的错误。这就成为米夫、王明继续陷害瞿秋白的政治把柄。

十一月间,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于十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这封来信批评李立三是犯了路线错误,指责中共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瞿秋白立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错误采取了调和的态度。但王明获悉这封来信的内容后,便和博古(秦邦宪)连续写信给中共中央,公然打出“拥护国际路线”,“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说他们“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听取和讨论了东方部提交的《关于中共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重点是攻击瞿秋白,指责他所领导的三中全会“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没有揭露和纠正以前的一部分政治局领导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对于国际的指示,运用两面派手段”,从而全面否定了三中全会的功绩;并要求“召集四中全

会来纠正三中全会的错误”。这时瞿秋白几乎成了众矢之的。接着，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突然来到上海，直接插手中国党内事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竭力为王明、博古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创造条件。从此，在米夫的谋划下，另一股“左”倾分子粉墨登场，使党陷入了极“左”的泥淖。

瞿秋白、周恩来在十二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承担了三中全会所犯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以后，又提议他俩一起退出中央政治局，吸收过去反对过立三路线的同志上来，曾推荐何孟雄等去向米夫反映，米夫对他俩去留问题的态度是“留周拒瞿”。瞿秋白现时的命运已是任人主宰了。

第四章 和鲁迅并肩战斗的日子

一九三一年，上海进入了最黑暗的年代。一月七日，阴沉的天气，叫人感到窒息。瞿秋白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蓄谋已久的突然袭击，被排挤出中共中央政治局。那天下午散会时，天色已晚。李维汉在门口遇到秋白，招呼说：“我们吃夜宵去吧。”他们在一个馄饨担旁边吃夜宵时，李维汉关心地问道：“秋白，今后怎么办？”

秋白沉吟片刻，回答说：“听从中央的分配吧。”

“为什么你对那些无中生有的诬蔑，不置一词，不为自己申辩呢？”

“唉，我个人的问题算不得什么，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我担心的是革命的前途啊！”

这年六月，中共河北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马辉之在七月间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省委被破坏的情况，中央领导人通知他，决定委派瞿秋白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并要他约秋白一道北上。他和秋白在杨树浦英租界一个公园里接了头。秋白的心情固然是沉重的，但他想的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他说：“中央决定我去河北，我坚决服从。只要革命需要，去哪里，干什么，我都诚恳接受。”他略微沉思了一会儿，又道：“可不可以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因为我在平津的熟人很多，一道走，对组织的安全不利。”马辉之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人特别班学习时，在蔡和森的住处，与秋白见过面，后来在列宁学院，又多次听过秋白的演讲。对秋白一直怀着敬仰的心情。这次见面，他内心很是激动，一再劝慰秋白保重身体，同时答应向中央反映秋白的意见。事后，马辉之考虑到秋白和组织的安全，就向中央请求另派了别的适合的同志，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设。

但是，从此以后很长时间，中央没有正式分配瞿秋白任何工作。杨之华也受到了株连，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她一方面为秋白感到不平，同时对宗派主义者这样无理地对待自己，也感到十分委屈。她要求分配适当的工作，却遭到拒绝。那时还有很多同志受到同样的迫害。不仅在政治上、组织上受到压制，在生活上还受到经济的制裁。他们的生活没有保障，走头无路，有的沿街叫卖瓜子，有的被逼得想去山中“落草”。多少夫妻被逼得分居、离婚，家庭破裂。瞿秋白身为党的高级干部，所受的待遇比这些同志当然要好一些，但是每月生活费也仅有十七、八元，相当于当时上海工人的最低工资。他

又长期患病，所以生活极端困难。身处逆境，他依然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常常对杨之华说：“一个人要经得起任何考验，不光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要考验得起，特别在受到挫折的时候，要经得住考验。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去学习和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啊。”

人世间最纯真的爱情，往往不是生长在顺境里，愈是在遭受磨难和屈辱的逆境时，才会愈益显出它的高尚和美丽。“秋之白华”在人们心目中就是一种爱情的象征。当厄运降临，秋白遭受残酷打击的时候，这种坚贞不渝的爱情便更加显示出了圣洁的光芒。

那时，秋白身上的光环已经退尽，肺病的折磨使他面目浮肿，翩翩的风度已经消失，横溢的才华也失去了施展的机会。但他依然拥有一颗坚定的心，一腔热血，一双明亮的眼睛，和一个丰富美好的感情世界。只有杨之华最理解他。虽然秋白把生和死看得很平常，但之华总是认为自己的生命算不得什么，而秋白的生命却是宝贵的。因此她比任何时候都更温存体贴地爱着他，呵护着他，全身心地抚慰着他难以愈合的创伤。而秋白对之华的体贴爱护也是无微不至的。他感到对不起之华。他宁愿把一切痛苦归于自己，也不愿让之华受到损害。当碰到不愉快的事，他总是给之华除忧解闷，说一些既风趣又有深意的话，使她高兴起来。

他们住在简陋的亭子间里。杨之华把一切家务担当起来，烧饭，洗衣，天不亮就起来倒马桶。她精打细算，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为秋白治病。从药店里买回药来，就在亭子间门口熬药。因为穷，常遭人白眼。有一次，之华洗衣服不知怎的触犯

了房东太太，那个胖女人便指桑骂槐，没完没了地唠叨。之华心里气得慌，回到屋里对秋白说：“简直太不像话了，连洗衣服的自由都没有。”“就是因为不自由，才闹革命么！”秋白幽默的回答，顿时使之华的气消了。

因为出去买菜不方便，他们吃的是普通的包饭，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有一天，之华下了很大的决心，买了一只老母鸡，炖得又烂又香，准备给秋白补补身体。不料晾衣时竹竿碰翻了锅，一锅鸡汤都洒了。之华心疼得不得了，一边收拾，一边埋怨秋白不帮她晾衣服。秋白赶紧过来帮她收拾，和和气气地笑着说：“算我已经吃了吧，别难过了。吃过饭，还要看你翻译的文章呢。”之华对秋白的照顾从来是无微不至的。她跟一个好朋友说过，自从结婚以来，她从未吃过鸡腿，全让给秋白吃了。

秋白带着病，每天仍要工作十多个小时，看报，读书，写作，翻译，从早晨直到深夜。他还要帮助之华读书，学习俄文，写短篇小说。之华学习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时，他一字一句地把着手教她，之华每天翻译一段，他就每天帮她改一段。他们同患难，共甘苦，相濡以沫。有人说，秋白是这个家庭的灵魂，之华则像融融烛光，照亮了这间清贫的小屋，使小小的亭子间里充满了温暖和激情。

瞿秋白自一九二三年六月参加中共“三大”，担任宣传、理论和教学工作以后，便未能从事他爱好的文艺，常说“田园将芜胡不归。”有时竟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现在，他被迫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放下了“几千斤的辘重车”，“无官一身轻”，他又可以重新操起熟悉的语言文学的武器了。二、三月

间,他和之华商量过,曾两次写信给苏联友人郭质生,进行中国文拉丁化的探讨和文学研究,再三拜托郭质生寄给他“一切好的关于拉丁化问题的小册、著作、杂志,以及语言学(я з б л к о В е Д е Н и е)的一般书籍”,“新出的以及旧的文学、小说,以及多种文艺杂志”。他在信中对郭质生表达了深挚的怀念之情,并说:“现在我病得更厉害了”,“我的妻子常常想念你们和你们的孩子。”他寄给郭质生一本《国语罗马字模范读本》,信上说:“我本想多寄几本,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够。”当时,小独伊还在苏联,秋白在信上说:“再,有一封信,请你转寄给我们的女儿。”秋白在信上细心地写明通信方法和地址,并嘱郭质生“勿告诉任何人。”

郭质生是俄国人,本名弗谢伏罗德,是在中国长大的。青年时代回国后,起先在外交委员会工作;后在红军中工作,后来终于成了语言学教授,是一位热爱中国的汉学家。解放初期访问过中国,并将当年秋白给他的书信、题书、照片等一并赠送给我国。原来,瞿秋白早年赴苏俄考察、采访,一九二一年到达莫斯科不久,苏联外交委员会就派了俄语翻译郭质生陪同他。秋白在《饿乡纪程》中说:“他懂中国话,生长在中国,所以有中国名……后来我同郭质生竟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瞿秋白还将莱蒙托夫的短诗《烦闷》汉译稿以墨笔书赠郭质生,书上题写着“质生兄鉴正,秋白。”在封面上还画着一枝菊花。

从秋白给郭质生的两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瞿秋白、杨之华当年的处境已经困难到何等地步,连多买几本书的钱都没有。但他们矢志为中国革命不懈奋斗的精神,却洋溢于字

里行间,要求为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发展中国革命文学事业而工作的心情何等热烈而迫切。那时,有些去看望他们的人,丝毫也没有感觉到秋白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秋白仍然是那样乐观、那样潇洒、那样幽默;一接触到工作,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

由于瞿秋白在党内外的威望和他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加上他在文艺方面非凡的造诣和文艺战线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曾一度委托他参与中央文化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于是他便全身心地投入左翼文化运动。自从瞿秋白参与了“文委”的领导,上海整个左翼文化运动,才有了较大的进步和发展,在反动势力的重压下,文学、戏剧、电影、音乐、教育、新闻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左翼文化阵线。

这年四月下旬,茅盾从沈泽民那里得知秋白的近况和新址,第二天就关切地前去看望。

瞿秋白夫妇住在大西路两宜里,过着地下生活。这天下午,秋白正在专心地写着文章,忽然楼下传来敲门声,矮胖的房东太太跑去开门,杨之华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何先生在家吗?”房东太太不耐烦地回答说:“这里没有姓何的。”杨之华敏捷地听出这是孔德沚的声音,便放下书本,连忙下楼,大声答应说:“有姓何的。”她边跑边向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等茅盾夫妇上楼跨进屋子以后,之华告诉他们:“秋白又改名换姓了,现在叫林复。”原来去年八月,瞿秋白听说茅盾已从日本回国,他便立刻用暗语写信,寄请开明书店转交茅盾,信中留下了住址,约他会晤。那时瞿秋白改姓何,杨之华改姓林。这样两位亲密的战友在一幢普通的楼房

里欣喜地重逢了。秋白问了茅盾在日本的情形，也谈了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还介绍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他们已有半年多没有见面，秋白消瘦多了。茅盾夫妇听说秋白的病情，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同情他的处境，秋白问起茅盾近来写些什么？茅盾说正在写长篇小说《子夜》，并将全书的主要情节告诉了秋白，秋白听得入神，感到由衷地喜悦。过了两天，茅盾带了已写成的几章和全书大纲来瞿秋白家，征求意见。只要一谈起文学，秋白就像获得一种享受，一种陶醉，总是那样地专注和兴奋，显露出他的文学家气质和激情。这天下午从一点到六点，秋白边看原稿，边谈意见。他们谈得最热烈的是关于农民暴动和工人罢工。秋白认为写农民暴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写工人运动，从大纲看，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他向茅盾详细介绍了当时红军和苏区的发展情况，解释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和党的有关政策。谈着谈着，不觉天色已晚。他们打算吃过晚饭继续谈下去。不料，饭刚吃完，秋白接到一封信，里面写着：你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快回去看看吧！

这是党的机关遭破坏，通知转移的暗号，大家不免焦急起来。这时茅盾夫妇就邀请秋白夫妇住到他们家中去。茅盾家住在愚园路树德里一幢楼房的三层厢房，他让孩子睡地铺，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秋白夫妇在这里住了一两个星期。秋白和茅盾每天促膝长谈，永远谈不完似的，秋白心情很愉快，神情很安详。他们的话题从《子夜》谈到左联和上海文艺界。秋白看了茅盾刚完成的描写中学生生活的中篇小说《路》，他建议把中学生改为大学生。茅盾尊重秋白的意见。改写了。秋白又建议在《子夜》的结尾，把吴赵两大集团握手言欢改为一

胜一败，这样更能突出中国民族资本家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他对一些细节也都考虑过。如吴荪甫这样的大资本家，在极端愤怒而又绝望时会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吴荪甫坐的轿车不应是普通的福特牌轿车，而应坐豪华的雪铁龙牌轿车。茅盾听了这些意见心悦诚服，大都改了。只是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由于缺乏生活体验，茅盾感到无法照改。

茅盾在冯雪峰的要求下，曾经担任了约半年时间的左联行政书记。五月初，冯雪峰到茅盾家来了，他送来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前哨》创刊号。这时，他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他们一见如故，相互感到无比亲切。秋白看了那本《前哨》刊载的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赞赏地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可是对文中“战叫”这个用词，他却认为念起来，人家是听不懂的。《前哨》是左联秘密机关刊物（因被查禁，第二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创刊号即“纪念战死者专号”，是为纪念胡也频、冯铿、柔石、殷夫、李求实（李伟森）等五位革命作家遇难而编辑出版的。

当瞿秋白拿着《前哨》，看到鲁迅的“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不断的斗争。”他陷入了极度的悲愤和深沉的思索。他想起了壮烈牺牲的胡也频。一九三〇年他在上海一次党的会议上，见到这位面色黝黑、热情健谈的青年作家，曾以“韦护”的别名写过一封信托胡也频带给丁玲。

当时丁玲的短篇小说《韦护》已在一九二九年末《小说月

报》上发表了。秋白在用“韦护”这个名字的时候，曾对丁玲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护菩萨的佛象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丁玲在这篇小说里写了秋白和剑虹的爱情，写了秋白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她认为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回忆，可以作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当她从胡也频手里接过秋白的信时，看到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便由惊奇而激动了。难道秋白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这本书里留有他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是他毕生也难忘的。后来一天晚上，秋白和他的弟弟云白到吕班路丁玲家里来了，那时丁玲和胡也频穷得想泡一杯茶招待客人也不可能，家里没有茶叶。秋白带点忧郁，笑着对丁玲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他看了丁玲的孩子，问有没有名字。丁玲说，母亲给取了个名字，叫祖麟。他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的又一伟大作品。”丁玲心里正有点疑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秋白却感慨万分地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丁玲一听，终于理解了他的心境，他想到他最心爱的文学，想到多少年来对文学的荒疏。

鲁迅的文章，在秋白的心里燃起一团烈火。他同鲁迅一样，铭记着以同志们的鲜血所记录的中国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他庆幸自己可以重新耕耘荒芜已久的田园了。

冯雪峰和茅盾考虑到秋白的安全，曾经打算介绍秋白到鲁迅寓所避居，又考虑到鲁迅的处境，终觉不是久安之地。那

时，鲁迅从花园庄迁回自己的寓所也才一个多月。三月十八日，他在寓所接待了史沫特莱女士。他的面色灰暗，头发是蓬乱的，两颊深陷下去，一双眼睛闪着愤怒的光芒，他对史沫特莱说：“这便是我在那晚上写的一篇文章。”说着，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递给史沫特莱：“把它译成英文在国外刊出吧！”他在文章中说：“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

史沫特莱考虑到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便提醒鲁迅说：“如果刊印出来，你的生命一定便会有危险。”

鲁迅坚毅地回答：“这有什么关系？必须有人出来说话啊！”

这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央负责情报、交通、特工的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六月，六大选出的名义上还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实行大搜捕。九月，王明和米夫就到莫斯科去了。不久，以博古为代理书记的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开始分批撤退到中央苏区去。瞿秋白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国民党特务头目曾限令顾顺章追捕周恩来、瞿秋白。瞿秋白当时处境是很危险的。幸好冯雪峰及时想方设法，在南市紫霞路六十八号，为秋白夫妇找到了一个比较可以长期居住的地方。住宅的主人谢澹如，是一个爱好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做事的朋友，他既是商人，又是文人，思想进步，他家世代经商，其父谢敏甫是上海福康钱庄的老板，所以军警特务从未注意过谢澹如。他为了安排瞿秋白夫妇居住，就在报纸上登了一则房屋招租广告。

六月的一天，冯雪峰陪同秋白夫妇拿了这张报纸，来到谢家。秋白化名林复，剪了平头，着一身浅灰色长衫，穿一双布鞋。之华改扮农村妇女模样。他们就装作从乡间来上海的人，租住在二楼东边厢房。西边厢房是谢家的书房，藏有大量文史书籍和期刊。这是秋白夫妇在避难中的读书之处。自从秋白和之华住到这里以后，谢澹如就借辞谢绝了新文艺界的朋友到他家里去，而且除他本人外，他母亲和妻子等也绝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是什么人。当时，很少有人直接到秋白的住处去，除之华有事出去和人联系外，经常只有冯雪峰一个人去联系，秋白自己是很少外出的。他们在谢家避居了近两年时光。秋白翻译的、后来由鲁迅编入《海上述林》的译著以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大约一百五十万字的作品，大都是在这近两年中完成的。秋白是文艺大众化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这个时期还三次化装，冒险到不远处的老城隍庙去观听卖梨膏糖、唱小热昏的民间通俗演唱表演。“九·一八”以后，他写下了著名的大众文艺杰作《东洋人出兵》。“一·二八”以后，他又创作了《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江北人拆饼头》等通俗唱词。

鲁迅当然早就知道瞿秋白这个共产党的著名人物，知道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有天才的作家和翻译家。而瞿秋白从“五四”时期读过鲁迅的作品就铭记着这个：“青年叛徒的领袖”，后来在他的心目中，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早已是无产阶级的友人和战士了。那时，冯雪峰大约三、四天就要到紫霞路六十八号去一次，主要是和瞿秋白谈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工作，或取文稿。秋白一看到冯雪峰，就是“鲁

迅，鲁迅”地谈着他对鲁迅的思慕：“鲁迅近来好么？”“鲁迅对工作有什么意见？”“鲁迅在写什么？”鲁迅也是这样，他和冯雪峰相见时，经常要谈起瞿秋白。当他从冯雪峰口里知道了瞿秋白从事文艺译著并愿意与闻和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便露出十分高兴的神情，很重视秋白的意见，马上把秋白当作一支很重要的生力军。冯雪峰最初把瞿秋白谈到的、对鲁迅从日本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时，鲁迅并不先回答或解释，而是唯恐错过了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又凝思着，沉静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紧要的了。”从此，鲁迅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就会交给冯雪峰，说：“你去时带给他罢！”后来，冯雪峰说过，他只要一想起鲁迅说这些话时的情态，就要自己微笑起来的。这也足以说明鲁迅的精神。

鲁迅十分珍重瞿秋白的翻译，认为国内文艺界是找不出第二个人可以与他比较的。当时国内很难得到俄文原版书籍，瞿秋白就托曹靖华从列宁格勒把苏联报刊书籍分批寄两三份，或经西欧寄给鲁迅，鲁迅随即转给瞿秋白。

一九三一年秋天，鲁迅收到曹靖华的《铁流》译稿，由于曹靖华未及译出涅拉托夫写的序文，鲁迅很觉遗憾，也很焦急，便想到了秋白，他托冯雪峰转请瞿秋白补译这篇序文。瞿秋白领会鲁迅的心情，马上就把这篇约二万字的序文赶译出来了，并将《铁流》一部分译稿与原著校核了一遍。秋白对之华说：“我给鲁迅写封信吧。”这就是迄今发现的瞿秋白写给鲁迅的

第一封信。鲁迅把这部作品的出版视为他们三人合作的成果和友谊的结晶。他深情地赞扬《铁流》译本是在“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委婉曲折”地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鲜花”。

鲁迅翻译的那本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署名“隋洛文”，由大江书铺初版，旋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查禁。鲁迅于十一月间自费以三闲书屋名义又精印了一种再版本，改署名鲁迅，以示抗议。鲁迅说：《毁灭》是“一部纪念碑的小说”。《毁灭》刚出版，他就赠给瞿秋白一本。瞿秋白怀着十分欣悦的心情，在对照俄文原著仔细校读以后，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字的充满同志感情的长信，这就是最早在文学界、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讨论翻译的一封信。瞿秋白的那种真诚、那种语言，多少年来一直激动着人们的心弦。他在信上，称赞《毁灭》的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每一个革命的文学战线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并说：“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瞿秋白还在这封信中坦率地谈到了自己的翻译主张，认为《毁灭》“做到了‘正确’，但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并从校译中提出了几个问题，希望鲁迅考虑。他向鲁迅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心情：“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鲁迅看到这封长信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并给瞿秋白写了回信，也以“敬爱的J·K·同志”相称，他在信中说：“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到了一九三二年六月，瞿秋白抱病写了一封再

论翻译的长信给鲁迅。令人铭记不忘的，是他们在没有见面以前，在通信中就都以“敬爱的同志”相称，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那个年代，是一种多么亲密无间的称呼啊！他们之间的感情，就如许广平所说的：“海内存知己，神交胜比邻”了。秋白给鲁迅论翻译的信都要叫杨之华看一看，使正在学习翻译的杨之华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以致终身难忘。

瞿秋白一直关注和期待着鲁迅长篇小说的创作，并且很想为鲁迅提供写作长篇小说的条件和环境。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在鄂豫皖根据地反“围剿”战斗中负伤，党决定让他到上海治疗。他住在一家私人开设的医院里。上海地下党把陈赓讲述的工农红军不畏强敌，英勇善战，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的战斗故事以及苏区人民生产支前的动人景况记录下来，油印了许多份，在党内部分同志中间传阅。大家希望鲁迅根据这些材料写一部小说，冯雪峰便把这意见告诉了鲁迅。鲁迅本来对红军的战斗和苏区的生活早已深切关注，便急切地一再邀请陈赓将军到家里晤叙。于是，在冯雪峰、朱镜我陪同下，一直仰慕鲁迅的陈赓秘密地来到鲁迅家作客。许广平预备了许多酒菜，盛情款待久经沙场的客人。鲁迅全神贯注地倾听陈赓的讲话，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如苏区的土地改革是怎样进行的；人民怎样支援红军战斗；群众生活情况有哪些变化，等等。当陈赓谈到苏区的许多房子四面都开了窗子，鲁迅听了很高兴。他说：人民的生活好了，注意改善居住的卫生条件，这是一个进步。

这天，陈赓将军的谈话使鲁迅深深地感动了，他很想写一篇苏区生活和红军战斗题材的小说，于是他又通过冯雪峰邀

请陈赓再一次会见。

大约一个月后，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鲁迅又热情地接待了由楼适夷陪同前来的陈赓将军。这次谈话的重点是红军作战的情况和军民关系。当陈赓谈到一位老大娘掩护伤员的故事，谈到红军司令员和农民一起坐在地头上抽着黄烟谈家常的情景，鲁迅十分振奋，流露出激动的神情。陈赓在谈话中还随手为鲁迅画了一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草图。

同陈赓的会见，促使鲁迅产生了构思一部小说的强烈愿望。他对友人说过：“写一个中篇可以。”“要写，只能像《铁流》似地，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

鲁迅的这个宿愿，在后来与秋白无数次促膝交谈中，得到了秋白的赞许。准备创作长篇小说的人物、情节和构思，就成了他们彻夜长谈的话题。但由于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条件和环境，鲁迅曾经想以《红军西征记》为题的小说，最终未能执笔，只能“赍志而歿”了。秋白为此几乎抱憾终身，直到离沪去中央苏区前夕，还与杨之华念念不忘，一再谈起要给鲁迅创造写长篇小说的环境和条件。

瞿秋白和鲁迅第一次见面，这个有意义的日子，据杨之华、许广平两位当事人回忆的结果，是在一九三二年夏秋之间，瞿秋白夫妇从法租界华兴坊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以后至九月一日以前的某一天，由冯雪峰事先征求鲁迅的意见，约定了一个日子。那天，阳光特别和煦，大清早，冯雪峰就陪同秋白夫妇到了北四川路底拉摩斯公寓（现川北公寓）鲁迅寓所。两位“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就在这一天见面了。鲁迅对这一位为了革命长期过着地下生活的稀客，款待如久别

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

许广平见到瞿秋白也是依稀如见到故人一般的。那是她在北京女师大读书的时候，瞿秋白刚从苏联回来，应邀到女师大讲演，介绍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她的印象中，那时的瞿秋白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家的模样。长面孔，长头发，戴着一副散光眼镜，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了头就往上一扬，那种神气，她还清楚地记得。而这次见到的秋白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显得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

那天鲁迅和瞿秋白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全、彼此的遭遇，直到中国革命和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地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他们谈到俄国革命给全世界的影响，俄国进步文学家是为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写作的；把俄国文学的精品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无异在暗夜里烛照人生的灯光……他们的心是多么相通啊！

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办法只得分别了。

自从这次见面以后，双方都感觉到还有许多未尽之意似的希望再次聚会。但那时双方都过着不自由的地下生活，要见面很不容易。终于克服了许多困难，选择在同年九月一日，一个下雨的日子，鲁迅和许广平带着海婴来到紫霞路六十八号三楼一个房间，拜访了瞿秋白夫妇。秋白坐在书桌旁边，看到他们来时，无限喜悦地站起来表示欢迎。秋白的书桌是一张特

制的西式木桌，上面有书架，下面有抽斗，把桌面上的软木板拉下来，就像盒子一样，抽斗也给锁上了。秋白说，如果我要走开，写不完的文件只要一拉下木板，就不会被别人乱翻了。做地下工作的人，这种桌子是很适用的。后来瞿秋白去苏区之前，就把这张桌子搬到大陆新村鲁迅寓所，一直被保存着。那天，瞿秋白从抽斗里拿出他研究中国语言文字问题的书稿，同鲁迅讨论语文改革问题。许广平是广东人，秋白就找出几个字来，请许广平用广东方言发音，以资对证。一个上午的谈话，主题差不多就放在他研究的语文改革方案上了。这份珍贵的文稿几经修改誊抄，后来秋白交给鲁迅完整的一份。鲁迅审慎地保存下来，解放后成为烈士的珍贵遗物。

九月十四日上午，天气晴朗，瞿秋白夫妇又去拜访鲁迅。鲁迅和许广平热情地留他们吃了午饭。这期间，杨之华在秋白鼓励下写完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秋白对之华说：“拿去给大先生看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大先生是瞿秋白对鲁迅亲切的尊称，因为鲁迅在兄弟中居长。鲁迅在十八日上午收到这篇署名“文尹”的小说，下午便修改好，用纸包好送回给之华。杨之华翻译的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经秋白修改校完以后，鲁迅当即收进他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由良友公司出版，还未取得稿酬，但他想到秋白夫妇生活上的窘迫，便从新近所得的版税中抽出了六十元给了杨之华。在这之前，秋白和之华在上海得到了一本俄文书《中国故事》，他们非常高兴，特别喜欢其中的《八月四日夜晚》这一节。这一节描写了武汉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开会的情况，汪精卫叛变前武汉那伙国民

党要人在农民革命运动面前的丑恶嘴脸被揭露得活龙活现。作者是一位身临其境的俄国人。秋白对之华说：“故事是真实的，人物刻划得很深刻，描写得也很生动。这不只是俄国朋友写得好，主要是我们农民兄弟干得好！”在秋白的鼓励下，之华把《八月四日夜晚》译成了中文，秋白对译文逐字逐句作了校正。

这年十一月，鲁迅因在北京的母亲生病，动身往北京去，只有许广平和海婴在家。下旬有一天，瞿秋白夫妇得到警报，发现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瞿秋白立即转移到鲁迅家中，杨之华为了甩掉那个跟踪的叛徒，在外面转了三天三夜。瞿秋白不放心，请人到街头寻找，终于在一个下午在马路上相遇。杨之华等到天黑时分，才来到鲁迅家。三十日那天，鲁迅返回上海。他们亲如一家，朝夕相处，其快慰可想而知。

过了两天，瞿秋白夫妇托人到一家大公司买了一盒价格昂贵的高级玩具，送给三岁的海婴。瞿秋白在盒盖上写明每个零件的名称，有几件，共几种等等，都很详尽。当时秋白夫妇收入很微薄，鲁迅夫妇深感不安，但体会到他们爱护儿童，给儿童培植科学知识的心意，就在不安中接受了这件礼物。瞿秋白在不时遭到追捕的日子里，总是预料自己随时有可能遭到不测，所以意味深长地含笑说：“留个纪念吧，让孩子大起来，也知道世界上有个何叔叔。”鲁迅深受感动，在日记中写道：“……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维宁是瞿秋白笔名魏凝谐音。

下旬一天深夜，陈云同志坐着一辆黄包车，把戴在头上的铜盆帽挪低到眉毛以下，把旧西装大衣的领头翻起盖满两颊，

由弯弯曲曲的小路到了北四川路底一个地方就停下了，付了车钱，往四边一看，没有人“盯梢”，就迅速地走进了沿街一座三层楼住宅的大门。他是秘密地来到鲁迅寓所接瞿秋白夫妇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的。他走上三层楼右首那间房间的门口，门上留着一个同志预先做好的记号，他轻轻地扣了两下。里面出来了一位女主人。他问：“周先生在家吗？我是×先生要我来，与×先生会面的。”女主人就很客气地请他进去。瞿秋白一切已经准备好了。一个包袱装着几本书和一些稿子，还有一个包袱装着他和之华的换洗衣服。陈云问他：“还有别的东西吗？”

秋白说：“没有了。”

“为什么提箱也没有一只？”陈云奇怪地问道。

秋白说：“我的一生财产尽在于此了。”

鲁迅穿着一件旧灰棉袍，站在旁边，脸上显出庄重而带着忧郁的神色。

秋白问陈云：“远不远？”

“很远，我去叫三辆黄包车。”陈云正准备下楼去。

鲁迅这时忙说：“不用你去，我叫别人去叫车子。”说着就招呼女主人去叫黄包车。

秋白指着鲁迅，对陈云说：“你们会过吗？”

陈云和鲁迅都答道：“没有。”

秋白说：“这是周先生，就是鲁迅先生。”又指着陈云向鲁迅说：“这是×同志。”

鲁迅担心地问陈云：“深夜路上方便吗？”

陈云说：“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蓬子撑起，路上

不妨事的。”

一会儿，女主人回来说：“车子已经停在门口。”

陈云说：“我们走吧！”他就帮助杨之华提了一个包袱走到门口。秋白向鲁迅说：“我要的那两本书，请你以后就交××带给我。”又指着陈云向鲁迅说：“或者再请×同志到你这里来拿一下。”陈云答应说：“隔几天，我来拿。”开门下楼时，之华还在和女主人话别，鲁迅又对秋白说：“今晚上你平安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他和许广平焦虑地站在门口，目送着秋白下楼，连连说：“好走，不送了。”秋白回头望了他们一眼，说：“你们进去吧。”他们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直到秋白夫妇和陈云下了楼，才听到三层楼上关门的声音。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有一天，中央局得到了一个情报，说国民党当晚要去破坏党在紫霞路一带的一个机关。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秋白夫妇的住处。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立即赶到秋白那里，商量找个地方赶快转移。急切之间，秋白忽然说：“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周先生那里。”黄玠然想到鲁迅住处也可能并不安全，但由于时间紧迫，想不出更好的地方，就决定亲自护送秋白夫妇转移到鲁迅家里。黄玠然在鲁迅寓所的门上按了一下门铃，一个穿着长衫的老人开门出来，他一眼就认出是鲁迅。鲁迅显出惊奇的神色，正要说话，黄玠然一把就将秋白推进门去，鲁迅立即看出是秋白夫妇，连忙把他们迎进屋里，许广平马上烧了咖啡端了出来，招待客人。

二月十七日，正在周游世界的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来到上海，宋庆龄于宅邸设午宴招待。鲁迅应邀乘车赴宴，会见了

肖伯纳，同席的有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还有伊罗生、史沫特莱女士等人。并照相留念。傍晚，鲁迅回到寓所，就把当时情况向瞿秋白夫妇和许广平复述了一番。这件事引起了瞿秋白的重视。

肖伯纳在上海，不过半天多功夫。然而，全城传遍了肖的“幽默”、“讽刺”、“轶事”。关于他的记载，中、英、俄、日各报上，互相参差矛盾得出奇，捧与骂、冷与热、村与俏样样俱备。鲁迅和瞿秋白认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便决定把这些评论收罗起来，编辑成书。于是许广平跑到北四川路一带，从大小报摊搜罗当天各种报纸；鲁迅与瞿秋白边看边圈定篇目，许广平和杨之华忙着剪贴，鲁迅和瞿秋白连夜编辑成《肖伯纳在上海》，3月即由上海野草书屋印成发行。鲁迅为这本书作了序，瞿秋白翻译并编校，用笔名“乐雯”。乐雯是从鲁迅笔名“隋洛文”衍生而出。他们同用一个笔名。表明这本书是他们战斗友谊栽培的果实。鲁迅说：这本书“确是重要的文献。……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瞿秋白也说：“这本书当作一面平面的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肖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阿Q这个典型，不仅是秋白与鲁迅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且是他们一直研究着的一个社会课题。瞿秋白从青年时代就喜爱鲁迅的小说，并有深湛的研究，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就在《荒漠里》一文中，称赞刚出版不久的《呐喊》为空谷足音。他写的《学阀万岁》曾批评了“阿Q时代死去了”的错误观点，指出“阿Q式的贫农雇农还到处多有”。直到就义前，他在狱中还说，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很可以再读一读。当秋白与鲁

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纵情交谈中，有那么一回，又接触到了阿 Q 这个典型，秋白就随手画了一幅“阿 Q 手执钢鞭图”。这是由十个 Q 字母组成的一幅绝妙的阿 Q 画象。图上还题着阿 Q 经常得意地唱着的那句唱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这幅阿 Q 图，构思独特，落笔简炼，信手画来，逼真传神。它把阿 Q 全身都浸透了阿 Q 气息，阿 Q 精神深入骨髓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也是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的一个天才的创造。想起当年秋白在“OS 原稿用纸”上信笔画来，鲁迅在一旁会心地赞赏着，两人不禁相视而笑的情状，怎不令人心弛神往呢！

二月底，瞿秋白和杨之华离开鲁迅家，转移到中央局内部交通科主任高文华家里居住。高文华家是党中央在上海的一个秘密机关。高的夫人贾琏比杨之华大两岁，也做内部交通工作。他们每月生活费才二十八元，还要抚养两个孩子。瞿秋白夫妇就把生活费交给他们一起生活。贾琏总是做些秋白爱吃的菜，让他早些恢复健康。瞿秋白最爱吃蘑菇豆腐和螃蟹，但贾家又没有那么多钱去买这些贵东西。秋白看出贾琏的心情，有一次给了她十元，她就一下子买了十只大螃蟹和其它菜，还打了一些酒，秋白边吃边笑着说：“我翻译一篇文章，就可以得到稿费十几元哩，大家一起吃吧。”贾琏已有两个孩子，又怀孕了，为了坚持工作，不得不去医院打胎，那天傍晚才回来，她一到家，之华就拉着她，一定要她一起吃红枣人参汤，说手术后需要补养。贾琏知道这汤是之华为秋白准备的，不肯吃。但他们怎么也不肯，便陪着贾琏一起吃。这件事使贾琏终生难忘。

鲁迅自瞿秋白离去以后，总想为他们夫妇寻找一处比较安定的住所。他通过内山完造夫人的帮助，在北四川路施高塔

路东照里十二号租到一个亭子间，瞿秋白夫妇就迁到这里。一天下午，鲁迅来看望秋白夫妇，并赠堇花一盆，以示祝贺乔迁之意。不久，鲁迅家也由北川公寓迁居施高塔路大陆新村九号，在东照里斜对面。两家住在同一条马路上，一在路西，一在路东，相距很近。鲁迅几乎每天到东照里来看秋白，谈论政治、时事、历史、文艺多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有时晚间，秋白也到鲁迅家倾谈一番。秋白家许多日常生活之需也由许广平代劳了。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的时候，就开始与鲁迅合作杂文。现在，有了比较安静的环境，他又继续写了一批精美的杂文，经与鲁迅讨论或修改，由许广平誊抄，鲁迅用自己的笔名寄出发表。前后共有十四篇杂文凝聚着他们的战斗友谊，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瞿秋白写作这些杂文的情形，往往是这样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刚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这些杂文在运笔用墨上与鲁迅有些相似，在刻画社会典型上也与鲁迅相近。另外，他们还合作选编了第一本介绍苏联版画的《引玉集》，瞿秋白节译了楷戈达耶夫《十五年来的书籍版画和单行版画》一文作为代序。鲁迅在后记里说：“我毫不知道俄国版画的历史，幸而得到陈节（秋白笔名之一）摘译的文章，这才明白一点十五年来的梗概……”他们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使中国美术家从中得到教益，努力创造出中国的革命的艺术作品，促使中国的艺术在苦难

的土地上开出鲜艳的花朵，故取名《引玉集》。

瞿秋白住进东照里十二号以后，鲁迅送来了他自己的书。秋白对之华说：“我感到很对不起鲁迅，从前他送的书都在机关被破坏的时候失去了。这次我可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以前，他已反复研究过鲁迅的作品，不断与鲁迅交谈、探讨，可以算是十分了解鲁迅和他的杂文了。秋白在这个亭子间里，用了四个日夜，编成了《鲁迅杂感选集》，亲自撰写了序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对鲁迅及其杂文做出科学评价的光辉论文，就是这样诞生的。

瞿秋白的那支生花妙笔始终不停顿地在耕耘着，播种着。他在完成《〈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后，又开始写作新的论题了。一天下午，他正伏案疾书，突然楼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人向他们的房间走来，脚步声越来越响。接着是砰砰的敲门声。瞿秋白夫妇大吃一惊，急急忙忙把桌上的文稿、书刊收藏起来，然后，杨之华镇定地走去开门。

啊！原来是鲁迅来了。秋白夫妇兴奋得开怀大笑。

· 鲁迅站在房门口，脸上布满了皱纹，长着一簇大胡子，显得那么高兴又那么天真，笑呵呵地对杨之华说：“你不是说听惯了我的脚步声吗？这次你听出来了没有？”

杨之华也笑着说：“今天大先生的脚步走得特别有力，我还以为是警察呢！”

“我是故意走得重些，叫你们猜不着的。”

鲁迅走进房间，坐在椅子上吸着香烟。瞿秋白把那篇《序言》拿给他看。鲁迅感动地边看边沉思起来，香烟头快烧着他

的手指了。鲁迅冷静而恳切地说：“我只觉得说得太好了，应该对坏的地方也多提些。”

那天，瞿秋白与鲁迅对杂文的种种，谈得很久很久。鲁迅忽然说：“要骂就骂吧，我就是硬骨头，骂不倒我；我就是要用杂文同他们战斗。”当时，鲁迅的名字一直排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暗杀名单上。但鲁迅一向横眉冷对，无所畏惧，仍然经常坐在内山书店。瞿秋白多次提醒他注意安全，这时又劝他到苏联疗养，编写中国文学史。鲁迅坦然地说：“要杀就杀吧，我就是不走。况且真要走，那么多的书也无法搬走。”鲁迅看到秋白的病容，从长远考虑，反而热诚地劝瞿秋白到苏联去疗养和写作。他很为秋白处境担忧和不安。有一天曹靖华在他家里，他就说到秋白“不断地被猎犬搜索、追逐。……有时一天迁三、四个地方。……到最危险时候，就逃到这里。”其实，鲁迅也明白，这时的秋白已经没有去苏联的自由了。他愿以一颗赤诚的心，安慰在暴风雨中搏斗的秋白。就在这期间，鲁迅亲笔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

疑众道兄属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洛文录何瓦琴句

疑众（众是冰的本体字），系瞿秋白笔名，洛文是鲁迅的笔名，何瓦琴是清代钱塘人何溱。这两句是鲁迅录自何的集楔帖联句。借以表达他和瞿秋白的终身不渝、生死莫移的知己深

情。瞿秋白夫妇在亭子间里高兴地挂起了这副珍贵的对联。

到了六月，东照里住所的安全又叫人担心。有一天，杨之华听见女房东说，上海滩有土匪，有拐子，也有共产党。又发现这个女房东拿了一大串钥匙，很可能打开过他们的房间，翻开抽屉检查过。于是，他们不得不离开东照里，搬到冯雪峰住的江苏省委宣传部机关里，地点在王家沙鸣玉坊一家花店的楼上。过了个把月，党的一个机关被敌人发觉了，又牵连到这个住处，必须在半点钟以内搬出。冯雪峰夫妇随时都可以转移到哪一个熟人家里去，可是秋白怎么办呢？在紧迫的情况下，秋白夫妇不约而同地说：“到周先生家里去吧！”外面正下着大雨，天气闷热，他们带上一点行李，坐上黄包车，扯下车篷，安全地到达鲁迅家里。鲁迅不仅忘我地保护秋白的安全，还无微不至地关怀着秋白夫妇的生活。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载：“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其实，《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当时鲁迅还没有收到，瞿秋白夫妇遇到紧急的险情，东西丢得精光，仓促来避难，鲁迅关心他们的生活急需，便先将编辑费二百元交给了秋白夫妇。

不久，组织上分配杨之华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任秘书工作。他们夫妇又搬到机关去住，还是和高文华家住在一起。不料九月的一个深夜，突然传来了警报，他们和高文华家立即分别离开了这个机关。瞿秋白夫妇还是决定到鲁迅家去。他们先后坐着黄包车动身，差不多同时到达大陆新村鲁迅寓所，只是一个在前门，一个在后门，时间已是凌晨二时许，几乎同时敲响了前后门，惊动了鲁迅全家。许广平惊愕地披衣而

起：“这么晚了，怎么前后门都敲得这样急？”鲁迅早已知道自己被“扬长而去”的英雄们指定为“受武力征伐”的“赤色作家”，“鲁迅被捕”的消息也曾不止一次在报纸上出现，因而鲁迅此时是异常镇定的。一会儿，他从门内听出前门似乎是秋白的声音，许广平便马上下楼去开门，只见秋白夹着一个小衣包，仓促走来。鲁迅走近后窗，在暗夜中看见后门站着一个女人，模样像杨之华。许广平又去开了后门。杨之华带着高文华的女儿高平一同进来。虽是一场虚惊，瞿秋白夫妇却因惊扰了鲁迅夫妇而深感不安。但鲁迅仍然一如既往，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挚友，并笑着说：“你们同猎狗们周旋，险些把密斯许弄糊涂了。”许广平为他们做了夜餐。在这危难之际，瞿秋白夫妇从心坎里感到了什么是生死与共的友谊。

几天后，高文华找妥了住处，瞿秋白夫妇便离开了鲁迅家，转移到机关去住。这是瞿秋白夫妇最后一次在鲁迅家避难。

就在这个时候，王明控制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又抓住瞿秋白以“狄康”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文章，无限上纲，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做出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再次打击瞿秋白，诬陷瞿秋白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看不到苏维埃与红军的伟大力量”，与中央“相对抗”，等等。责令他在党内公开检查什么“严重的有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求全党对他“开展最无情的斗争”。矢志献身共产主义、气度非凡的秋白，在被国民党特务的追逐中，却要在党内“低头认罪”，接受“最无情的斗争”。

此时秋白确实感到身心交瘁，他对中央当时的政策有怀疑，但连思考和发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剩下检讨的“权利”。他有感而发，写下了一篇《“儿时”》。他在文前引了“狂飙文献耗中年”的龚定庵诗句“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显然，此文要抒发的是人生的感慨。秋白襟怀坦白，富有自我解剖精神，他的人生感慨自然是真诚的。他说：“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则，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所以，杨之华说：“秋白在当时写的《“儿时”》这篇文章意味深长地说明了：在这不寻常的三年中，他为什么能够一如既往，依然如此惊人的‘伟大的精力’，像‘永久的青年’似地献身于党的事业。然而此时险恶的环境，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攻击，使他在深层意识里产生了一种矛盾和苦闷。他想，如果不能给这世界再干些什么，那么，“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将会“像铅一样沉重，压在他的心头”。他会感到生命的“停止”，“中年以后的衰退”。因而要“想念”和“祷告”“无知”的“儿时”，“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这是一颗创伤的心灵在厄运中，对生命意志的呼唤，是清醒的人生在残酷打击下呈现的一种复杂心态。

转瞬又到了雪花纷飞的冬天，忽然有一个来自鄂豫皖苏区的神秘的不速之客，到内山书店寻访鲁迅。原来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以后，他推行王明“左”

倾冒险主义军事方针并大肆进行“肃反”，使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遭遇了严重挫折。深秋时节，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在抱病主持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决定转变对敌斗争方针以后，派成仿吾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工作，他在成仿吾的衣襟上密写了简短的介绍信，署名用的是俄文。成仿吾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出国，在法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廖承志一起办《赤光》杂志。一九三一年回国后进入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和红安县委书记。他到达上海时，中央已经转移到了江西瑞金，过去接头的地点已不能再用了。成仿吾在上海福州路一家小旅馆里等了将近一个月时间，又患了疟疾，日夜心急如焚。他无意中从一张国民党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咒骂鲁迅是“准共产党”，成仿吾与鲁迅曾经有过笔墨之争，但成仿吾深知鲁迅与党的关系，便下定决心去找鲁迅。他走进了内山书店，内山骤然看见成仿吾，惊讶地说：“哎呀，你还活着！”原来成仿吾离开上海文艺界以后，国民党报纸几次造谣说成仿吾已经死了。成仿吾微笑着回答说：“我到上海来养病的。”他又问道：“鲁迅先生怎么样？我想见见他。”内山把成仿吾带病来访的消息告诉了鲁迅。鲁迅便约成仿吾在北四川路底一家白俄人开的咖啡店里会面。

鲁迅回家后，派女佣人给茅盾送去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有一熟人从那边来，欲见兄一面，弟已代邀明日午后×时于白俄咖啡馆会晤。第二天，茅盾准时来到幽静的白俄咖啡馆，鲁迅已在等候。他们同成仿吾虽打过不少笔墨官司，却从未见过面。一会儿，郑伯奇来了，随着进来一个又黑又瘦的小个子，他就是成仿吾。他们此时见面，彼此都很激动。鲁迅拉着成仿吾

的手，让他坐到自己身边。

成仿吾低声地说：“我想找一个党员，你有办法吗？”

“可以，你来得正巧，再过几天，就困难了。”鲁迅记下了成仿吾的住址。

成仿吾又对茅盾说：“令弟泽民在鄂豫皖苏区病故了。”茅盾的心骤然缩紧，脱口道：“这不可能！”仿吾说：“那边环境太艰苦了，他的工作又十分繁重，身体本来单薄，又得了严重的疟疾，在缺医少药又无营养的条件下，就支持不住了。”茅盾又问：“是哪一天？葬在哪里？琴秋（即沈泽民夫人张琴秋）呢？”成仿吾答道：“十一月二十日，我离开苏区前夕去世的，就地埋葬了。琴秋不在身边，她随红军主力去路西了。”大家听到这里，都在哀痛中默不作声。待了一会儿，鲁迅打破了压抑的气氛，站起来说：“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告辞了。”茅盾就陪鲁迅一起走出咖啡馆。途中，鲁迅问：“令弟今年三十几了？”茅盾答道：“虚岁三十三。”鲁迅叹息说：“啊，太年轻了。”将到大陆新村时，茅盾问鲁迅：“你答应仿吾找的党员是秋白吗？”鲁迅点点头，脸色黯然，没有说出别的话来，因为他担心秋白受到再次打击以后，不知那些“左”派英雄又会给他安排什么样的前途。这时茅盾接着说：“这件事我让德沚今天晚上去通知之华，你就不必自己去了。”鲁迅说：“也好，那就拜托你了。”并把仿吾的地址交给了茅盾。

第二天，高文华来到小旅馆里，通知成仿吾住进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不久，成仿吾便告别鲁迅，前往苏区瑞金。

一九三四年一月，瞿秋白服从中央决定，就要离开自己热

爱的文学园地，前往中央苏区了。这个消息，鲁迅在与成仿吾见面前，已有所闻。他深想与秋白话别，而秋白在临行前，也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渴望，无论如何要去和鲁迅、茅盾叙别，作一次长谈。他深切地关怀着最亲密的战友和左联的工作，今后天各一方，就很难再有见面的机会了。四日夜晚，秋白来到了鲁迅家。他和鲁迅分别三个多月，彼此都有很多话要说。鲁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在沉默中顿时涌起一股既兴奋又惋惜的心情。他相信秋白到那令人神往的地方，定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就说：“到那边去是极好的事。”并要秋白保重身体要紧。但他又为“左联”少了一位有思想有才华的领导人而黯然神伤。鲁迅夫妇满怀惜别之情，恳留秋白在家里住了一宿。他们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秋白睡，而他们睡在地板上。这天夜晚，秋白把《乱弹》等稿本托鲁迅保存。他和鲁迅交谈了左联方面的工作，还为鲁迅翻译了一封给苏联木刻家希仁斯基的信。第二天秋白又到茅盾家告别，晚上，平安回到寓所。他满面笑容地对杨之华说：“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也说了，大先生和茅盾身体都很好，海婴也没病。”谁知他们这次相互道别，竟成了文坛双璧的永诀呢！

第五章 “我们一定能重见”

当瞿秋白一九三三年秋冬因《斗争》等刊物上写的文章被诬为“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不得不写下违心的检讨书《我对于错误的认识》。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调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去。那是一天晚上，有一个同志来到秋白家，通知秋白：“中央来了电报，要你去中央苏区。”秋白不假思索地说：“想去很久了。”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像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过了一会儿，他提问说：“之华可以同去吗？”那个同志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我可以把这个意见反映给组织。”第二天，那位同志带来了这样的答复：“之华要等有人接替她的工作后才能走。请你先走吧。”当年王明集团的要人，凡从白区到苏区，或

从苏区到白区,有谁不是携眷同行呢?唯独身患重病的秋白,却不能让他的妻子杨之华一同到苏区去工作,并照料他的生活。

那时,一位素稔已久的同志热诚地劝他:“左联需要你,你的身体正需要调治,不可以请求不去吗?”

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

“那么,之华跟你一起去吧?”

“不,组织上还没有同意,因为找不到接替她工作的人。”

在离别的前一天,秋白一直忙于整理近三年来的著译。杨之华在住所的楼下参加一个会议,休息的时候,就上楼去看看他。秋白正在桌上整理着什么,之华走到他身边,他对之华叹息地说:“可惜《茨冈》没有译完,来不及完成了。”他拿起稿子又放下,自言自语地说:“随身带去又不可能。”

平时,瞿秋白的工作往往从白天持续到深夜,在静悄悄的夜里,他弯着腰低着头在书桌上工作着。这一夜却不同。当杨之华醒来的时候,总看见他还在整理着什么,或者轻轻地踱着步或者坐在椅上抽烟沉思。黎明时分,他看见之华醒了,就悄悄地走过来,拿着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把它们分成两半,对之华说:“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开以后,不能通信,就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重见时交换着看。”他又指着桌上的一叠书说:“这是你要读的书,我给你整理好了。我还给你订了半年的读书计划。”他又不胜遗憾地说:“我爱读的这许多书不知能够保存到什么时候,希望你快来,如有可能,书也带来。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相见,……”之华温存地说:“不要紧的,过去我们离开过六次,不是都重见了么?这次当然也会

一样的。”

秋白凝思了一会儿，突然感动地紧握之华的手说：“之华，我们一起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被捕牺牲是意料中事。你还记得广东周文雍、陈铁军夫妇一同英勇上刑场的照片吗？即使我们不能共享胜利的喜悦，那样牺牲也是无上幸福的。”

之华回答说：“嗯，万一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是瞿秋白离开上海的日子。那天晚上杨之华与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各出一元钱，叫了一个菊花锅，买了些苹果，做了一顿较丰盛的晚餐给秋白饯行。深夜十一点，秋白离开寓所到轮船码头去，外面下着大雪，寒风凛冽，秋白穿着单薄的寒衣，拖着病弱的身体，迎着风雪向前走去，快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在白雪纷飞中，在昏黄暗淡的路灯光下，凝视着之华，缓慢地说：“之华，我走了！”之华很自信地回答：“再见，我们一定能重见的。”

之华又送了秋白一段路，一直看着他的影子消失在黑魑魑的大街尽头，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的视线落在秋白的那张整齐的书桌上。令人触目的，是秋白替她订好的半年读书计划，和准备她读的一叠整齐的书。她抬头环视房间的周围，壁上挂着秋白穿过的一件旧单衣。她感觉到，似乎秋白还没有离开他。当她脱了衣服上床时，看不到那个弯着腰低着头伏案写作的秋白，才感到他确实离开了。半个月后，之华收到秋白托人带来的一封短笺，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二月五日，瞿秋白抵达江西瑞金。仍任教育人民委员。其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在战争条件下，在原来是

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瞿秋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写了一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计划，召集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他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强调了战争时期的教育路线，不同意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

瞿秋白到瑞金后，还担任了国立苏维埃大学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学员都是年龄在十六岁以上、曾在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工作半年以上或在边区参加过革命斗争、能看懂普通文件的工农分子。为使他们掌握管理苏维埃政权，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各项建设的知识和技能，课程包括苏维埃工作理论、实际问题和实习三类。既学政治、文化，又学与政府各部门有关的业务知识。瞿秋白除在苏维埃大学讲课外，还应邀到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讲授政治理论课程。红军大学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在瑞金西郊正式开学的。校长兼政委是何长工。第一期学员有六、七百人。当时在高级指挥科学习的，有程子华、彭雪枫、宋任穷、张宗逊、郭天民、邹建屏、曹里怀、黄苏、苏静、周子昆、杨梅生等；在高级政治科学习的，有刘道生、韦国清、苏振华、唐亮、郭鹏、邹荣等。他们都是对红军建设立过功绩，在反“围剿”战争中功勋卓著的红军高级干部。

作为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开拓者，瞿秋白非常热爱和重视苏区的群众性文艺工作。教育部下属的艺术局，始终是在他的关注和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他到苏区不久，教育部便批准了《工农剧社简章》，规定工农剧社是工人、农民、红军、苏维埃职员等研究革命戏剧的组织，以发展戏剧战线上的文化革命斗

争、赞助苏维埃革命战争的艺术运动为宗旨。中央工农剧社，是由外地来的少数文艺爱好者和红军中高级干部组织起来的，很短时间，省、县、区也都组织起工农剧社分社。工作范围扩大，文艺工作干部也随着需要增加，中央苏区就创办了第一所戏剧学校，瞿秋白提议以高尔基来命名，由艺术局长李伯钊任校长。瞿秋白指出：“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他推荐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和戏剧《下层》说：“那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他希望高尔基戏剧学校培养苏维埃戏剧运动与俱乐部、剧社、剧团的干部，说：“没有戏剧工作骨干，就谈不到什么工农戏剧运动。”

当时，戏剧学校缺乏师资、教材、设备，创办是很艰难的。他们在瑞金附近找着一个破庙，略加修理，建设了一个室内剧场。瞿秋白用鲁迅的话来鼓励大家：“路是人走出来的。”又说：“革命的戏剧学校在苏区还是初生的婴儿，慢慢抚育吧！不要性急。”

有一次戏剧学校所属中央剧团演出了《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剧以后，瞿秋白召开了编剧、导演、演员的会议，称赞这个戏的成功。这出戏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和第五次反“围剿”之间，搜集了广昌一带白军残暴蹂躏赤白交界区老百姓的材料写成的。一个不满十岁的儿童团员和他双目失明的姊姊，用生命来保守党的秘密，至死不说出红军的行踪。这出戏无论到哪里演出，观众都被感动得高呼：“打死白匪！”

瞿秋白兴奋地说：“这一出戏应当到边沿区到处去演，解决群众斗争最尖锐的矛盾，暴露白军的残暴，鼓励群众如何同白军作斗争，增加边沿区群众胜利的信心。”同时，他也指出剧

中有的台词显得生硬、抽象，听起来不入耳。他说：“要用活人口里的话来写台词，不要硬搬书上的死句子。务要使人一听就懂，愿意听，喜欢听。让群众闭上眼睛听，也能听出来是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讲话。语言艺术是戏剧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瞿秋白还热情鼓励大家搜集民歌来填词。在庆祝“二苏”大会上，云集区俱乐部唱了几只歌子很好听，后来打听出来都是江西老百姓中最流行的《竹片歌》、《砍柴歌》、《十骂反革命歌》。他笑着对大家说：“通俗的歌词对群众教育作用大，没有人写谱，就照民歌谱填词。好听，好唱，群众熟悉，马上能流传。比有些创作的曲子还好些！”

瞿秋白平易近人，与戏校、剧团的同志相处十分亲密融洽。那时，为了防空，戏校迁到梅村，离教育部三二里路。他常常来为教职员和学员讲政治课、文艺理论课，解答时事问题。他的丰富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解，在听众中激起浓厚的兴趣，常常发出笑声。他一走出校门，总有一大群学员和教职员围住他，他每次都笑着说：“隔两天，我再来听‘哎哟来’（兴国县最好的青年农妇歌手刘秀章的别名）的兴国山歌。”两个最小的演员秋兰和郭滴海每次都把他送到教育部才回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还担任了《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红色中华》报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最初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后来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当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中心。《红色中华》报的宣传报道围绕着这个中心，大力地宣传了扩

大红军的运动，大量地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了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一些地方在扩大红军中的缺点和错误；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号召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巩固红色政权贡献自己的力量；还积极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报社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吸收群众参加办报，成立了通讯部，制订了开展工农通讯工作的计划，规定了组织和培养通讯员的一套办法。通讯员队伍由创刊初期的二百多人迅速发展 to 近千人，形成了一个包括各地区各系统的通讯网络。报纸发行量也增加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偏僻的山区甚至国民党盘踞的中心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工作时，住在一间狭小的土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破旧桌子，一张木椅，几条长板凳，许多文件、书籍都放在一块长木板上，这就是他的卧室兼办公室。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苏区，造成生活上的严重困难。那时粮食是按人分配的，每人每天十四两到一斤四两，用席芋做的袋子装着，袋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各人的姓名，一起放在锅里煮或在甑里蒸。食盐越来越紧缺，每人每天只有一钱。有一次某同志送给他几两盐，他特地把徐特立留下，请他吃了一顿有盐的菜。在那个“办公室”里，秋白穿着之华在白区为他做的深米色棉布中装，坐在木椅上聚精会神地起草文件，编写教材，审阅稿件，写社论，常常工作到深夜。他的屋里经常挤满了一批批来请示、研究工作的人，他都给他们一一答复或研究解决，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他也经常到下面单位去调查研

究、指导工作。为了行动迅速、节省时间，他学会了骑马。往往一清早就起来骑马出去了。有时到苏维埃大学与教职员谈话或讲课；有时到梅村的戏校指导排练节目；有时又到《红色中华》报社讨论发稿，了解情况。他还骑马跑很远去看望生病的同志。有一次，他骑着马飞跑着去看正在养病的王稼祥等同志，同志们感动地说：“你带病来看病人，我们病好后一定去看望你。”

的确，在紧张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秋白的肺病不时地发作，之华又不在身边。他三天两头发烧，失眠。瑞金红色医院院长、名医傅连璋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他，为他诊病，开药、打针。但是，他躺在床上，也还要看文件，审稿子，处理工作中的问题。那时治疗肺病，针药是次要的，营养是主要的。然而哪里弄到营养品呢！有时邓颖超大姐从几里路外，亲自跑来，送点面粉和白糖给他，并亲手煎几张糖饼给他吃。他总是拿出来请客。秋白与群众的关系特别密切，可以说是“水乳交融”。房东家的老母鸡生下蛋，总是省下来留给秋白吃。他每次都婉言奉还，但在盛情厚谊之下，也只好收下了。战友们看到他单薄的病体，非常焦虑，便设法弄来几条鱼，煮好后送到他跟前时，他总要问这是从哪儿来的，并要分给大家吃。

秋白和周围的同志相处得很好，亲如家人。晚饭后，常常和同志们去散步、谈心，有时同大家一起打乒乓球，有时还帮助大家写作或到群众中去搜集民间歌谣。他的秘书庄晓东，经常在秋白面前问道：“中央怎么还不将华姐调来？你实在太需要她了。”秋白淡淡地说：“好久没有得到她的消息，还不知她的工作、生活怎样。真叫人烦闷。”

自从瞿秋白离开以后，杨之华的处境更加困难了。一个单身女人甚至连房子都租不到。当时又发生了党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先后被捕叛变的事，上海党组织再次受到了破坏，杨之华的安全也面临着严重威胁。一天夜晚，她突然接到迅速转移的暗号。她想起以前曾和秋白多次到鲁迅家中避难，但现在形势险峻，她不愿再去惊动先生，便决定冒险回自己娘家去。

之华的哥哥和妹妹，这时都住在上海北京路，她已很久没有跟家里联系。连秋白赴中央苏区的事也没有告诉家里，以免他们担心。这晚她赶到家里，只见妹妹之英在。秋白夫妇在武汉时，之华曾带之英在身边，那时她还在上学，已能帮助秋白传递信件，做秘密工作还有些经验。之华要求她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之英沉着地想了想，说：“姐姐，咱们家是巡捕们经常光顾的地方，你是不能在家里住了。福熙路有个远房亲戚，不妨去他家里看看情况。”

之英叫之华化了一下妆，叫了一辆出租车，俩人一起到了那位亲戚家。之华一看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家住的楼房下面开着一个舞厅。那位亲戚也感到这里不适合，他立即叫之英带姐姐到辣斐德路他父亲家里去住。之华姐妹又坐上出租车来到辣斐德路，看到那里的环境也不安全，只得再想办法。之英急中生智，蓦地想起了在复旦中学工作的一位亲戚周仲丹。她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叫开了周家的门，这时已是深夜了。周仲丹表示理解之华的处境，愿意把亭子间腾出来让之华住下，她们也认为这里环境幽静，适合隐蔽。之华非常感激，到了亭子间，放下皮箱，坐在椅子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她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日子，又受到了敌人的搜查。一位在地下党机关帮助

工作的老太太朱姚,把她接到自己家里,住在一间小破屋里。她剪掉了自己的长发,改扮成普通女工的模样。

由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苏区和白区的交通已经中断,秋白的一切音讯也随之断绝了。之华在紧张的转移中不时地牵挂着秋白,不知他的心情怎样,身体恢复得如何,不知何时才能重见。正像秋白在戎马倥偬中想念着她一样。真是“我梦君时君梦我”,一种相思,两地离愁。

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领导,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一方面军(中央苏区工农红军)的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人员八万多人,从江西的瑞金、雩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先后出发,向西突围转移。举世闻名的长征开始了。

自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央苏区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一直是博古当总书记,王明在莫斯科以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的身份当“太上皇”,以电台遥控。这次全军转移的重大战略行动及一切措施,都是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实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当时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这次战略大转移,中央领导核心早有准备,并非仓促行事。但在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下,连政治局也没有讨论过。还做了严格保密,连项英、陈毅等高级领导人都不知道这一重大战略转移的意图。”许多中央领导人和军队高级干部,直到动身转移时都不了解中央确定转移的目的、目标和部署等。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聂荣臻等同志奉命回到瑞金时,去见毛泽东,本想打听一下转移去哪个方向,毛泽东不谈这个,却提议去看看瞿秋白办的一个图书馆。

此时，瞿秋白仅仅知道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利，红军主力即将西撤。他渴望中国革命摆脱“左”倾的桎梏，由此开拓新的征程。同大家一样，他已做好准备，整装待命。殊不知瞿秋白三字早已被列入“另册”了。他的命运已由“左”倾宗派主义者另做了安排。原来，“三人团”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由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提出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张闻天要求随军转移，张表示同情，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

秋风萧瑟，黄叶飘零，人们以悲切的眼光，依恋地望着红军大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党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在人们无限关注的送别声中随军撤走。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就的宣传品、纸张和兵工机器等等“坛坛罐罐”，都沉重地驮在骡马身上被带走了，干部、家属、伤病员在大军保护之下陆续西行。

可是，身患肺结核的秋白却不能随军转移，被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为了和老同志话别，他请了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璋等同志在简陋的住处，吃了一顿便饭。在饭桌上，大家有许多话要说又没有说出来，沉默中，秋白举起一只酒杯，向大家说：“这酒杯是之华在白区临别时给我的。我，并代表之华向大家敬一杯酒，祝同志们一路顺风。”大家的心宛如铅块一样沉重。似乎在词汇里竟找不到一种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境对秋白的关切和留恋，只是恳切地劝慰秋白保重身体。秋白神色黯然，默默地与同志们一一握手告别。

好久以来，瞿秋白对“左”倾宗派主义支配下的政治生活

萌生过一种厌倦情绪，感到十二万分的疲劳。对于实际生活，常有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很想仔细地尝试一下而又不可能。他这多病的躯体被留下来打游击，他也感到异常愤慨。正如伍修权在回忆录中说的：“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秋白身体根本不能适应游击环境，也被留下了。但是，秋白把这一切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忍辱负重地干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他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他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组织上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服从”，这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了。

然而，有一个人却和他有着心灵上的共鸣，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个曾经为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亲撰序言的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向敬佩的。他们政见相同，都受排挤。这一年他俩常常纵马于郊外丛林，诗词唱和，或促膝于图书馆，纵论古今。有时，毛泽东看到沉思中的瞿秋白，便开玩笑地说：“你是不是在想念杨之华呀？”当毛泽东得知“三人团”决定秋白留下时，他很同情秋白，并向中央局提过意见，但他感慨地说：“我的话不顶事。”在一次中央政府的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向大家说明战争的情况，提到哪些干部跟部队一起转移，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当时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参加转移，毛泽东心中有许多话要说，却不能说出来，只是喃喃回答：“秋白同志的要求下面再谈吧。”当年，毛泽东已被诬蔑为搞宗派活动，其实毛泽东和瞿秋白仅仅是逆境中的知己，革命道路上的战友。后来，在遵义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就赶紧电告中央江西分局，“妥善”安顿秋白等同志。可惜，那时

秋白已系狱于汀洲了。直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毛泽东与萧三在延安谈起牺牲了的秋白，还说：“假如他活着，现在领导边区文化该有多好啊！”

秋白在瑞金还有一位知交，即国民经济人民委员吴亮平。这个《反杜林论》的第一个译者，同秋白在上海一起搞过左翼文化运动，他们是友谊殊厚的老战友。当他在那一次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上听说秋白被留下时，心里很难受，在会场上小声问了一下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秋白同志走？”毛泽东感叹地说，他在中央局的会议上对他们（指掌权的人）说过，但他们不同意。后来，吴亮平又请求张闻天向中央反映过秋白的要求，但是，孤掌难鸣，大局已定，再也无法改变三人团的决定了。红军转移之前，他邀秋白在家里把酒叙别。秋白的情绪特别激动，喝酒也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我一生虽然犯过错误，但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全党同志有目共睹。祝你们前途顺利，祝革命顺利成功，我无论怎样遭遇，无论碰到怎样逆境，此心可表天日。”吴亮平想到红军主力快离开了，苏区人民和留下来的同志，一定会遭受敌人残酷的镇压和蹂躏，不禁为秋白的前途担忧，依依惜别之情如汹涌波涛在胸中起伏，两位才华横溢、风度翩翩的战友，不得不在眷恋难舍的拥抱中痛苦地分别了。

秋白随即迁到瑞金城外三十里下肖区。在一块菜地旁，有一座茅屋，这就是秋白离开沙州坝以后办公的地方，不断传来纷乱的马蹄声嘶鸣声行军脚步声和铁器碰击声。红军大部队经下肖区相继开拔，一派庄严、肃穆、悲壮、紧张的气氛弥漫在

金秋的土地上。

年过五旬的教育部副部长、苏维埃大学副校长徐特立仓促赶到茅屋前，跳下马来，给秋白喂马的年轻饲养员亲热地招呼老校长，跑过来牵马，秋白闻声走出屋来，紧紧握住了徐特立的手。

徐特立恳切地说：“秋白，我是专程来向你告别的。”

“今日匆匆一别，不知何时重聆教诲！”

“我没有想到你会留下。愿我们今后还能携手合作。”

秋白面露笑容，抑制着心底的痛楚，轻轻地说：“但愿我们不久就能相见。”

徐特立紧抱秋白双肩，嘱咐道：“秋白，身体要紧，多加保重啊！”

秋白转过脸来，望望徐特立的马，若有所思。忽然，他高声招呼自己的饲养员：“小家伙，你把我的那匹马给老校长，你也跟老校长一起转移吧。”

徐特立感动地凝望着秋白，眼圈湿润了。他焦急地说：“你这身体，没有一匹好马，没有强壮的饲养员，怎么行？”

“我行，行，请你放心吧，你年纪大，跋山涉水，得要匹好马。你带小家伙一起走吧。”

车辚辚，马萧萧。秋白站在行军道旁，昂首望着远去的铁流，饲养员伴随徐特立依马而行的背影渐渐地在铁流中消失了。秋白触景生情，不禁低吟：

“挥手从兹去，萧萧斑马鸣。”

其时，适逢陈毅伤愈出院。他和项英一起留守苏区，负责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后方办事处和留守部队军事委员会的领

导工作。他得知秋白尚未撤走，便匆忙赶到下肖区，把自己的快马送给了秋白。

“你快骑上我的马追赶部队。”

“不行，中央已决定我留下来。”

“唉！”陈毅焦急得跺脚：“我们要转入打游击，可你的身体，中央应当考虑嘛！”

秋白露出了宽慰的笑容：“不要紧，我会跟你们打游击，搞戏剧的。”

陈毅望着秋白，无可奈何，暗自思忖着：如今已不能随军西撤，而左翼文化战线，鲁迅那边，又多么需要你啊！

秋白以抱病之躯留守在闽赣边游击区，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兼后方办事处教育人民委员。虽然他无法拂去万分疲乏的感觉，心灵深处的创痛难能完全忘却，但他身上始终拥有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那就是他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于事业的执着，对于人民的热爱。当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他想到苏区人民养育了自己，支持了革命，感到愧对苏区的人民和土地。他能够留下来略尽自己的一份责任，略报恩情于万一，内心是感到安慰的。在抵御敌军进攻的日日夜夜里，他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辛勤地做了许多工作。这是秋白在中央苏区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财富。

《红色中华》报在瞿秋白的领导下，在中央苏区继续出版发行。为了不泄露中央机关和红军西撤的痕迹，它仍标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成为党和红色政权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瞿秋白与其他两位编辑住宿在报社，担负着编辑部的全部工作任务。敌人逼近时，他们便随军行动，

迂回跋涉。瞿秋白与大家一起步行，一起爬山，沿途还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到了宿营地，大家都休息了，他还要写稿审稿。通讯员写来的山歌、民歌、歌剧、大鼓词和故事等，他都亲自修改，发表后，很受群众欢迎。他还发动周围的工作人员，在下乡工作时给《红色中华报》写稿。他与其他编辑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难，把《红色中华》报坚持到最后一期。

留在中央苏区的文艺队伍，在瞿秋白的亲自领导下，组成火星剧团、红旗剧团、战号剧团，他们在划定的战区内进行戏剧工作。文艺战士都拿起了梭镖、大刀和手榴弹，以便遇敌时作战。一九三四年底，秋白通知三个剧团回到中央分局驻地准备进行汇演。在雩都县小密附近山村的一座农舍里，团员们见到了秋白同志。秋白为他们修改剧本、歌曲，在茂密的深林里，指导他们排练。一九三五年元宵节，举行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文艺汇演，这次汇演成为最悲壮的一次纪念。部队、群众都顶着寒风，冒着毛毛细雨，赶来观看演出。那年头看戏没有椅子坐，都是站着看。秋白陪着陈毅、项英、毛泽覃、何叔衡、刘伯承、邓子恢等同志站在人群中间。演出后，秋白亲自主持评奖，编辑、出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唯一的工农兵剧作集《号炮集》，并亲自写了序言。同大自然恢复了生机一样，秋白憧憬着在中央苏区实践自己的文艺主张，迎接文艺的春天。

但是，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了。雩都、兴国、瑞金、会昌、长汀等地相继失陷，蒋介石派出十万大军采取堡垒主义作战方法，对苏区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转瞬之间，往日田无荒土、野无游民、欣欣向荣的景像，被血腥的白色恐怖所代替。“清剿区”内，如今已“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

犬，无遗留之壮丁，阉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在敌人严密封锁、百姓横遭践踏的情况下，留守机关部队的衣食住行面临严重困难，粮油食盐没有来源，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们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这样险恶艰苦的环境中，秋白的肺病日益严重了。不久，他便奉命转移，踏上了生命的最后历程。

第六章 “我唯一的亲人， 我如何不留恋？”

二月十一日，是瞿秋白向浩劫中的红都默默告别的日子。

中国红色区域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在瑞金诞生以后，秋白对这块没有民族压迫、没有封建剥削的红色根据地，心里充满多么炽烈的爱啊！如今，她正在敌人的屠刀下呻吟、抗争。秋白即将远远地离开她了，但愿不久的将来，还能再见她屹立的丰姿。这一天，秋白同准备就绪的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年逾花甲的原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以及项英的妻子、苏区中央劳动检查员张亮一行，秘密地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薄日清霜，冷风凄雨，朦胧中的乡镇静悄悄地，好似忍受着离别的哀愁，秋白不禁留恋地环视四周，想把这红色苏区最后的影像永远地留在记忆之中。

当他们到达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会昌汤屋的时候，屈指一算，已经七、八天过去了。旅途的劳顿已在兴奋中被忘却。那时，奉命一道转移的妇女部长、司法人民委员梁柏台之妻周月林也已先期到达汤屋。邓子恢是奉命去福建永定一带领导游击战争的，何叔衡等人则是取道香港转移到白区搞地下工作的。他们在汤屋稍事逗留，便在福建省委的布置下，向长汀方向匆匆启程。秋白满怀信心，觉着向希望的目的地渐渐靠近了。他想：如果真的回到了鲁迅那边，投身到反文化“围剿”的另一战场，文学抱负将得以实现，之华可以助自己一臂之力，病自然会好的。

闽西二月，春寒料峭，风雨无常，在环回起伏的峦谷中，崎岖泥泞蜿蜒曲折的山路上，由福建省委派出的一支九十来人的便衣武装，护送着三个普通的香菇客商和两个衣着朴素的女眷。这一行人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鞋已经磨破，腿都走得肿了。上了年纪的何叔衡、久患肺病的秋白行走特别艰难。张亮、周月林早年都是上海女工，身子筋骨还算强健。不过，张亮怀有身孕，体态肥硕，一双小时缠过的脚，行动也不方便。周月林苗条身材，面目清秀，模样温柔，行军时却挺有几分劲儿。他们同甘共苦，相互砥砺。既要对付敌人的封锁，还要克服旅途的艰辛。

过去，在秋白的记忆里，留下过江南环溪的广阔田野，山岗竹林里的初恋；留下过莫斯科郊外晶映光莹的雪原，山坡桦林里的友情。现在，他又在山野乡村的怀抱里了，却全是另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象。从赣南到闽西，无论岗岭、丘陵、山村，足迹到处，满目凄凉。且看，这是怎样一幅图画：碉堡林立，烽烟

四起，田亩荒芜，渺无人烟。武夷茶萧条了，荔枝、龙眼、柑桔、橄榄枯萎了，铜铁矿在地底沉睡，著名的瓷器、竹器、漆器集市已销声匿迹，蔚为奇观的垂枝榕树也遭到砍伐。流星残月凄暗无光，枯藤老树絮絮低叹，凝凝细露，炎炎云苗，一切都在悲愤地控诉着河山破碎之苦，金瓯残缺之恨。在秋白那疲惫的躯体内，升起一阵阵怒火：国民党反动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多么令人诅咒！他盼望早日拿起笔来，像鲁迅那样，向全世界揭露这一切。

大约这月的二十四日拂晓，秋白一行终于越过了敌人的重重封锁，抵达长汀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附近。他们迂回辗转，忍饥耐寒，实在疲乏极了。不过，一到水口镇这地方，面对出险就平之势，舟楫便利，心怀不禁为之开阔。黎明之际，天气特别寒冷，大家饥肠辘辘，便决定在这里开饭，准备略事休息，就到山里隐蔽起来。

水口镇水陆畅通，地主武装甚是活跃。“义勇队”队长范连升，这天清早闯过小迳村，发现了秋白一行的踪迹，喜出望外，一心想着将要到手的奖赏，便疯狂地奔到保安十四团第二营驻地，向营长李玉报告：“小迳村附近发现小股共军。”由于这一地区情报网已遭破坏，加之护送队长是一个麻痹大意，吹牛撒谎的人物，以至当李玉率队围攻小迳村的时候，护送队竟处于无所戒备的状态。七零八落，仓促应战。护送队长一见寡不敌众，便窜进丛林，逃之夭夭。群龙无首的护送队随之涣散。邓子恢洞察情况的变化，果断地指挥大家迅速突围，经过一阵激战，队伍没能冲突出去。敌人包围得紧，火力猛烈，护送战士的血洒在岩石和野草上面。这时，何叔衡已英勇抗击一个时辰，

子弹打得所剩无几了，眼看无法突围，便对邓子恢说：“子恢同志，我革命到底了。”说罢，举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右脑。邓子恢急忙上前说：“你千万别这样！”正要赶去夺他的手枪，而手枪已经击发了。何叔衡从山崖上滚落下去。

瞿秋白在激战中勇敢沉着，不顾个人安危，但他身患重病，连续奔跑，已经精疲力竭。邓子恢顶着枪林弹雨奔过去叫他赶快向外突围，可是，他说：“我病到这个样，实在走不动了，别为我牺牲其他同志，你们快点走吧。”邓子恢三番五次劝他走，但他实在无力动弹了，就在茂密的树林中隐蔽起来。张亮、周月林也在附近的山洞里藏了起来。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邓子恢一鼓作气，带领战士奋力冲出重围，到山下河边，把剩下的战士集中起来，用机枪阻击追敌，边打边走，终于离开了长汀，向闽西而去。

这场战斗结束以后，敌特务连代理连长曾起和传令兵熊辉，走过河边山下，发现身受重伤的叔衡双目怒睁，倒在田间。他们凶神恶煞似地从何叔衡身上搜出港币五百元。原来秋白一行从瑞金出发前，组织上发给每人交通费一百元，大家委托何叔衡保管。抢到这笔港钞的曾起、熊辉得意洋洋，刚走了几步，眉头一皱又转了回去，朝何叔衡打了两枪，以杀人灭口。何叔衡就在这苍凉的山脚下壮烈牺牲了。

这一天中午过后，乌云蔽日，峦谷死一般的沉寂，昏鸦栖息于秃树残枝，燃烧过的枯木朽株吐着悠悠白烟。敌兵已经蹒跚下山了。隐蔽在半山灌木中的秋白，小心翼翼，正在观察动静，待机行动，想要回到自己的队伍。可是，不料，被搜山的地主武装“义勇队”的两个卑琐而凶恶的队员发现了。张亮、周月

林同时被俘。他们都被押解到了水口镇。三人一起都被关在营部最里面的一间房子里。他们趁此机会，便悄悄地商定了一套对付审讯的假口供。

水口镇一带属福建省地方反动武装保安十四团的防区，团长是无恶不作的地头蛇钟绍葵。他刚从长汀回到水口镇，哪里想到小别三日，二营竟得到小迳村的大胜。他听了李玉的报告，心里乐滋滋的，脸上堆起猖狂狡猾的狞笑，双手抚摸着缴来的德造驳克枪、港钞和黄金，凭他那猎犬的嗅觉，便判断这一行人可能是落网的共产党“要人”，就迫不及待地刑讯鞫秋白。

在一间特设的刑讯室里，镇定沉着的秋白坦然坐在一张木椅上。虽然病容清瘦，而那锐利的目光炯炯有神，情态沉稳平和。

钟绍葵、李玉各据一张台子，文书在李玉的台子边做记录。灯光昏暗明灭，照着他们的面孔，显得格外狰狞可怖。

钟绍葵操着一口福建官话：“你是哪里人？什么职业？往哪去？老实招供，免得皮肉受苦！”

鞫秋白答道：“本人林琪祥，江苏人，北大文学系毕业，后又学医，民国二十一年在漳州被红军掳去，送往瑞金，一直做医助及文化教员。”

“你们到水口镇要干什么？”

“今年一月，我逃离瑞金时，被苏区地方武装发现，抓回看押；准备再逃时就在小迳村被你们俘虏了。”

“那两个妇女呢？”

“那胖的叫周莲玉，是香菇客商的太太，另一名黄秀英当

过红军护士,也是从瑞金逃出来的。”

钟绍葵听过这番供词,哪肯甘休,便连声吼叫:“用刑,用刑!”可是他得到的,依然是同样的回答。

第二天,钟绍葵、李玉率领匪兵沿汀江下行,将秋白押解上杭县城,囚禁于上杭县监狱。接连几天不断的审讯,钟绍葵都没有得到他所梦想的结果,便寄希望于酷刑。而酷刑早已是秋白意料中事。秋白心里明白,严刑逼供并不单单反映敌人的残忍,还说明敌人的虚弱。他相信自己编造的“供词”和“呈文”,可能迷惑敌人的眼睛,挣脱这沉重的镣铐。在那不知何日了的苦刑之下,他都始终如一地申述着符合逻辑的“出身”、“经历”,机智地掩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也保护了张亮和周月林。贪婪的钟绍葵对自己的判断开始动摇了。

不过,暗无天日的狱中生活使秋白病体受尽煎熬。狭窄阴湿的牢房,秽气蒸熏,加之伤病交迫,身体日益衰惫。在刑讯室里,他有铮铮铁骨,而回到牢房,已头晕目眩,手足无力,时发潮热,长此下去,暴露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他想,只有抓紧时机,陈述病情,要求取保开释,才有可能脱离敌人的囚笼。敌人虽然不会轻易放他们出狱,但此时也已不将他们视为“要犯”了。过了几天,就允许可以保释。

不久,周月林被李玉的伯母出而保释。据说,她的侄媳妇快要生孩子了,想请周月林这个女“护士”去接生。这时,上杭县的糖果店老板林鸿昌,听说张亮怀了个孩子,就保出了张亮,当他的“姨太太”。

钟绍葵恐怕瞿秋白病死牢狱,也就同意一旦取得殷实可靠的铺保,可以开释。

秋白在狱中终日与铁窗为伴，他在孤独中，想到正在曲折道路上艰险前行的党，也想到自己的坎坷人生路。现在他同党与红军都已无法联络了。他只有向亲密的知己鲁迅、相依为命的爱妻杨之华伸出求援之手，希望在上海找到铺保，营救他出狱。

这时鲁迅也很思念秋白。他还是在一年前接到过秋白的信，那是秋白在即将到达中央苏区的赤白交界区的途中写来的。这年二月七日，曹靖华到上海鲁迅寓所，鲁迅把他引到三楼一个小房间里，窗前一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桌上，摆着铅笔、毛笔、墨盒、信封、拍纸簿等等，桌前放着一张靠背椅，后墙放着一张单人床。鲁迅对曹靖华说：“这是秋白逃难时住的房间，一切布置照旧，你就住在这里吧。”可见他对秋白怀念之深切。他在致友人的四十多封信中都写到秋白，念他“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

年底，一天晚上，杨之华去拜访鲁迅。见鲁迅身体欠佳，似大病初愈，便问他身体为什么这样不好。鲁迅没有回答，却心情沉重地反问道：“听说秋白在苏区病死了，这个消息确实吗？”杨之华顿时心神不安起来。她镇定之后，对鲁迅说：“我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消息不一定确实。”这时，鲁迅不胜感慨，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啊！”后来，杨之华向苏区来的同志打听得知秋白健在，随即写信告诉了鲁迅。

现在，鲁迅于怀念之中，突然接到了秋白以林琪祥名义写的狱中来信。信上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讯，不知你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

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做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俘虏了，你是知道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信使鲁迅感到吃惊、忧伤、焦急，严峻的脸上布满愁云。他深知暴君蒋介石决不会放过秋白，深信秋白也决不会屈服于蒋介石。但他估计秋白的身份尚未暴露以前，还有营救出狱的一线希望。于是，他多方设法筹资，计划开设一个铺子，营救秋白出狱。

鲁迅焦急地想把这消息告诉杨之华，派人到处寻找她。当时上海党的组织已遭到极大破坏，杨之华的住处也被敌人搜查过，为了鲁迅的安全，她已中断了同鲁迅的联系。鲁迅找了二十多天没能找到她。不久，她通过考试进了英商的班达蛋厂，和工人群众生活在一起，就像鱼归大海，可以安定下来了。她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询问是否有秋白来信，有无可能同秋白通信。鲁迅知道她的下落，立即回了信，说有紧急事，叫她赶快派人来取信。不料，她日日夜夜盼了一年多的却是这样一个五雷轰顶般的不幸消息。鲁迅还给她附去五十元钱。过了几日，杨之华又接到周建人一封短柬，要她去取一封要信。之华派了一个青年工人到商务印书馆取信。这信是秋白寄到商务印书馆，请编辑周建人转给杨之华的。信封背面还盖了一个蓝色长方形印章，表示信已经过监狱检查。秋白在信上告诉之华：听监狱的人说，如有殷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做保，是可以释放的。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杨之华再三考虑，便把秋白的

信交给了组织，又派了一位相貌秀丽、仪态大方的妙龄女郎去商务印书馆告诉周建人：党在设法营救，可是没有找到现成的铺保。目前考虑开设一家新铺，把人保出后再关闭。但新铺登记，又恐引起特务机关注意；恐狱中的秋白保出，外面的同志又有可能被捕，终非万全之策。最后，杨之华通过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了以牧师身分为掩护的秦化文同志，秦找到一个旅馆老板，写好了铺保证明。杨之华连夜亲手为秋白缝了两条裤子，把铺保证明连同五十元钱一起从邮局寄往上杭。可是，第二天报纸上竟赫赫然登载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

五月十一日，《中央日报》两行醒目标题：“共党首领瞿秋白及项英妻张亮、梁柏台妻周月林被俘获”，“瞿秋白伪名林琪祥”。

杨之华只觉天旋地转，一阵眩晕。当她清醒以后，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最后一条路了，就是依靠社会舆论，公开营救秋白。她写了一封信同时给宋庆龄、鲁迅、茅盾、柳亚子、陈望道、周建人、郑振铎等人，请他们设法出面营救。鲁迅得知秋白身份已经暴露的时候，在藤椅里木然坐着，低头无语。他想，立志献身共产主义的秋白既已暴露，必将英勇牺牲。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闻它兄（秋白用过笔名屈维它）大病。且甚确，恐怕难以医好的了。”但是，他还要尽最后的努力，为秋白的生存而奋斗。他支持杨之华，力促发起公开营救运动，还恳托蔡元培出面从中奥援。可是都未能实现。柳亚子写给杨之华一封回信，说：“接来信，怅然！孙夫人被监视，我亦一样。心有余，力不足，事与愿违，千万保重身体。”后来当他见到之华再次提及当年不能营救秋白之事时，又说这是他“引为终身遗憾之

一，甚愧他日无以见秋白于地下也”。

杨之华悲痛欲绝，甚至想去长汀监狱，陪着秋白一起赴难，恨不能像周文雍、陈铁君那样。待到冷静下来，理智终于克服了感情，她要化悲痛为力量，坚持秋白未竟的事业。

大约五月底六月初，有一个陌生人来到杨之华母亲家里，说他是与秋白同狱的所谓同情者，秋白让他捎来两封信，一封给之华，还有一封给之华的哥哥。杨之英偷偷来找之华，告诉了这些情况。之华对妹妹说：“这可能是敌人派来‘钓鱼’的坏蛋，你不能领他到我这里来。”之华要妹妹把那两封信要到手。但结果只拿到秋白给她哥哥的信，信的大意是：想来你们已经在报上看到了我的事。我要和你们永别了。之华是我生平的知己，我要留最后的一封信与她永别。可能她也已经被捕，你们不知道她的下落。那么，就请你们把信投寄给叶圣陶先生作为写小说的材料吧。

秋白给之华的那封诀别信，那个陌生人始终不肯交出来，他只把信在杨之英面前晃了晃，那是一封很厚的信。他再三说：“瞿秋白要我把这封信亲手交给杨之华本人。”之华的妹妹说：“已经几年没来往，到哪里去找呢？你愿把信留下是可以的，不留下也没有什么，反正我们不知道她的下落。”这个神秘的人无法达到“钓鱼”的目的，以后就没有再去找之华的家属。之华虽然非常想得到秋白给她的诀别信，但她不能上敌人的圈套，只能放弃这封宝贵的遗书。

当年，局外的人们还不可能知道瞿秋白身份被暴露的内幕。现今它已成为历史上令人怵目惊心的一场悲剧。

四月中旬的一天，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

下，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之妻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虏。这个女人在敌人的利诱之下，供出了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在濯田地区被俘的信息。这一火急情报在敌营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通过电讯很快传到了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接着又迅速地传到了驻防长汀地区的第三十六师和龙岩第二绥靖区司令部。蒋鼎文电令火速在濯田地区所捕人员中追查。这时，三十六师也已从被俘的长汀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供词中获悉瞿秋白等已先被捕。当天，紧急电令就下达到保安第十四团。

钟绍葵立即下令将已保释的张亮、周月林重新收押，亲自率队押解到龙岩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不久，张亮、周月林被第二绥靖区军法处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九三七年十日，驻闽绥靖公署以张、周“在狱谨守规章，行状善良，且体弱多病”为由，将她们提前释放。

瞿秋白在保安第十四团和三十六师派遣的一支部队押送下，沿汀江溯流而上，从上杭乘船到河田，然后步行到长汀。水陆兼程，栉风沐雨，大约走了十多天。秋白沿途目睹山河变色，想到灾祸流乱，饥寒万里，他早年的歌吟仿佛又在耳边响起：“漫天痛苦谁念，倒悬待解何年！”

囚禁秋白的监狱是在原长汀中学里面，也就是重兵驻守的第三十六师师部。五月十日，即秋白抵达长汀的翌日，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等人组成了特种军法会审庭，审讯瞿秋白。

秋白穿着一身浅灰色长布袍，浅口布鞋，蓝色线袜，从容地走进法庭，坐到预先备好的被审席上。虽然长途颠簸，已是极度疲劳，但他胸有成竹，处之泰然。吴淞涛发问以后，瞿秋白

回答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和被俘经过。这时，吴淞涛霍地站起来，伸着头，狡黠地诈问道：

“你不叫林琪祥，你是大名鼎鼎的瞿秋白，民国十六年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

“我是林琪祥，所说皆系实话。”瞿秋白镇定自若，面不改色。

吴淞涛神气活现，招呼左右。只见被俘投敌的叛徒郑大鹏一副惶恐猥琐的模样，狼狈地走了进来，秋白略略瞥视，若无其事。郑大鹏卑屈的目光不敢正视秋白，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吴淞涛吼叫似地：“郑大鹏！你认识这位先生吗？”

郑大鹏吞吞吐吐：“认识，认识。”

吴淞涛猛拍桌子：“他是谁？”

“他，他，他是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说着，那脑袋无力地耷拉下去。

吴淞涛宛如稳操胜券，得意洋洋地说：“瞿先生，请不要冒混了吧！”

秋白沉思良久，昂起头来，哈哈一笑，坦然地说：

“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话是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在上杭的‘供词’、‘呈文’，算是作了一篇小说。”

国民党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湖南人，中等身材，长方脸形。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最年轻的一个，一九三四年，在与红军作战中，他负了重伤，住医院医疗。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出院，才从龙岩回到长汀。这时瞿秋白拘押师部已有十

多天了。他的参谋长向贤矩出身保定军校，老成持重，年纪比宋希濂大得多，是宋希濂亲自聘请的高参。当然宋很信任这个长者。宋在上海就医时就曾致电师部对瞿秋白“要优待”，主要为“软化”。他回到长汀以后，考虑到汀州是共军老根据地，乡间农民不忘共产党，通衢街道还不时有共产党标语出现，瞿秋白久押此地，如有差错，怎样向“中央”交代，为此感到责任重大，踌躇不已。他对向贤矩等仔细交代：“对如此重大政治犯，一要严密看守，二要生活上优待。既然他身患重病，就该派个医生治疗。”从此瞿秋白的伙食就照师部工作人员一样，另外有时还加几两酒，并有医生看病。

秋白囚室在三十六师师部大院内。进大门有个小天井，右侧栽有石榴、桃、李等花木，左侧有一棵广玉兰披洒一片浓荫。向左边走去，便是一个厢房，长约一丈余，宽不到一丈，有地板，门向南，窗向西，门侧还有木质花格窗两扇，窗可透光。室内有张中国式的木床，安置在东边靠墙，秋白的一只皮箱放于床之一端。三抽桌在西边靠着窗户，还有两把木靠椅。房间北头放着一个洗脸盆架。瞿秋白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数十个铭心刻骨的日夜。

一九二四年前后，瞿秋白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宋希濂当时读过他的著作，敬仰他的学问。国共分裂以后，第三十六师已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宋希濂也跃居显赫的“剿共”将领之列。不过，他对瞿秋白的爱国抗日主张，内心是钦佩的。面临半壁河山沦亡，他也曾忍受过身为军人却不能为国捐躯的痛苦。“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曾要求参加淞沪抗战，可是，未获批准。宋希濂回到长汀第三天，便到瞿秋白囚室看

望，他们先交谈了一些生活情形和身体状况，便转而谈到政治问题。

宋希濂说：“瞿先生，我这次回来，从龙岩到长汀这一段，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不少的房舍被毁坏了，我想以前不会是这样荒凉的。这是你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是农村里生长的，当了多年军人，走过许多地方，有五百亩地以上的地主，在每一个县里，都是为数甚微，没收这样几个地主的土地，能解决什么问题？至于为数较多、有几十亩地的小地主，大多都是祖先几代辛勤劳动积蓄起几个钱，才逐步购置一些田，他们的生活水平如果同大城市里的资本家比较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向这样的一些小地主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因此，我觉得孙中山先生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

瞿秋白沉思一会儿，便侃侃而谈：“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这是对于国家的伟大贡献。但中山先生所标榜的三民主义，把中外的学说都吸收了一些，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革命。中山先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大都市里，对于中国的社会情形，尤其是农村状况，并没有认真调查研究过。中国的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里，只是地区之间有程度的差别而已。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剥削。……有地主，就有被剥削的农民，有资本家，就有被剥削的工人，怎能说阶级斗争不适合于我国国情呢？”

宋希濂不时地插话，同他争论。而他的论辩总是鞭辟入

里、无懈可击的。他说：“宋先生，你一路上看到有些地方人烟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形，当然是事实。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人搞阶级斗争弄得劳动力减少了，有土地没有人耕种。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为了保卫苏区，有许多青壮年人参加红军或地方武装，使农村劳动力受到一些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对苏区施行严酷的封锁，苏区的经济完全靠发展生产来自给，在你们未向我们进攻以前，这些地方并无荒废的情形，你们来了，老百姓逃跑了，土地无人耕种。我想主要的是这个原因。”

宋希濂的顽固观点决定了他是不会后退的，他进一步引经据典地说：“根据江西省政府最近的调查报告，说自民国十六年共产党在南昌暴动起，随后在农村搞分田运动，一直到共军退出江西根据地，仅七年的时间，江西省人口减少了八百万。我过去读历史，说黄巢杀人八百万，感到寒慄，今天你们搞阶级斗争，更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西省政府的调查报告，是有意夸大数字，借此来诬蔑共产党。在激烈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人员的伤亡和人口的减少，是免不了的。造成这种情形，主要应由国民党负责，因为国民党先后调集了百万以上的军队和飞机大炮来围攻我们……”

宋希濂对瞿秋白的辩论并不信服，但也无从反驳，便怏怏然告辞了。

自从瞿秋白的身份被识破后，军统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闽西属下张超“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进行审讯，又从南京派出“要员”取道江西赶到长汀，开展诱降活动。经过二十多天的

威胁、利诱，瞿秋白的立场、意志依然坚不可移，军统遂以瞿秋白“思想顽固，意志坚决，无法挽回”为由，报请南京中央军事委员会处置。

在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期间，瞿秋白曾经写了一份供词，约四千余字。吴淞涛等细看一遍，顿然怒形于色。原来这供词概括言之，首段写瞿秋白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叙述刚到苏区之感，文末写苏区之政治设施。用审讯者的话说，瞿秋白在文中“极尽鼓吹之能事”，“与其说是供词，莫如说是对共产党的颂词”。

但是，在敌人软硬兼施、频频诱降的日子里，秋白的肺病又加重了，脚气病和神经衰弱也更加厉害。给他治病的军医陈炎冰，这一天下午轻轻地走到秋白床边，“瞿先生，你又受苦了，让我检查一下。”瞿秋白爽朗地说：“刑讯逼供也好，诱降也好，皆意料中事，他们想诱我到南京疗养，然后进国际问题研究所工作，岂非白日做梦。”陈炎冰放下听诊器，嘱咐秋白：“你肺部湿罗音又严重了，药要增加剂量。多加保重。”秋白感叹地说：“谢谢你的关心。你的经历我很同情，陷污泥而不染，难能可贵啊。”

原来陈炎冰早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学医时加入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到日本专攻温泉学，回国后失业，遂在军队从医。虽然与党脱离了，心底依然向往着革命。他很同情秋白，悉心为秋白治病，在生活上细心地照料着秋白。

这时，秋白握住陈炎冰的手，恳切地说：“我托你一件事：请把我给郭沫若的信设法投到香港去。他一定在报纸上读到我的新闻了，想起我们在武汉时两人一夜喝了三瓶白兰地，不

禁哑然失笑。”

陈炎冰接过信：“我一定设法。”

瞿秋白又说：“我那张照片已题过字，你拿去吧。”

这照片原来是师部为上报情况，请了摄影师给瞿秋白照的，陈炎冰悄悄让摄影师多洗了一张，拿来请秋白题词留作纪念的。

陈炎冰拿起这张半身照片，顿时热泪盈眶。秋白在照片下方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这并不是格言，也不是哲理，

而是另外有些意思的话。

这几句诗如电流一般，在陈炎冰脑际盘旋。血，在他的脉管里沸腾。他想，敌人也许要消灭秋白的躯体，但是秋白的精神是永生的。秋白叫炎冰不要难过，他讲起同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等苏俄友人在莫斯科河边的春游；也讲起赤色十月工厂中的庆祝晚会，列宁登台演讲的盛况。陈炎冰从悲伤中清醒过来，他聚精会神地看着秋白写下的《浣溪沙》：

廿载浮沉万事空，
年华似水水流东，
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
江城辜负落花风，
黄昏已近夕阳红。

这时，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坚韧不拔的革命者，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勇浮沉的形象，他渐渐地理解了秋白对人生历程的反思和赴难时的思考，他被一个革命者对于生与死的严正而诚挚的态度所感动了。这首《浣溪沙》和七绝《梦回》，都是秋白在狱中有感而作，这是诗人在生命的尽期留下的最后的手迹。

又一天，秋白吃过晚饭，在书桌上燃起一盏煤油灯，火焰不时轻轻地跳动着。远处的犬吠，近地的蛙鸣，烘托着狱中的孤寂。秋白坐在木椅上，沉吟良久，然后伏案铺纸写下《忆内》二字，不知不觉回到了那逝去的年代，他在这首集唐诗中，曲折地表达了对爱妻杨之华的关切、思念之情：

夜思千里恋旧游，
他生未卜此生休；
行人莫问他年事，
海燕飞时独倚楼。

秋白身陷囹圄，怎能不时时思念生命的伴侣，每当夜深人静，就会魂牵心系。他想，生命已到了尽期，此生再也不能相会了。如果还有来生，能否重新相聚，也很难预料了。当年共同战斗和生活的往事，就莫要去过多的回想，只是如今她的处境

不知怎样，也许她正在依楼遥望那遨翔的海燕而期盼着我的消息吧。

他的《梦回》，不仅表达了他在狱中对亲人、对同志们怀念之情，而且闪烁着一种执着于事业、希冀于未来的理念和激情。他是这样写的：

山城细雨作春寒，
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
偏留绮思绪云山。

为什么他参透人生，置生死于度外，到了万缘俱寂的境界，却偏有无限的绮思环绕着云山呢？因为他心中的情和爱是不会熄灭的。

瞿秋白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狱中固然要潜心对付敌人的阴谋诡计，忍受着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不过，难得有些余暇，他能重温诗书篆刻，一抒胸臆，倒也怡然自得。有时没有石头，他就用残余蜡烛捏成印章坯子，用小刀刻章。对于那些附庸风雅、求诗索印的军官，他也随和应允，借以宣传革命真理，因而师部属员对瞿秋白极为好感，向贤矩为此八次调换看守人员。

天气渐趋炎热，一天上午，秋白穿着青布短裤，神态暇逸，正在书桌上刻印章，忽然门口传来生疏的声音：“瞿先生！”他转过脸来，只见李克长彬彬有礼地说：“鄙人《国闻周报》记者，特来访问。”秋白不卑不亢，爽然答道：“欢迎，请坐。”但未放下

手中刻刀。

“久闻先生擅于篆刻，不胜钦佩。”李克长随即找到了这个话题。

“狱中无事，借以消磨时间。”

“吟咏亦先生所好吗？”

“此调久已不弹，狱中偶有所作，已积有十余首了。”

秋白随手抽出一张宣纸，把手中椭圆形闲章印在纸上，“犬耕”二字十分鲜明。

李克长走近观之良久，问道：“何谓犬耕！”

“耕田得用牛，无牛则赖犬耕。秋白自一九二三年从苏联回国以后，一直做着‘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

“不知杨之华现在何处？”

“一说其因机关破坏已被捕，一说已回娘家居住，但均系得诸传闻，未能证实。余深为惦念也。”

李克长转而问道：“先生与鲁迅、郭沫若、丁玲关系如何？”

秋白顷刻悟起许多往事，激情难已，起身徘徊，力作平静地说：“鲁迅并非党员，他发表作品完全出于个人志愿。郭沫若到日本后，中央原谅其苦衷，已准其脱党。丁玲原是上海大学学生，与我已故妻子王剑虹甚为要好。那时尚未脱孩子脾气，常说我是喜欢自由的。作家要有创作自由啊，其作品甚为可读。”

李克长又问起党中首要过从甚密者何人，凄然引起秋白的感念，他说：“党方人物较为熟悉，惟军事首领，不认识者居多。毛泽东、朱德、叶剑英诸人熟悉多年，彭德怀见过两面，知

其别号‘石穿’，耐人寻味。”

李克长听得兴味盎然，问道：“先生近来意绪如何？对前途抱何感想？”

秋白指着窗外，山青水秀，花草茂丽，便说：“这世界是美丽的，焉能不为之留恋。不过共产党人的生命属于人民，为革命而牺牲，是人生最大的光荣。”李克长深感有幸，难得面聆哲人的宏论，想了一想，又问：“先生近来有何新作？”

秋白从桌上捡出一个本子交给记者，这是一本黑布面英文练习本，用钢笔蓝墨水写满挺秀而整齐的字，封面贴有白纸浮签。

“我花了一星期功夫，写了这本小册，题名《多余的话》，这不过记载我个人的零星感想，至于我的身世，亦间有叙述。后而有一记忆中的日期表，某年做某事一一注明。我还打算再写两本，补充我所想讲的话，共凑成三部曲。不过恐怕已无时间了。”在“记忆中的日期表”里，他准确地记下了“与杨之华结婚于沪的”岁月，也记下了“与王剑虹结婚”和“剑虹死”的年月。

李克长凝神翻阅两页，不忍释手，看看怀表，已近中午，便向秋白告辞了。

当向贤矩把这《多余的话》面呈宋希濂的时候，曾感慨地说：“真是大手笔，它像汀州产的橄榄，嚼了饶有余味。”宋希濂拿起这个本子，浏览着，揣摩着，不觉陷入了深思。他想，共产党既不是神也不是魔鬼，首先是人，真正的人。只不过瞿秋白比普通人更坦白，更富有情感，更富有天才。如果海枯石烂，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他果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敌党。多少年来，他看到共产党的烈士能如此无情地解剖自己，真诚地表

白对世界的留恋，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篇《多余的话》里，秋白写到《告别》时，最感到难割难舍而又歉疚于心的，自然是之华和独伊了。让我们听一听那发自肺腑的声音吧：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我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弱，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早在五月底，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接到军统关于处置

瞿秋白的请示电报时，宋希濂也分别打了一个电报给蒋介石和蒋鼎文，因为他听说三十六师有调动的消息，他要请示瞿秋白的问题如何处理，在电报里还谈到如送去漳州，怎样解决路上的安全问题。蒋介石郑重其事的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瞿秋白的处置问题。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执委戴季陶、军统总头目以及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等人都参加了会议。一九三五年瞿秋白针对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写过《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严正驳斥戴季陶的反共谬论，戴久已怀恨在心。在这次会上，他首先发难：“瞿秋白之处置，关系内政外交。日本已获悉此事，认为久囚瞿匪不杀，无非图他日联共抗日，本人认为瞿秋白死有余辜，系狱过久，徒招友邦烦言。”蔡元培拍案而起：“堂堂中华民族岂能受制于外人，瞿秋白是大文学家，当今一大才子，留下来对国家有好处，杀之，有损政府威信，民心不可侮，为国家民族计，决不可杀。”

这时，陈立夫早胸有成竹，娓娓而谈：“委座高见，此事不可轻率，瞿秋白博学多才、声望卓著，影响所及海内海外，如能劝其改弦更张，比消灭红军几个师还重要。若委座有令，我局（中统）愿派干员担此重任。”

其实，蒋介石早有杀瞿之心，他开这个会是放个烟幕而已。于是六月二日，他便密令蒋鼎文，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不过，这个命令没有及时执行，因为陈立夫为了要同军统争高低，就火急约集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处长王思成、专门委员张冲、专员王杰夫等紧急磋商，星夜晋见蒋介石，呈文报请准许暂缓执行枪决，由中统派“干员”赶赴长汀劝降。蒋

介石阅罢呈文，即予批准。陈立夫交代王杰夫即刻动身，目的就是——降。只要降，可以准许他不公开反共，让他在南京主持编译局或作大学教授都可以。并说：“此行成败关系我局前途甚大，在委座前信用至大。凡事要竭尽智慧，尽最大努力。”王杰夫受宠若惊，连声答应：“决不辜负部长栽培。”

王杰夫三十来岁，北平燕大毕业，研究过宗教哲学，曾在商震军中清洗进步人士，后又做过中共一些大叛徒的劝降工作，深得陈立夫的青睐。这次他肩负重任，带着新近“转变”的中共叛徒、中统局行动科干事陈建中，从南京启程，途经福州、厦门时，又会同福建省党部秘书、调查室主任钱永建，厦门市党部中统特务朱培璜一行，于六月十一日抵达长汀。

当晚，师部餐厅灯光通明，江南丝竹低回萦绕。宋希濂等为王杰夫一行设宴洗尘。向贤矩说：“关于瞿秋白，我们已做过长时间的审讯与‘规劝’，皆无成效。近日所写《多余的话》更见其包藏祸心，执迷不悟。”宋希濂叫苦说：“瞿秋白久押此地，如有差池，我宋希濂对中央无法交代。”王杰夫傲气十足，拍着胸说：“给我时间，我们还是有办法的，委座对此寄予希望。顾顺章如何，不是投降了。”散席后，他们移到舒适的休息室，一边品茗，一边进行紧张的谋划和部署。

次晨八时，师部“谈话室”便布置好了。室内中央设有一张大型写字台，周围有几把太师椅，门侧置一大茶几，两边各有一把椅子。王杰夫、钱永健坐在写字台旁，陈建中与朱培璜坐在茶几两旁。瞿秋白穿淡蓝色中式便服，面容清瘦，却有神采。他在向贤矩带领下神态自若地走了进来。

向贤矩指着王杰夫等四人，对瞿秋白介绍说：“这几位又

是不远千里由宁来汀挽救你的中央要员。”

王杰夫等与瞿秋白一一寒暄以后，即请瞿秋白坐在写字台前。王杰夫打开皮包，取出两封信交给瞿秋白。瞿秋白凝神不接，若无其事。

王杰夫低声细语地：“这是从上海带来的你亲友的亲笔信。”

秋白这才接过书信，随口说了声“谢谢！”只朝信封看了一眼，便把信放在写字台右侧。

王杰夫带笑地说：“请看吧！”

秋白不动声色，钱永健接着说：“瞿先生，亲友的信好不容易带到这里，请自由拆阅吧。”

秋白坦然地一一拆阅信件。空气显得沉闷，他的手指翻开信笺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王杰夫明知故问：“瞿先生尊府哪里？”

秋白一笑：“江苏，王先生呢？”

“老家吉林，迁居金陵已多年了。”

钱永健插话：“听说令妹尚在杭州？”

“已有十年不见了。”秋白答道。

王杰夫开始言归正传：“奉告瞿先生，蒋委员长、陈立夫部长对瞿先生博学多才、精通俄国国情，甚为爱惜，特命我从南京赶到长汀，挽救瞿先生。”

秋白冷冷地回答：“谢谢诸位替我带来亲友的信。远道来‘挽救’我，但我听不进，有负盛意，奈何！”

王杰夫举起大拇指：“瞿先生是当代名流，声望卓著，若能转变方针，为国出力，前途未可限量。”

秋白反驳说：“当前国家存亡关键是抗日，日寇亡我东北，入侵华北、胶东。你们不去抵抗，谈何前途？”接着话题一转：“王先生，你是吉林人，你对故乡沦亡之感一定比我深刻吧！”

王杰夫一时无言以对，陷入窘态，只得连声说：“是，是，很深刻。”

王杰夫又大谈什么中枢当局对内力求统一、对外忍辱负重，统一形势即已渐趋完成，对外抵抗将步步加强。秋白听到这里，怒不可遏，立即驳斥道：“你们所谓对内统一、对外忍辱负重，就是要把抗日武装消灭掉，让日寇蹂躏我中华。”

钱永健一见苗头不对，赶紧向王杰夫使了个眼色，插嘴说：“瞿先生关心国事，令人佩服。时间快晌午了，瞿先生身体欠佳，请休息吧。”

第二天，“谈话室”布置得像接待贵宾一样。在写字台上摆了好几碟瓜子、莲心、花生、水果、糖果，还放着两罐香烟，几瓶汀州佳酿，并且摆着一盘围棋。开始，王杰夫等人嗑着瓜子、抽着烟，天南地北，笑语声声，瞿秋白与朱培璜刚对弈一局。秋白棋琴书画无所不精，朱培璜哪是对手。没有多回，便称赞道：“瞿先生高手，我服输了。”王杰夫递给瞿秋白一支烟，点上火，笑嘻嘻地说：“京沪朋友都很关心瞿先生的身体，迫切希望与瞿先生见面。”陈建中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地讲起自从瞿先生被捕的消息传到京沪，许多青年还向“中央政府”呈递意见书，要求予以考虑的机会。瞿先生学问渊博，明事理通世故，望从长计议。

秋白说得明白：“我只明马克思主义的事理，通劳动人民的世故，实与诸位无从计议。”王杰夫又说起：“各人信仰可以

不同，人之常情还是一样的。”想使秋白动思乡之情。秋白针锋相对地说：“王先生不也想家吗？东北沦陷，家破人亡何止万千，古语云：‘国破家何在！’”

王杰夫自鸣得意地接上说：“古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愿瞿先生做当代俊杰。”

秋白怒形于色：“请教王先生，什么是时务？什么叫俊杰？”

王杰夫紧接着说：“鄙人才疏学浅，我以为善于观察当前形势，善于考虑个人前途，即为识时务；能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即为俊杰。但要这样，必须生存下去，珍惜自己的生命。”

话已说到焦点上了，秋白对生死早已深思熟虑。他坦白指出：“我知道，你们也知道，事实上没有附加条件，是不会允许我生存下去的。这条件就是要我丧人性而生存。我相信，凡是真正关心我爱护我的亲友，特别是我妻杨之华，都不会同意我这样毁灭的生存。这样的生存只会长期给他（她）们带来耻辱和痛苦。”

王杰夫紧逼上来，直截了当地表示：如果瞿先生决心生存下去，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主持编译局，保证不要求公开反共、人恋故土，鸟恋旧林，希望瞿先生回到江苏。又说，顾顺章“转变”后，“中央”对他何等优待……

王杰夫絮絮叨叨，秋白斩钉截铁地打断他的话：“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我情愿做不识时务的刀下囚，不愿做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五天来，王杰夫等人对瞿秋白进行了八次劝降活动，毫无进展。这天晚上，师部会议室内灯光晃动，烟雾弥漫，茶点狼藉，他们七嘴八舌，争议纷纷，向贤矩一直嘟着嘴，认为瞿秋白

死生参透，决难动摇。宋希濂唯恐久拖不决，如有意外，负不了责任。王杰夫一想如何向陈立夫复命，便坐立不安。最后，他咬咬牙，对宋希濂说：“软的不吃，只好来硬的。师座，你看如何，明天进行最后审讯。”

翌日上午，在三十六师师部布置了一间特设的审讯室，气氛阴森。王杰夫、钱永健担任审讯，陈建中、朱培璜担任记录。他们都换了一副狰狞的面孔。秋白泰然自若，坐在中间木椅上。

王杰夫开始审讯：“几天谈话，没有结果，今天正式审问你。本人奉中央之命，专程来汀，规劝你放弃共党，归顺‘中央’，这是对你宽大为怀，你考虑了没有？”

“没有考虑。”

“你对政府之挽救、亲友之愿望都无动于衷吗？”

“没有什么好说的。”

钱永健自作聪明，想叫瞿秋白想想身后，便说：“我有个假说，倘若瞿先生不幸作古，你是否希望中共中央为你举行大规模追悼会？”

秋白毅然作答：“我死则死耳，何必谈什么追悼会，我亦不要烈士美名。”

王杰夫：“你只有三十六岁，就这样顽固不化，了此一生吗？”

“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不仅闻了共产主义世界大同之道，而且还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它。秋白纵然一死，何足惜哉！”

王杰夫说：“蒋委员长、陈立夫部长希望你回到江苏做教

授、翻译，不正是你所好吗？你要好自三思。”

“我要灵魂，不要躯壳。我早就说过：愿把躯体交给医学院解剖室。如果把它葬在土里，将变成肥料，促进树木开花结果。”

当王杰夫严词盘问“江西等地的潜伏计划，在香港、上海有什么关系”等等，秋白理也不理，拒绝回答。

宋希濂在师部餐厅为王杰夫一行设宴送别了。王杰夫与几天前到长汀时相比，宛若换了一个人，他垂头丧气，精神颓唐不安。宾主团团围坐，菜肴丰盛，灯红酒绿，只见频频举杯，却少欢声笑语。

还是宋希濂首先打破沉闷的空气，点头微笑说：“诸位长途跋涉，备极辛劳，虽说服未成，但有经验可以总结，不虚此行嘛！”

王杰夫后悔不已：“此番时间过于匆促，急于求成，方式方法不够细致。回到南京，如何向委座和部长交代？”向贤矩故意宽一宽王杰夫的心，便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是尽人事而已。”

散席以后，王杰夫看到宋希濂不胜感慨之状，轻轻地说：“师座似乎言犹未尽，不妨直说。”宋希濂拍拍他的肩膀：“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瞿秋白虽属敌党，但他确实是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我们党国就需要这样的人啊！”

在人生只有一回的生与死之间，秋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当灵与肉不能两全之时，他要奋起保护和珍惜圣洁的灵魂，宁可舍弃自己的躯体。自从来到长汀监狱，他就知道生命

只能以日月计算了。对于这位早年已把生命托付给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视死如归是很自然的。但是，在他心里却有须臾不能忘怀的事，他深深惦念着党的安危，惦念着红军的兴亡。在同王杰夫一伙斗智的过程中，他曾想方设法探听红军的行踪。许多天来，他又三番五次要求准予阅报。六月十五日，他终于获准在卫兵看押下，来到师部“新生活”俱乐部看报。他打开《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一行行清晰闪亮的标题映入眼帘：

中共中央易人，毛泽东复出指挥军事

朱毛股匪偷渡赤水西窜

朱毛股匪大部南渡乌江

陈毅股匪流窜赣边区

……

秋白仿佛看见星火在蔓延，星火将燎原，心里感到无比宽慰。他想，“黄昏已近夕阳红”。中国革命在前进，秋白虽然一死，亦可瞑目了。他的兴致也好了，饭也吃得多了。深夜，听得山城细雨，虽感孤衾料峭，但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次日清早，他便欣然写下了《卜算子》词。这首词也是写在汀州产的宣纸上，录呈陈炎冰的。陈炎冰进来给他看病时，见他难得有这样好的情绪，不觉惊奇。秋白庄重地说：“你来得正好，恐怕诀别之日已经临近。”炎冰愕然，秋白说：“王杰夫一伙的戏已闭幕了，接着就是屠刀了。”他把这首词随手交给了陈炎冰。

陈炎冰伤感地说：“自古人云：为医者治病救人，我的医术对于瞿先生是全然无用了。我深感愧疚。”

秋白的态度诚挚，含笑地说：“非常感谢你，蒙你医得好躯

体，化作春泥好护花。”

“请瞿先生相信我，你还有什么嘱咐？”陈炎冰走到秋白的书桌前。

“炎冰，日后如能见到吾妻杨之华，请将我在狱中情况悉告于她，还有我的女儿，小小蓓蕾，我有什么留给她呢？我的遗产只有几百万字的文章和几十首诗词。”

陈炎冰打开手中的条幅，泪水滴在雪白的宣纸上，那些闪烁着秋白的狱中情思和理想光芒的诗句，萦绕在陈炎冰的脑际：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烟云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瞿秋白视死如归，他愿把自己的“绮思”永留在罗汉山岭，留在天上人间。他还坚信风雨过后，春天一定会再来，重吐她的芬芳。

六月十六日，宋希濂接到蒋鼎文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就地枪决，照相呈验。”第二天中午，宋希濂派向贤矩去瞿秋白房

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瞿秋白饮了一口茶，铿锵有力地说：“我早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是中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个日子。三十六师师部内外，警卫森严，一派阴冷肃杀气氛。早晨八点，秋白囚室内静寂无声，朝阳从花窗射进。秋白想起夜间的梦游：他漫步乱山小径，夕阳明灭，黄叶纷飞，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此时他翻阅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便临窗铺纸挥毫：

“夕阳明灭乱山中，
落叶寒泉听不穷；
已忍伶俜十年事，
心持半偈万缘空。”

书写至此，三十六师特务连长廖祥光突然进来，垂手肃立：“恭喜瞿先生，今日是瞿先生的好日子。”说完，双手出示处决命令。

秋白闻语，未看命令，眉梢一展，泼墨加跋数句：“方欲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讖，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

秋白从容搁笔，环视四壁，犹见《浣溪沙》词，含笑凝视，不胜珍惜之状，遂缓缓步出囚室，漫步小天井道上，忽见石榴花灼灼火红，而矮桃树新叶勃发，他站在广玉兰浓荫下，若有所思，昂起头来，便坦然上路了。天井中一群一群军官士兵举目瞻视，肃然无声。东厢房内军官凭窗窥望，如泥塑木雕，面无表

情。

秋白在刀枪密布之下，走向中山公园八角亭前面。宋希濂从亭内迎出走向秋白身前，彬彬有礼地：“瞿先生恕罪，倘使先生略有幡悟之意，仍可电请委座免刑。”瞿秋白淡然笑曰：“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摄影师匆匆来到秋白面前。此时，秋白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双足错立，背着双手，昂首平视，神情恬淡，摄影师紧张地照下了他这最后的小影。

秋白走进亭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无声，他独坐凉亭中央，面前有一小石桌，桌上有菜肴四碟，美酒一壶。秋白手把酒杯，自斟自酌，神态自若，爽然笑道：“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从中山公园至刑场，即长汀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一片草坪，相距二华里，在士兵环卫之下，空气极为肃穆，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洒然而行，边行边以俄语吟唱《国际歌》，这歌声最早打动他的心灵，是在二十年代初，他回忆起当年翻译《国际歌》的激动情景。那时，他弹着风琴，反复以中文吟唱着“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经过西门街道口时，他在人群中见一瞎眼乞丐，蹒跚路中，便伫立凝视，若有所感，目睹者莫不为之流泪。行至养济院右侧，一个监刑军官，看着秋白缓步来到，冷漠地大声说道：“如果杀尽了共产党人，革命便可成功了。”秋白听了，不禁自

豪地笑道：“共产党人是杀不尽的。没有共产党人，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青青的草坪到了，草叶上的露水似离人的泪珠轻轻闪动，远处庙宇的晨钟哀声抑扬，红灿灿的朝阳穿过一片又一片乌云，倾洒在凄清摇曳的林梢，宛如淡淡的血痕。鸟雀在低空盘旋呻吟，一群群军官士兵和群众显出各自不同的表情。秋白唱着红军歌，仰望罗汉岭，环视道路上的人们，然后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又行进几步，俯视周围，芳草如茵，便席地而坐，对刽子手们点头微笑道：“此地甚好。”

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瞿秋白就这样与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却永远地活着。正如鲁迅说的：“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他的纪念碑是这世界上最坚固而壮美的，因为那是建造在人们的心中的。

瞿秋白英勇就义，对杨之华来说，是天崩地陷般的打击，她悲痛欲绝。但是，她没有因此而倒下。秋白的死，丝毫不能动摇她的信心。她决心继承秋白未竟的事业，更加坚定地向着“共产主义人间化”的艰险之路走去。

瞿秋白给杨之华的信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之华：

今天接到你二月二十四日的信，这封信算是走得很快了。你的信，是如此之甜蜜，我像饮了醇酒一样，陶醉着。我知道你同着独伊^①去看《青鸟》^②，我心上非常之高兴。《青鸟》是梅德林的剧作（比利时的文学家），俄国剧院做得很好的。我在这里每星期也有两次电影看，有时也有好片子，不过从我来到现在，只有一次影片是好的，其余不过是消磨时间罢了。独伊看了《青鸟》一定是非常高兴，我的之华，你也要高兴的。

之华，我想如果我不延长在此^③的休息期，我三月八日就可以到莫斯科，如果我还要延长两星期那就要到三月二十边。

① 独伊，即瞿独伊，瞿秋白的女儿。

② 《青鸟》，童话剧，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即梅德林）所作。该剧描写伐木人的孩子蒂蒂儿和米蒂儿在圣诞节之夜梦游“记忆乡”、“夜宫”、“未来国”等地，寻找象征幸福理想的青鸟，以医治邻居的患病孩子的故事。《青鸟》带有浓厚的神秘幻想色彩，是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品之一。

③ 指苏联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

我如何是好呢？我又想快些快些见着你，又想依你的话多休息几星期。我如何呢？之华，体力是大有关系的。我最近几天觉得人的兴致好些，我要运动，要滑雪，要打乒乓，想着将来的工作计划，想着如何的同你在莫斯科玩耍，如何的帮你读俄文，教你练习汉文。我自己将来想做的工作，我想是越简单越好，以前总是“贪多少做。”

可是，我的肺病仍然是不大好，最近两天右部的胸膛痛得利害，医生又叫我用电光照了。

之华，《小说月报》^① 怎么还没有寄来，问问云白^② 看！

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是独伊。梦中的你是如此之亲热……哈哈。

要睡了，要再梦见你。

秋白

二月二十六日晚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二日

之华：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只草草的写了几个字，一是因为邮

① 《小说月报》，一九一〇年创刊于上海。该刊一九二一年从第十二卷第一期起由沈雁冰、郑振铎主编，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要刊物，发表了不少具有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品和文章，是我国新文学的主要期刊之一。一九三二年一月淞沪抗战时停刊。

② 云白，即瞿云白，瞿秋白的弟弟。

差正要走了，二是因为兆征^①死的消息震撼得不堪，钱寄到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三十元已接到。）

整天的要避开一切人——心中的悲恸似乎不能和周围的笑声相容。面容是呆滞的，孤独的在冷清清的廊上走着。大家的欢笑，对于我都是很可厌的。那厅里送来的歌声，只使我想起：一切人的市侩式的幸福都是可鄙的，天下有什么事是可乐的呢？

一九二二年香港罢工（海员）的领袖，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的，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前月我们和史太林^②谈话时，他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他所教训我的——尤其是八七^③之后，是如何的深切。

可是他的死状，我丝毫也不知道，之华，你写的信里说得太不明白了。他是如何死的呢？

之华，你自己的病究竟怎样？我昨天因为兆征死的消息和念着你的病，一夜没有安眠，乱梦和恶梦颠倒神魂，今天觉得很不好过。我钱已经寄到了，一准二十一日早晨动身回莫^④。

① 兆征，即苏兆征，中国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曾领导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和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罢工。一九二八年二月动身赴莫斯科，先后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不久，因积劳成疾，留在苏联治病。一九二九年一月因国内斗争需要抱病回国，二月在上海病逝。瞿秋白曾说过：我没有坚持说服他留在莫斯科治病，这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

② 史太林，即斯大林。

③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④ 莫，指莫斯科。当时瞿秋白在苏联库尔斯克州利哥夫县玛丽诺休养所疗养。

你快通知云^①，叫他和□□^②商量，怎样找汽车二十二日早上来接我，在 Б р я н с к^③车站——车到的时刻可以去问一问；我这里是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分从 л ь г о в^④车站开车。之华，你能来接我更好了!!!

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之华，我要吻你，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

秋 白

三月十二日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之华：

昨天晚上写了一封信，现在已经觉得又和你离别了不知多少时候了，又想写信。

之华，再过四天，我俩可以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今天这里的天气非常好，青天白云，太阳光耀着，冷风之中已经含着春意，在那里祝贺我俩的叙首呢。我数了一数你写给我的中俄文信——总有三十封了！我读了又读，只是陶醉在你的爱之中，像醇酒一样的甜蜜，同时，在字里行间我追随着你的忧愁

① 云，指瞿云白，瞿秋白的弟弟。

② 原抄存件此处字迹不清。

③ Б р я н с к，即布良斯克。

④ л ь г о в，即利哥夫。

或高兴,我觉得到你的一切一切!! 之华,我吻你。

我最近又常常想起注音字母,常常想起罗马字母的发明是很重要的,我想同你一起研究,你可以帮我做许多工作,这是很有趣味的事。将来有许多人会跟着我们的发端,逐渐的改良,以致于可以通用到实际上去,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到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但是发端是不能怕难的。之华,我们每人必须找着一件有趣的大部分力量和生活放进去的事,生活就更好有趣了! 之华,我吻你,吻你。

你说,决定暂时不用功而注意身体。这是很好,我原是时时想着的,时时说的。之华,这不好是灰心,而是要觉得自由自在的。自己勉强固然是必须的,但是不是要自己苦自己。我俩虽已到中年了,可是至少还有二十年的生活呢,不要心急,不好焦灼。我一生就是吃这个苦。我是现在听着之华的话,立志要改变我的生活,之华,你自己也要如此,你要如此!! 我俩快见面了!!!

秋 白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八日。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之华: 临走的时候^①,极想你能送我一站,你竟徘徊着。

海风是如此的飘漾,晴明的天日照着我俩的离怀。相思的滋味又上心头,六年以来,这是第几次呢? 广阔的天穹和碧落

^① 一九二九年七月,瞿秋白由苏联莫斯科赴德国法兰克福参加国际反帝同盟大会。

的海光，令人深深的了解那“天涯”的意义。海鸥绕着桅墙，像是依恋不舍，其实双双栖宿的海鸥，有着自由的两翅，还羡慕人间的鞅掌。我俩只是少健康，否则如今正是好时光，像海鸥样的自由，像海天般的空旷，正好准备着我俩的力量，携手上沙场。之华，我梦里也不能离你的印象。

独伊^①想起我吗？你一定要将地名留下，我在回来之时，要去看她一趟。下年她要能换一个学校，一定是更好了。

你去那里^②，尽心的准备着工作，见着娘家的人^③，多么好的机会。我追着就来，一定是可以同着回来，不像现在这样寂寞。你的病怎样？我只是牵记着。

可惜，这次不能写信，你不能写信^④。我要你弄一本小书，将你要写的话，写在书上，等我回来看！好不好？

秋 白

七月十五

① 独伊，即瞿独伊，瞿秋白的女儿。一九二九年随母亲杨之华到苏联，先后被送入孤儿院、幼儿园、国际儿童院抚养。

② 指杨之华由苏联莫斯科去海参崴参加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召开的太平洋劳动大会。

③ 这里指参加在海参崴召开的太平洋劳动大会的中国工人代表。

④ 在海参崴召开的这次太平洋劳动大会规定，为保证安全起见，各国代表不许同外界通讯。

杨之华忆秋白

我和秋白是在上海大学认识的。

一九二三年年底，我去投考上海大学。考试的地址在庆云路庆云里。我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走进一座破旧的老式的里弄房子，只见男男女女的学生挤得满满的。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和藹的姑娘——她就是张琴秋同志。在这些学生当中，后来有不少都成为我们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到来了。从此开始了紧张的政治斗争的生活。上海大学共分三个系：社会学系、中文系和英文学系。我在社会学系学习。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这里面的一些人给予我不可磨灭的印象。邓中夏同志是我们的总务长，他的头发很黑，眉毛浓而长，眉心很宽。当他抬起头来看人的时候，两眼闪闪有光。他精神饱满，做事机智果断，使学校的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他常常喜欢讲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是我们敬爱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

在教师中间,有轻松愉快的张太雷同志,他教我们政治课;有循规蹈矩的蔡和森同志,他讲私有财产和家族制度之起源。恽代英和萧楚女同志讲话富有煽动性,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并且善诙谐,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新同学都爱听他们讲课。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学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萧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当时秋白上课的情况:“在庆云路上海大学旧校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震动,似乎要塌倒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的听,一直到下课为止。”……后来上海大学从庆云路搬到西摩路,最大的课堂在敦厚里。

当课堂里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同学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的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珍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

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同学们都说秋白讲得好,内容丰富极了,有的说他有天才,有的说他很用功,也有的人根本不去想是什么理由。当时我也不懂,后来才知道了,秋白是怎样对待工作。他热爱他的工作,为党培养新生力量。

那时,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够他忙了,又加上上海大学这一副不轻的担子。在生活上,他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的,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于秋白也更加了解了,但是,秋白的身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秋白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江苏常州市人。他的父亲信道教,长期失业,流浪山东。他的母亲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在一个破落户的大家庭里,贫困和苦难折磨了她一生,于一九一五年二月间吃虎骨酒和火柴自尽。人们这样责骂她:“把丈夫逼走了,把祖母搬死了,不给儿子中学毕业。”其实丈夫出去找职业,久年疯瘫的祖母搬杭州,和秋白离中学毕业仅半年就去无锡国民小学当校长,这都是因为一家七八口吃尽卖光、典质无物,不这样做就不能再维持生活的缘故。秋白的智慧早被他的母亲发现,她也最爱秋白。她擅诗词,爱文艺,对

秋白的教育很注意，亲自讲授诗词；为了秋白进学校便利，她不顾族规，搬住祠堂。秋白有天才，但他的天才与他的母亲是不可分离的。秋白也是最爱和最能体贴他的母亲的。当他一谈到他的母亲的自尽，就沉默很久，回忆当时情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秋白陪灵半年，稀粥难咽，孤苦极了。

秋白自小就用功，张太雷同志是秋白的同学，他常向我们说起秋白在小学、中学都是个优等生。他们当年对时事很关心。辛亥革命时，鼓动同学、练习刀枪，对革命满怀信心。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反动分子篡夺了，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恶行为，使他们深为痛恨。秋白十四岁那年的双十节，他的故乡——常州县城各学校机关都挂红灯庆祝辛亥革命；而秋白却提了写着“国丧”二字的灯笼。这个故事证明秋白从小就爱国，从小就有见解，有勇气。一九一六年，他的舅母当了当头借给秋白川资到汉口，进武昌外国语学校，后又随堂兄纯白到北京，进俄文专修馆。热爱祖国的秋白，就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的运动中，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下，卷入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集合的示威游行。由于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当时就被推选为俄专出席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第二次请愿时，全体代表三十余人被捕，秋白也在里面，但在全国学生的要求下获释了。这时候的秋白，正式参加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北大图书馆，在青年会或在秋白的住所秘密集会，学习和讨论问题。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离开北京，到苏联去了。这

个时期秋白一方面报导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帮助中国同志的学习。一九二二年二月，经张太雷同志介绍，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

我认识了秋白以后，觉得他和邓中夏、张太雷等同志不同。邓中夏和张太雷等同志精神愉快活泼，学生们很容易接近他们，可以常常和他们谈谈笑笑。而秋白却是严肃沉静。在讲台上，他滔滔不绝，把问题讲得很透彻；在会议上他的口才像快刀利刃，能说服人。但在平时，他不肯多讲一句废话。有人说，秋白是“骄傲的”、“冷酷的。”

不久，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初次印象。

在上海大学，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一样，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当时还是国共合作的时期，我被分配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办公地址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在那里，我认识了向警予同志，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工作。有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转给我一张上级的通知，说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指定我去谈谈。那时，向警予同志因事离开上海了，所以只得我去。我深怕自己讲不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到鲍罗廷家去。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外地遇见了秋白，他是来为我做翻译的。一见了他，我觉得有了帮助，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秋白

以流利的俄语和鲍罗廷夫妇谈着，他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翻译给我听，并且教我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想一想。”大家都以同志的态度随便座谈，我的拘束也逐渐消失了，后来愈说愈有劲，秋白满意地笑了，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们听，接着，他又把鲍罗廷夫人向我介绍苏联妇女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听不懂，又加以详细地解释，使我初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活的真实情况。

当时懂俄文的人还不多，秋白还给其他许多同志当翻译。这工作在他说来是一件“小”工作，但他从不轻视这类“小”工作，每次都很认真地去。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秋白在上海大学的纪念会上，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报告，他与任弼时同志还在大会上热烈地高唱《国际歌》，那种革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同学们。

三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天气好极了。清晨，一些同学和我邀秋白到半淞园去散步，打算玩一会儿，再去参加上午十时在天后宫召开的群众大会。

开会的时间快到了，大家一同上了电车。在电车上碰到上海大学的一位同学，他悄悄地通知我们：租界当局勾结国民党

右派、无政府主义派，收买了地痞流氓，准备捣乱今天的大会。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当即要秋白回家去，由我们先去看看动静，再打电话告诉他。秋白同意了，下车回家工作去了。

大会刚开始，台下一阵混乱，一声呼啸，只见流氓们跳上台动手打主席团了。上海大学学生会早准备了一批人保护主席团，但仍被有武力的流氓们打伤了好多人，伤势最重的是黄仁同志，我们急忙把受伤的人抢救下来，黄仁同志已经神智不清，失去了知觉了。我们雇了汽车，把受伤者送到宝隆医院里。这时我们又得到消息：反动当局要恐怖手段逮捕共产党员，秋白的处境也很危险。

晚上，支部派我到医院里看黄仁同志，医生告诉我，他的生命已经无可挽救了。

过了午夜十二时，夜深人静，一间小小的病室里，只有我和黄仁同志两人，他躺在白被下面，一动也不动，我不断替他擦去从鼻孔里、从嘴角里流出来的鲜血，正在这时，突然，秋白出现了。

“他怎样了？”秋白一进门，就急切地问。

我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

他俯下身来，摸摸黄仁同志的额角，小心地揭开被子，察看受伤的身体，轻轻地呼唤着黄仁同志的名字。但黄仁同志仍然阖着眼，似乎沉沉睡熟，不能答应了。

秋白把两手插在大衣袋里，站直身子，沉思着。最后，他答应我天一亮就把棺木、寿衣送来，他就走了。

黄仁同志的死，使国民党右派和无政府主义派大为高兴，面这时，上海英法巡捕房已下令通缉秋白同志，并且搜查了他

的住所慕尔鸣路彬兴里和西摩路上海大学。当时秋白已避难在先施公司职员孙瑞贤同志的家里，巡捕房没有捉到秋白，便把他的《向导》等报刊，和他在苏联节省了自己的白糖换来的俄文书籍搜去，付之一炬。那天巡捕房还带走了在上海大学图书馆值班的學生李炳祥。包探问李炳祥：“瞿秋白在哪里？”得到的回答是：“我在书报流通社工作，可不知道瞿秋白是谁，更不知他在哪里。”

秋白的秘密住所是在北四川路底兴业里一号的三层楼的阁楼上，我是经常去和他取得联系的人之一。当我报告说，他的家和学校被搜查，书报被烧毁的消息时，在他的脸上，我看不出有一丝慌张的神色。他轻轻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冷静地在桌子周围来回地走着。最后，他停来说：“书烧了，但是进步的思想是毁灭不了的！”

四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我与秋白结婚了。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美满的。

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我与以前的丈夫有一个女儿，那便是独伊。我的离婚，受到当时人们封建思想的反对，他们把我的孩子当作私有物，不允许我看见我的女儿。我在上海时常想到女儿，不知她生活过得怎样，长的多高了。我渴望着看到她，秋白很能理解这种母亲的心情，他同情我，安慰我，并且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帮助我抽出一个空，回乡下去看孩子。

到达家乡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独自一人走到过去公婆

家里。我过去的公公知道了我的来意，突然沉下脸来，冷酷地说：“我不能让你看她。”并且不再理我了。我痛苦地走出了他的书房，在厨房门口，碰见了他的大姨太太。我们过去关系很好，她听说了我的苦处，便说：“别作声，我带你去。”我们悄悄地穿过几个厅院，大姨太太推开了一间侧屋，在暗淡的油灯光下，我看见了心爱的女儿，她正在玩玩具。我抑制了心中的狂喜，轻轻走到孩子面前，她玩的正是我从上海买回去的玩具呵！孩子天真地对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的妈妈死掉了。”她那两颗黑黑的眼睛，不住地看着，又拿手上的玩具给我看：“这是妈妈买来的。”

“独伊，我的好女儿，我就是你的妈妈。”

“不，”孩子固执地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你，一个在上海死掉了！”

我掉下了眼泪。是那些人欺骗我的女儿，说我死了，但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看见了我仍然认识我是她的妈妈。幼小的心灵，弄不清这回事，把他想象成两个妈妈了。

我亲了她，但是不得不很快地离开了她。

在我离开上海的第二天夜里，秋白曾经不安地到火车站来接我，但是没有接到。又过了一天，我才回到了上海，他从我的神色中，已经知道这一次去，并不是很顺利的。秋白懂得母亲心灵上所感到的一切，他比谁都了解我，他想尽一切来安慰我，他把《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讲解给我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

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

不久，又写了一首长诗给我，痛斥了黑暗的旧社会，并且表示：孩子有着光明的前途，我一定爱护她，一定会比她自己的生父更负责的培养她，教育她，使她将来在社会上发挥她的力量。我感到秋白是如此细腻深刻地了解我，我为他这种无私的爱和高尚的人格所感动，也相信他的话会实现的。

每当我想到我的女儿关在那阴森的房子里，过着完全不适合儿童身心健康的寂寞的生活，我的心就痛得皱缩起来。我一定要孩子回到我的身边。秋白很同意。我们又抽了一个时间，两个人一起回到我的家乡。在我母亲家里，我们想了个办法：派人把孩子偷出来，然后抱回上海。

那天，秋白和我站在一座山上等着。等了好长时间，才看到孩子出来了，大姨太太和照护孩子的人跟随在后边。我高兴地把孩子抱在怀里，孩子的两条小胳膊也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正在这时，突然奔来两个大汉，一阵风似地把孩子抢走了。他们走的那么快，谁都追赶不上。我们眼巴巴地望着被抢走的孩子，孩子在大汉的手里挣扎着，哭喊着妈妈，我止不住哭起来了。

我和秋白冷冷清清地从河边走着，一路上默默无语，我第一次也只有这一次看到秋白流下了眼泪……。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瞿秋白 杨之华

作者 =

页数 = 1 8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